

# 工作、消费、**新穷人**

[英] 齐格蒙特·鲍曼 / 著 仇子明 李兰 / 译

ZYGMUNT BAUMAN

##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Second Editio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他们遭受了以往的穷人所遭受的一样苦难，不同的是，他们不能或者没有试图把苦难变为公共的共同关怀。

—— 齐格蒙特·鲍曼

穷人如何成为穷人、被看做穷人，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这些“如何”投射了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

当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穷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的困境。

鲍曼在本书中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现代社会的转变，福利状况的影响和穷人被社会化生产以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径，并提及穷人与贫穷可能的未来。他勾勒出在当代穷人的故事里被忽视、过度解读和被隐藏的部分，并试图回答：贫穷能够用普遍公认的方法来对抗和征服吗？



ISBN 978-7-5463-2929-1



9 787546 329291 >

定价：22.00 元

# 工作、消费、**新穷人**

[英] 齐格蒙特·鲍曼 / 著 仇子明 李兰 / 译

ZYGMUNT BAUMA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作、消费、新穷人 / (英)鲍曼著;仇子明、李兰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5

ISBN 978-7-5463-2929-1

I. ①工… II. ①鲍…②仇…③李… III. ①贫困—研究

IV. ①F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800 号

## 工作、消费、新穷人

责任编辑: 武 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100052)

发行电话: 010-63106240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14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929-1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目 录

译者导言:现代政治秩序解构的伦理危机…………… 1

第一版导言…………… 29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制工作伦理…………… 35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63

## 第二部分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95

第四章 工作伦理与新穷人阶级…………… 123

第五章 全球化世界的工作与冗余…………… 158

## 第三部分

第六章 新穷人的希望…………… 181

译名对照表…………… 206

# 译者导言：现代政治秩序 解构的伦理危机

## 一、消费主义的困境与虚伪的自由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曼就开始关注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议题，并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在鲍曼看来，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后，消费主义占据了人们生活模式、价值选择、道德审美和文化认同的主导地位，尽管人们在消费社会中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带欺骗性的社会关系。

### （一）消费社会与权力的转移

鲍曼注意到，西方社会已经由生产型过渡到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的运转很少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而是取决于消费者依赖市场的能力。消费社会的膨胀不仅吞噬了文化的独立性，也迫使知识分子从“立法者”阵营不得不退居“阐释者”阵营，而且还削弱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意愿。

据日本消费社会研究学者三浦展的论述，在消费主义境遇下，一部分人将步入“下流社会”：所谓“下流”不仅仅是指收入低，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

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其结果导致收入很难得到提高,独身的比例也极高。<sup>①</sup>

早在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一书中,鲍曼就回答了以工厂为斗争场所的生产型社会是如何转型为以市场为中心的  
消费社会。鲍曼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关注的是现代工业文化,所有这一切都与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只有消费欲望才能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并非成为社会动力的主导力量。在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鲍曼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试图把边沁、马克思、福柯与汤普森等人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结合起来。10年后,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详细而完整地阐释了他的观点,下文将重点论述。

2

消费市场通过诱惑性的消费文化而非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社会整合。鲍曼认为,“消费文化”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在费瑟斯通看来,“消费文化”有两层涵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在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sup>②</sup>无论是对世界的  
所有看法,对未来的期待、生活节

---

① 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②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奏，对往事的回顾和关注焦点的特质、相关动机和日常议题，都是围绕消费市场的制度和变化而构成的。显然，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创造这种权力中心的渴望；不存在一种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也不存在一种权力资源。鲍曼较为赞同布尔迪厄的观点，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今天，使人联结社会的力量，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是他们的由消费而构成的生活。<sup>③</sup>因此，消费者冲动和使行为服从于快乐的倾向都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消费者欣然屈从于广告的威望，因而，这种信念不需要进行“合法化”。通过需要的剧增而非规范的周密，以使消费者的行为便于管理，从而不具有危险性。

3

对市场的依赖还由于人的社交能力的逐渐破坏——这种能力和积极的社交愿望，能够使得男女参与到社会关系之中，并维持这种关系的存在。由于参与者缺乏社交技能，于是人们只能避免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人们只能求助于可以进入市场的货品、服务和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市场作为他们的确定性和自信的基础。对可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依赖，很快便转变为一种对市场的从属。<sup>④</sup>

在鲍曼看来，消费市场最要命的影响是那种承诺，亦即承诺

---

<sup>③</sup> 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24页。

<sup>④</sup> 同上，第228-231页。



有一种可以治疗你所有折磨的药方，它就在某个商店的某个角落，而且如果你够认真寻找，你就可以找到它。这种承诺的后遗症有三个，每一种都很要命。一种是“社会的去技术化”，亦即忽略学习与他人讨论及协商的技术以找出办法摆脱麻烦，并且相信那种技术不真的是必要的，因为可以在下一个购物行为中以较不费力且花费较少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处理生活问题就像吸收消费品一样，那是一种单独的问题，不能从和他人的合作中达成太多效果。第三种后遗症可以说是以对抗症状来代替治疗疾病；不管你是多精明、多机灵的消费者，你都不会在商店中找到造成你困扰的社会因素的治疗药方，只能找到如何镇定安抚社会因素所造成的考验和苦难的配方。<sup>⑤</sup>鲍曼在一次对话中，曾明确地告诉泰斯特，他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是：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鲍曼认为，后现代状态有两个原因适合消费社会新出现的社会关系模式。首先，在消费社会，原则上危险的是象征而不是有限的资源。权力对抗不再需要严格的零和博弈，有一种通过另外的场景的新的象征手段来重新确定自我的自由，而旧的权力对抗实行丧失。其次，更深刻的是，国家权力在消费社会的展示是这样的，消费社会可以承受各种丰富的观点，因为所有观点都能不会对国家政府的地位产生威胁。权力不再取决于统治的意识形态，因此对意识形态的挑战丧失其意义，社会和系统整合与个人认同一样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通过消费市场来构建的。国

---

<sup>⑤</sup> 鲍曼、泰斯特：《与鲍曼对话》，杨淑娇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26-127页。

家丧失其中心地位的作用，权力中心转移到了市场领域，解放的推动力也从生产转向消费，这相应就减轻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sup>⑥</sup>

## (二) 消费自由的欺骗性

在福特主义当道的生产盛会中，人们的行动和思想都没有自由可言，完全为机械化的工作效率所束缚。然而，在消费者逐渐主导社会化话语权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在消费市场上具有充分的自由空间，无论生活方式、审美价值还是对社会的联系都以消费为纽带。但是，这种消费自由是否在政治学意义上实现了自由呢？鲍曼并不这么认为，他试图揭开消费自由的欺骗性。

在鲍曼看来，“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自由不是一种所有权或个人对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间的某种差异相关的属性。只有把它看作过去或现在某些状态间的对立物，自由才有意义。”<sup>⑦</sup>同时，在鲍曼看来，自由还是特定社会内部身份地位分化的标志，“近来，已经注入了消费领域。个体自由首先是作为消费者的自由，这种消费者自由以高效运作的市场存在为基础，而反过来它又是确保市场存在的条件。”<sup>⑧</sup>从消费者立场看，消费世界不同于财富和权力生产于分配，它摆脱了消除竞争和垄断功能的根源。尽管竞争还继续以

---

<sup>⑥</sup> Zygmunt Bauman (1992): *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 Routledge. p. 45.

<sup>⑦</sup> 齐格蒙特·鲍曼：《自由》，杨光、蒋焕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0页。

<sup>⑧</sup> 齐格蒙特·鲍曼：《自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0-11页。

象征符号的区别和独特性的行事表现出来,但这不是社会地位本身而是地位之间的差异。因此,可以说,消费自由的对立面正是安全感,行使自由不能以牺牲身体和精神安全基础的确定性为代价。

消费被确定为自由的一个竞技场,参与象征符号竞争的自由个体由此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摆脱了由物质需要决定实用性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感官和审美判断的瞬间满足的快乐原则。因此,在消费市场,自由和确定性、独立性和集体生活彼此共处,人们可以依赖于市场来享有自由,而不必付出不安全感的代价。尽管消费社会仅仅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其本身无所谓道德的正反面,但在鲍曼看来,必须指出消费自由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难满足的。由于购物和消费品的依赖性是所有自由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依赖消费者选择的程度是通过使用大量生产和推销的商品,从而最普遍且有诱惑力的是,把生活视为一系列消费选择的经历。消费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外没有别的目的,消费也无需其他事务来证明其合理性。此外,购物和消费只能使消费者得到瞬间的满足,理想的消费自由就是——“欲壑难填”(desires shunning satisfaction),使一切理性和激情都以满足和提升欲望为目标才有意义。消费市场为了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需要大量的时尚和广告来诱惑他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不满足的状态。

另一方面,消费自由最反对的就是为生存而消费的“传统消费者”,这些人是消费社会的“公敌”。他们坚持关于消费需要的传统定义,换言之,他们把需要视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紧张

状态,把幸福视为消除紧张,恢复平衡,返回到需要满足时的那种平衡和平静状态;对他们而言,消费并不是“绝对的以本身为目的”,并不是“天职”,幸福状态的终点就是:“我已经获得了所有的需要,我不需要再努力了。”<sup>⑨</sup>一旦满足了需要,消费活动就失去了意义,但消费社会却宣称需要是不可能满足的,消费活动是一系列欲望,一切幸福和快乐都伴随消费过程转瞬即逝,都在不确定的消费中寻求满足。

### (三) 消费社会与政治疏离

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层面,工作提供了训练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各种社会“怨恨”(舍勒语)融合的焦点和宣泄愤怒的战场;在体制层面,维系和再生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取决于生产者。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特征是,工作同时占据了个人、社会及体系层面的中心,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体系管理协调一致的纽带。但是,在消费社会,工作的中心地位却被消费者取代。

在鲍曼看来,消费主义是分析消费社会的重要范畴。“消费型的选择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某种中心的角色,这与在现代社会中通常由工作、职业、就业等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可以说,消费主义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配、欲求、获得和使用上。消费,不止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精神需要的行为,它还是一种处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所以,强调象征性物质的重要性就显得很必要。在生

---

<sup>⑨</sup>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亦即建构社会关系等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障种种条件的再生产,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所有上述这些活动得以成为可能。”<sup>⑩</sup>

当代社会是围绕消费来整合的,同时,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也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鲍曼指出,自由和个人命运已经逐渐变得私人化了。但是,不管能不能承受参与消费自由,不断私人化的生活都逐渐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免于约束的政治则加深了私人化的程度,这就在培植了道德冷漠的同时,也培植了政治疏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消费选择成为人类生活世界寻求意义和追加价值的核心。——“我买,故我在!”

8 比哈贝马斯和奥菲更激进的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时,鲍曼强调消费、消费者、消费主义的历史意义是解读后现代政治的关键。因为消费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作是从政治中的制度化退出,或者作为一种强力的诱惑,鼓励这消费者脱离刻板单调的政治立场和理性的官僚政治。消费社会一种新兴的权力看不出是理性与激情、谨慎与自我放纵、工作与懒惰之间的对立,其扩展只体现为一个文化蜕变的进程,消费社会的受压迫者被排斥于市场之外,为国家权力继续管理。该群体在权力上没有前途,他们是沉默的、碎片化的,并有可能进一步退化为“社会的废弃物”。

与另外一消费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的反讽不同,鲍曼对消

---

<sup>⑩</sup> Zygmunt Bauman (1992): *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 Roytledge. p. 50.

费社会的批判是正面的直接回应。鲍曼指出：对于消费者体制来说，快乐消费的消费者是必要的；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消费是一种职责，甚至还可能是最重要的职责。<sup>①</sup>消费者在社会层面上感到消费的压力，因为他为了在象征意义上与同辈人保持一致，为了发展一个与独特性和差异性相一致的自我认同，为了获得社会的赞同；在体制层面上的消费压力来自提供消费者商品的企业，这些压力是压倒性的、消费者不仅作为一种努力去经历这些压力，而且也作为快乐和喜悦的来源去承受压力。当然，生产和消费的控制结果是一种强有力而更安全的资本主义体制。至少，这种体制是通过个人自由而不是通过压迫来进行自身再生产的，这正是可怕之处。

## 二、新穷人的权利

9

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是鲍曼自始至终的关注对象，“甚至是构成其全部学术生涯的现实素材。”<sup>②</sup>鲍曼有多本著作专门论述了消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贫穷问题。对鲍曼而言，历史上的贫穷是一种物质上的匮乏，但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但在消费社会，穷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平等都被剥夺了，穷人的尊严受到破坏，从而，穷人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并无法团结起来对抗上层阶级。这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

---

<sup>①</sup> Zygmunt Bauman (1992): *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 Routledge. p. 50.

<sup>②</sup> 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联合起来”的行动指南偏离了,鲍曼开始转向后马克思主义。

### (一)从穷人到新穷人

人类历史上的贫穷意味着身体生存的危机,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或其他威胁。鲍曼认为,“每个我们已知的社会对穷人都抱持这特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惧怕与讨厌,另一方面是怜悯与同情,两者不安地混杂在一起。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容许为了维护秩序而严酷处置穷人;后者强调身处标准之下者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使得那些遵循规范的人经受的一切痛苦,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以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纵有种种不是,穷人在复制社会秩序及保证遵从规范上,可说是扮演了有用的角色。然而,每个社会都根据其特定的秩序及规范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构了穷人,并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释,发现不同的穷人用途,并发展对付贫穷的不同策略。”<sup>⑬</sup>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来说,即使穷人的状况提升到纯粹是生存的层面上时,贫穷总是意味着营养不良,不足以保障人们对抗气候的恶劣和无家可归。所有关于穷人的界定都与既定社会视为衣食住行的当下标准相关联。所以,贫穷的内涵和穷人的身份从前现代经过现代到当前的消费社会必然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鲍曼指出,“前现代欧洲,比起现代的承继者,更能发掘穷人的重要功能。在前现代天主教的欧洲,穷人一如其他人事物,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有之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穷人是上帝的造物,就像其他万物一样,在现代的去神圣化或‘除

---

<sup>⑬</sup>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119-120页。

魅’(disenchanted)以前,各有意义和目的。穷人饱受苦难,这些折磨是对原罪的忏悔,也是救赎的保证。”<sup>⑭</sup>亦如福柯所言,“在整个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存在,是一种永远个性化的需要帮助的形象,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sup>⑮</sup>因此,穷人是上帝赐予众人的恩泽:如此才有机会自我牺牲,过着良善的生活,也才能悔过而得到上帝的庇护。

在除魅的世界里,过去的种种不会因其偶然地存在那里,便拥有存在的权利,过往的一切,都必须为其存在的权利提出正当合理的证据。18世纪的人发现,“穷人”并不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最终的现实而存在着;在他们身上,两种不同的现实长期以来一直被混淆在一起。一方面是“贫困”,即商品和金钱匮乏。另一方面是“人口”。这不是一个受财富波动支配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直接影响经济行事和财富生产的力量……贫困此时正在逐渐从以往的道德混合体中脱颖而出,贫困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sup>⑯</sup>更重要的是,与前现代欧洲相较,这个现代性的美丽新世界自行制定规则,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既存的一切事物都必须纳入理性的审视,认为自身的权威没有限度,尤其排斥“死者权势大过生者”、传统权威以及承继的传统知识和习俗。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前,穷人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毫无立足之地。

---

<sup>⑭</sup>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120页。

<sup>⑮</sup>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4页。

<sup>⑯</sup> 同上,第213-215页。



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工业主义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穷人成为生产流水线的劳动力,正由于此,无产者才可能结合成强大的阶级力量,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确立起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地位。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sup>①⑦</sup>在物质层面,穷人是匮乏的,但在精神层面,穷人却与富人是均等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甚至是更先进的社会政治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先驱力量。事实上,只有在工业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的工人阶级才能凝聚成反抗资本主义秩序规范的力量,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财富生产来自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为工业降低成本而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的贫困程度与创造财富的价值成正比。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穷人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sup>①⑧</sup>

在消费取代生产并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的消费社会,穷人无力再与富人和精英势均力敌,而是成为毫无用途的“废弃的

---

<sup>①⑦</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sup>①⑧</sup>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3-214页。

生命”和“有缺陷的消费者”。鲍曼认为，贫穷现象不能仅仅简单化为物质的剥夺和身体的灾难，它还是一种境况和心理境况。因为人类存在的特性是通过在既定社会中实践体面的生活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无力遵循这种标准本身就是灾难、恐惧感和耻辱感自我增强的原因。贫穷意味着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这必然导致穷人的耻辱感、内疚感以及自尊的沦落。贫穷也意味着无力追求既定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就导致怨恨的积压，并以暴力行动和自我反抗的形式喷发出来。

在消费社会，正常的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为了快乐的感官和现场的经历而沉迷于琳琅满目的商品。因此，与所有其他社会形态相同的地方是，消费社会的穷人是那些无法达到正常生活的人，更不用说实现幸福生活。但在消费社会，不同的却是，“首先且最重要的乃是有缺陷、欠缺、不完美且不充足的——换言之，就是不合时宜的——消费者。”<sup>①9</sup>相应地，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对手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作为传统消费者的穷人。因为穷人去购买商品，不是因为商品处于热销中或宣传深入，而仅仅是因为商品本身就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急需用品。所以，只要社会变迁还是急需按当代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穷人就处于迷失而无助的状态，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他们反抗压迫的欲望，更不用说试图寻求新的体制。

消费文化所界定的幸福生活是确保新颖时尚而没有厌烦的生活，而且与消费文化相互补充的消费市场则要确保生活的富足与安逸。鲍曼认同“贫穷会因为经济成长而加剧”的观点。

---

<sup>①9</sup>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53页。

首先,经济成长以浮动契约来取代工作保障;其次,在穷人变得更穷时,有钱人——消费者美德的典范——却变得更有钱。<sup>②</sup>

## (二)无力反抗的穷人

正是由于贫穷在消费社会的内涵变化,穷人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匮乏,而且还有精神上的不平等。因此,穷人不再仅仅与作为社会无产者的工人阶级相联结。毋宁说,丧失了作为人应该具有的尊严。

关注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始终处于鲍曼思想的中心位置。在现代社会,工人阶级一直是受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代表,长期以来,都作为受苦受难的象征。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前,鲍曼关注的都是工人阶级,这种关注可以归结为鲍曼在二战后的30年里都在追求一种共产主义理想,希望波兰可以重建为一个没有社会疾苦但具有人类尊严的国度。在鲍曼告别工人阶级的主体后,他对矛盾性、全球化和共同体的研究,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受压迫者。但他又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是社会疾苦的代言人,而当代的人类境况表明,犹太人、难民和“新穷人”已经取代了工人阶级的位置。被压迫者的含义亦发生了变化。在旧有模式中,工人阶级体验的是物质需求的剥削,尽管贫穷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议题,但这并不是需要考虑疾苦的唯一形式。鲍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贫穷不只是没有救济手段的客观条件。鲍曼主张一种相对的贫穷概念,社会疾苦不可能永久性消

---

<sup>②</sup>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56-57页。

除，只可能减少。

早在鲍曼之前，汉娜·阿伦特就在深刻地研究了革命这种现代性现象后，将体现为公共和能动形式的自由的历史性失败，归于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

富足与无休无止的消费乃是穷人的理想：它们是苦难荒漠中的海市蜃楼。在此意义上，奢足和窘迫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必然性的桎梏不一定非要钢铁铸就，它们也可以用柔丝织成。自由和奢侈一向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现代的看法，倾向于将国父们对节俭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的执著，归咎于清教徒对尘世快乐的蔑视，这种看法所证实的，与其说是一种无法摆脱偏见的不自由，毋宁说是对自由的不理解。因为，“追求一夜暴富的知名激情绝不是感官邪恶，而是穷人的梦想；……穷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而是‘各取所欲’”。<sup>①</sup>

即使贫穷的内容是相对而有变化的，但给人类所造成的过错是固定的，贫穷需要特别关注和谴责：“贫穷不是由社会造成的许多的耻辱中的一种，这不只是因为贫穷是最痛苦且为它的受害者带来比其他形式羞辱更多的苦难而已，贫穷是一种‘超羞辱’，是一块让所有的无尊严繁茂的土壤，是一块让‘多重羞辱’开展的弹簧垫。”<sup>②</sup>然而，不仅贫穷的社会疾苦不必以这种

---

<sup>①</sup>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123页。

<sup>②</sup> 鲍曼、泰斯特：《与鲍曼对话》，杨淑娇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69页。

方式接受,而且还要从人类自身来揭示导致贫穷的缘由,并以此来转化和政治化为可操作性的策略。鲍曼试图从伦理目的的严肃性来寻找出路,指向一种政治亲和力,即社会主义。在鲍曼的界定中,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责任,强调社会疾苦问题并且通过世界的人道化来开放各种可能性。

对鲍曼来说,现代社会的疾苦是通过生产关系来界定的,而在消费社会所界定的社会疾苦反映消费和消费主义的关系,是通过人们在消费市场自我构建的能力来界定。这就促使鲍曼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代分野替换被引诱者与被压迫者的后现代分野。

被引诱者是那些有资源参与消费主义的人,他们不考虑无止境的自我建构所需要的持续性。被引诱者认为,消费主义可以为那些认为只有制约生活的其他领域或者经常感受压制的人提供自由。尽管充满许多诱惑的市场可以为消费者既提供自由,也能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要求,但是,被引诱者也在双重意义上成为市场的奴隶。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被引诱者的消费及其寻求自我构建的新资源推动了消费社会的资本再生产。

作为被压迫者的新穷人“不是消费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消费对于资本的顺利再生产来说无关紧要。因此,他们不是消费社会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受到压制、管束、权威和法规的联合训诫。”<sup>②</sup>正因为新穷人和消费再生产无关,所以,社会系统主要的关注点是把他们剔除出市场,唯恐他们的在场会使被引诱者参与自我构建的商品和实践贬值,因此就把新穷人的

---

<sup>②</sup> 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生活减低到一种维持生计的水平。

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推断，新穷人是否能像现代的无产者那样把贫穷转变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呢？在鲍曼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无法类似于无产者一样凝集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实践政党，原因有三：

第一，人类的境况不可能由其历史来决定，不可能从历史车轮碾过的痕迹来判断其未来前进的方向，而且也不是按照发展阶段来划分人类存在的类型。因为，即使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某种事物一直处于某种状态，也不意味着它将会继续保持这样状态。历史发展本身并没有规律性，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是通向许多不同未来的链接点，人类自身也无法重演历史，因此，“人类社会总是处于十字路口上”。<sup>②④</sup>

第二，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人类尊严的影响不同。新穷人也需要寻求确定性的保障，所以，市场对他们也有诱惑力，尽管他们没有被诱惑的能力。围绕着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现代政治导致阶级冲突和憎恨阶级的人格化，而消费社会则不同。新穷人并不想消除市场的诱惑，他们也希望加入其中。正如鲍曼所言，“富人不是敌人，是榜样。不是憎恨的对象，是偶像。”<sup>②⑤</sup>新穷人能够在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中成功勾画出自我构建的过程。由于被压迫的新穷人无法在消费主义中成功，只能把自己体验为有缺陷和不充分的人，因而在经验上就独自承担了自己失败的责

---

<sup>②④</sup> 齐格蒙特·鲍曼：《自由》，杨光、蒋焕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sup>②⑤</sup> 鲍曼、泰斯特：《与鲍曼对话》，杨淑娇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31页。

任；当代的教育理念和体制都强调对人的驯化，并宣称，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只是由于个人没有掌握先进的技能和文化知识，而不是结构性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安排的矛盾所造成的。这样，新穷人就无法看到，他们个人的困境是指桑是与更为广泛的公共议题紧密结合的；消费主义的尝试使他们无法相互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人都试图证明自己更有能力获得资源的机会，而不是力图把个人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议题并通过公共手段解决。

第三，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无法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从而来武装成对抗富人的阶级。这主要是因为，在消费社会，知识分子与新穷人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在民族国家的秩序设计日渐成熟的18、19世纪，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丧失与权力共生的身份，并日益为国家权力所抛弃，也被剥夺了在社会生产中的独立身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扮演“阐释者”的角色，但另一部分人却不甘心于此，力图寻求一个可以改造和结盟的强大的阶级来继续发挥“立法者”的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作为无产者的产业工人最具有组织性和战斗精神，因此最接近知识分子需要的理想形象。工人赋予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力量，而组织和支配这种力量的权力以及把工人从自在阶级转变成为自为阶级的策略则为知识分子所有，两者的互补性就是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结盟的基础。驱动知识分子视自己为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处于他们对新穷人和社会疾苦的强烈同情和人文关怀。然而，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对工人阶级失去兴趣。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劳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工人被剥夺了作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的角色。所以，鲍曼在这点上与奥菲和哈贝马斯一样，不再认为新穷人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政治上也没有发言权，他们需要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怜悯，但却不适

于训练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伴随着现代性政治秩序的解构，革命终结了。

### 三、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sup>②⑥</sup>的幻象

民族国家的式微和消费社会的浮现表明，民族、自治的社会组织和家庭等传统意义上的社群正丧失殆尽，而温馨安全的社群都是孤独而焦虑的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认同情节。因此，社群主义只是人们在用完全的消费自由之后陷入孤独和不稳定状态中的一种幻象，是自由与安全失衡的一种心理反应。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对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兴起一股“社群主义”的研究热潮提出了批判性的解释，在鲍曼看来，社群主义尽管试图用以平衡和抗击现代以来强势而有缺陷的自由主义，但它并不是治疗自由主义内在缺憾的良药，双方都无法消除当前消费社会中的伦理困境的根源。

19

---

<sup>②⑥</sup> 学术界习惯把“communitarianism”译为“社群主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把“community”译作“共同体”，在特殊情况下，还译作“社群”。在英语中，“community”兼有“共同体”和“社群”两层涵义。“共同体”可以指很大型的社会，比如“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甚至可以指不在一个地域空间内的“文化共同体”和“学术共同体”；而“社群”则有更强的群居的空间涵义和更强的共同群体价值的涵义，“社群主义尤为强调群居的空间和更强的共同体群体价值。”我国学者欧阳景根将鲍曼2001年出版的著作 *community* 译为《共同体》，并给出了为何如此翻译的解释。（参见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的译者注。）但在本文中，笔者依然将政治哲学研究的经典表述，在下文的引用中，将中文译著中的所有的“共同体主义”都统一转译为“社群主义”。



## (一) 共同体的定位

鲍曼对社群主义的批判源自他对共同体的定位。他对共同体的内涵、外延、性质、特征与变迁都有较为详尽的解释,并指出,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共同体有着强调的追求和向往,其症结在于,传统和现代意义上认同载体和方式在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下已经分崩离析,但是新的归属和认同还未形成。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分析指出,社群(共同体)这个词的复杂性与历史过程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思潮复杂的互动有关:一方面,它具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意涵;另一方面,它意指各种不同行事的共同组织。社群(共同体)可能是充满感情、具有说服力的词,用来描述一组现存的关系,或者是另一组的关系。也许最重要的是:不像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的词汇(如国家、社会等),社群(共同体)似乎从来没有负面的意涵,并且不会被赋予明确的反对意涵或具区别性的意涵。<sup>⑦</sup>

与威廉斯一样,鲍曼也认为社群是一个褒义词,总是传递出一种令人愉悦和向往的含义,意味着怀念一种传统的美好生活,或渴望追求重新拥有一个团结和谐的世界。社群总是代表一个温馨而舒适的场所,在那里的人们相互友好、熟悉而安全,而且还相互依赖和信任对方。那么,其缘由何在?在鲍曼看来,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致力于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但却一直遵循“丛林法则”的残酷无情和争强好胜。这使拥有自由的人们丧失了“礼仪社会”中相互间的亲密关系、信任和

---

<sup>⑦</sup>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1页。

安全。正是因为现实和非共同体的残酷，以及仇视现实的共同体，与“想象的共同体”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鲍曼遗憾地指出，“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和渴望的价值，它们可以或好或坏地得到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没有矛盾和冲突。”<sup>②</sup>

鲍曼还分析了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的解释，以此探讨共同体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在滕尼斯那里，共同体与社会（礼仪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区别在于，它所有成员有着共同的理解和意义，而这种共同的理解不是哈贝马斯所指的共识。也就是说，不是思想见解根本不同的人们经过艰难的谈判协商后达成的一致。共同体依赖的相互理解是所有和谐相处的起点，是一种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情感和人们真实意愿的自然表达。鲍曼指出，既然共同体意味着一种共同理解，本身是没有感情的自然存在物，那么，一旦人为地夸大它的温馨和纯洁之美或贬低其存在的价值，就意味着共同体濒临消亡，而且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可能再还原。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过于凸显自由的解放，传统共同体就必然遭到质疑和摈弃。既然现代性演化的进程是以自由来换取确定性保障，那么如何继续使生活具有确定性呢？

在鲍曼看来，“身份认同”正是因为共同体的瓦解才得以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史可以视为人们重新建构身份认同的历史。现代国家的成就在于成功运用民族主义

---

<sup>②</sup>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曲，第6-7页。

和工业主义两条途径破坏和取代一切的前现代共同体形式,以民族和工厂来满足人们的新身份认同,并为之提供物质和精神的确定性框架,力图以此解放个体自由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当前全球化的冲击下,不仅民族国家的衰微使人们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消费主义的主导地位又使人们陷入不确定的状态中,使人们对身份认同的追求和对共同体的想象更加强烈。

晚近几十年来,资本全球化正在消解现代性所构建的固有结构,全球性的消费自由不仅消融了民族国家的认同,使“单景监狱”逐渐取代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控模式的统治地位,而且使抛弃一切共同体形式的个体化消费取代了生产的中心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所有人的民族团结、地域联系、共同体感情持续弱化,甚至个人的自我认同的各种理念都彼此冲突。对于全球化精英来说,共同体是一种负担。行动自由度的标准以及维护自我价值、荣誉和尊严的方式是成功脱离固定空间的共同体形式,所以,他们仇视共同体,认为任何社群主义都是为了同情弱者。在鲍曼看来,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共同体绝不是痛苦和不幸,反而是社会失范的征兆和原因。<sup>②</sup>鲍曼认为,全球精英所认可的共同体只是“衣帽间式的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y)和“表演会式的共同体”(carnival community)。前者是指通过公开展示吸引毫不相干的个体兴趣,后者是为那些孤独、焦虑不安和厌倦的个体提供暂时的喘息和缓解,但它们都是流动现代性景观中的特点,而不足以形成稳定的认同。

对于那些被消费者市场所排斥的穷人来说,共同体是一种

---

<sup>②</sup>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3页。

歧视自由的隔离区。当国家失去其保障民众的绝对主权时，社会也无法成为个体依赖的场所，相反，它以别无选择的不确定性为理由，告诫个体要发挥自己的才智和资源去寻求和改善有尊严的安全生活。因此，人们当前所追求的共同体就意味着消除他者的同一性。“安全的居民共同体”成为首要目标，而封闭、限制和同质性构成其三要素。

在鲍曼看来，只有两种共同体是用来指代自我限定的实体认同，即生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他进而在《共同体》一书的结尾处指出，“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互相的、共同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sup>③①</sup>

## （二）社群主义的片面性

23

伴随着西方的对共同体怀旧的“乡愁”，学术界亦在近30年间兴起了一阵足以同自由主义分庭抗争的“社群主义”政治学者研究思潮。传统的政治哲学流派研究认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太尔、桑德尔和沃尔泽。

在社群主义这一政治哲学流派内部，各思想家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渊源，以及这里点的不同决定了其间复杂的异质性，但其相似的结论都归结于，强调共同体的整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做出了归纳，认为存在三种共同体关系：第一种是手段型共同体，即“基于个人主义

---

<sup>③①</sup>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的假设,即认为主体的自利动机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解释以完全工具性的方式来设想共同体……个体视社会安排为必要的负担,仅仅视为了私人目的才进行合作。”第二种是情感型共同体,“假设合作主体在先的个体性,主题的实质动机包括仁慈的目的,而且在于情感纽带和动机的品质,这种品质也介入合作,并在合作中得以提升。”第三种为构成性共同体,此种共同体强调自我表现出超越自私和情感纽带的假设,而且存在主体的自我理解和认同,“按照这种观点,说社会成员被共同体意识约束,并不只是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承认共同体的感情,都追求共同体的目的,而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规定。……共同体不是选择的而是依附的,不是一种属性而是其身份的构成成分。”<sup>①</sup>

其中,桑德尔主张的是手段型的共同体,因为他源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假设,从个体权利出发来阐明善优先于权利,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与罗尔斯争论的关键不是在于权利是否重要,不是个体与共同体的要求更优,而是在于权利是否能用一种不以任何特殊善的生活观念为前提条件来确认和证明,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是否不干预公民作信奉的道德和宗教权利。<sup>②</sup>

与桑德尔等人不同的是,鲍曼指出的是共同体内在的片面性,在此基础上,他对社群主义及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正义提出质疑,并认为前者以确定性的认同为核心来对抗后者强调的自

---

<sup>①</sup> 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82页。

<sup>②</sup> 同上,第2页。

由,这永远难以和解,难以平衡和满足人们自身对自由和确定性的双重需求。鲍曼指出,西方学术界对于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任何调停都只是为了掩盖争端和实质,自由主义所尊重的差异是外在于人类个体的,是取决于选择各种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社群主义者主张的差异是指,拒绝或没有能力把其他生活形式视为选择。简言之,前者的差异代表了自由选择后者代表了敢于和限制个体自由选择权的群体力量。因此,两者的侧重点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现代条件下所构建和宣扬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社群主义总是以传统共同体作为立足点,认为所有这样群体的永存都依赖于其成员主动忠诚的程度,这就意味这一种选择优先于所有其他选择,从而压制了其他自由选择的权力。<sup>③</sup>

鲍曼认为,社群主义的悖论一开始就困扰着民族主义,理由是没有形成国家的民族只是竞争选择之一,其存在的意义因需要取决于成员的忠诚度,从而时刻感受到不确定性。相反,民族国家可以通过集中暴力为忠诚立法,并预先决定自由选择的结果,通过法律和秩序力量、文化传统的规范等因素来维系民族的确性。然而,当现代国家出现危机之时,原本受到民族国家诽谤和排挤的自然共同体则被认为是“人类选择的简化(streamlining)、非随机化(derandomization)和意义化(meaning-saturating)这三个过程可靠的决策者;他们满怀希望地去做出民族国家未能做出的人类选择。”<sup>④</sup>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充分的消费

---

<sup>③</sup>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郁建立、李静韬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sup>④</sup> 同上，第235页。

自由与令人神往的确定性之间,深受不确定性煎熬的个体都向往温馨稳定的共同体,他们试图以此能在享乐自由的同时规避自由所产生的风险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社群主义风行一时的原因所在。

此外,鲍曼还从应对认同危机来比较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力图以此表明两者都无法解除当前的认同危机。对于一种美好而成熟的人类存在而言,选择的自由和为归属所提供的安全都是均等的、必不可少的价值。但这两种亦是形态都同样明确或隐含地珍视一种价值而压制另一种价值。一种纯粹的理论 and 鲜明的政治立场都不可能取得真实的认同。

鲍曼因此得出结论,社群主义并不是治疗自由主义内在缺陷的良药,其矛盾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任何策略能解决它,况且,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虚假意识的表现,双方都是片面性的追求和突兀确定性或自由。

### (三) 多元文化主义的误区

社群主义无法解决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问题,作为社群主义之一重要表现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何在如今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如此受欢迎,其最明显的误区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盛行,鲍曼在揭露社群主义片面性的同时,也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误区。

鲍曼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是近来由制造舆论的有识阶层给出的解决这个世界关于各种价值准则以及方向的不确定性的最普通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正在迅速变成“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准则;甚至变成了一条再也不需要被理解的公理,变成了所有进一步的深思熟虑的引言,变成了信念的

基石。<sup>⑤</sup>进而，鲍曼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的误导性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差异和宽容不一定能推动人类的团结和进步。鲍曼指出，对差异的承认有两种相反的取向：积极的承认和消极的承认。积极的承认才能认同差异的内在价值并且尊重差异的承受者。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承认只是文化交流、协商和共识的起点，而非结束。“它只是一个漫长的也许还是艰苦曲折的、但最终又是有益的政治过程的起点。”<sup>⑥</sup>相反，消极的承认表现为对他者漠不关心。尽管公共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彼此共同存在，但几乎没有相互交流。同时，所有差异的本身就是目的，都是无法消融和对话的，只可能带来文化之间的隔离、甚至文化的战争。鲍曼担心，这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泛滥。因此，对差异的承认要同时反对两种极端：一是反对文化战争和压迫性的同质化；二是反对一味夸大和无情漠视分离和差异性。

其次，对多元文化的推崇有可能滑向封闭性的多元社群主义，无法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鲍曼对全球文化的全球性做出区分，认为文化的全球性是地方化生活在世界范围的认同和展示，并通过地方各种共同体传统之间在世界范围的认同和展示，并通过地方各种共同体传统之间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沟通来实现和维系相互的理解和彼此的宽容。其结果是所有的文化创造最后都致力于人类文明共同的财产；全球文化则与全球经济和

---

<sup>⑤</sup>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sup>⑥</sup> 同上，第169页。



全球政治一样,意味着世界的一体化、同质化和单一化。同理,文化的多样性与多样性的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与多元共同体主义政策之间的选择也是如此。文化的独特性并不会妨碍、甚至取消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多元文化主义必须坚守着讲自由当成最首要的价值,才能排除多元共同体主义。换言之,只有当多元社群主义被拒绝和被抵制时,“多元文化的社会”才成为可能。<sup>①7</sup>因此,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如果不从全球视野来分析和理解,其解决的途径也难以实现,只能导致文化之间的争端和诋毁。

第三是可能煽动民族主义的复兴,纵容原教旨主义的泛滥。在鲍曼看来,多元文化主义的流动在客观上助长了欧洲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在一些本来认为一百多年前就解决了民族问题的地方,各种寻求共同体认同、自主或独立的运动正风起云涌,而这一般都被错误地表述为“民族主义的复兴”。

因此,对鲍曼而言,实现一种积极的多元文化主义,其条件只可能是,从人性的普遍认同出发,让每个个体成为其自身自由存在的行动主体,尤其是提升弱者的权利和公民身份,从而通过宽容差异来达成人类社会的团结。

---

<sup>①7</sup> 郑莉:《理解鲍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89页。

## 第一版导言

穷人总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从大众的智慧中便可知晓这点。穷人如何成为穷人,如何被视为穷人,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和被  
视为穷人,取决于我们——这些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  
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和其他人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这一难题,在普通大众的智慧来讲是难以自信地回答的。

这是个令人遗憾的疏漏:不仅仅因为穷人需要且值得我们投以所有的关注,还因为穷人的形象其实是隐藏的我们自己的恐惧和焦虑的投射,我们仔细考量这样做的方式,或许会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状况的许多重要事情。因此,本书欲尝试回答这些“如何”的问题,并讲述在当代穷人的故事里那些常被忽视、过度解读或者是刻意隐藏的部分。在尝试寻找答案的时候,或许能够增添一些我们的自我认知。

穷人总是与我们同在,但是穷人意味着什么,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是怎样的人。在一个需要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成年人都要投入生产劳动的社会,和一个由于数个世纪的劳动而积累了巨大的力量,因此生产任何事物都不需要庞大的和正在增加的社会成员的参与的社会,穷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在一个到处都是生产者或就业者的社会里,穷人是一回事;在一个消费者居多的社会里,穷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这样的社

会里,生活的规划是以消费者的选择,而不是以劳动、专业技能或者工作而建立的。如果说“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于失业,那么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的困境。这一差异的确会对正在经历的贫困生活,和脱离这种悲惨状况的机会与期许造成差别。

本书尝试追溯发生在当代历史中的这一改变,并详尽说明这一改变所造成的后果。在探寻的过程中,本书也试图发现,那些被牢记的,几经测试的,用以击退日益加深的贫困,和减轻因贫困而带来的痛苦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或者不适合)掌控并解决以当前面貌呈现的贫困问题。

本书第一章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这一伦理从当今时代开始被期望能够吸引穷人进行规律的工厂劳动,能够消除贫穷,确保社会安定——毕其功于一役。在实践中,工作伦理用以培训与规训人们,把新的工厂制度所必需的服从灌输给他们。

第二章中讲述的是关于现代社会从早期到晚期阶段,渐进而又残酷的过程:从一个“生产者的社会”到一个“消费者的社会”,相应的,从由工作伦理所主导的社会到由消费美学所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为主导的社会里,大批量生产并不需要任何更多的大批量的劳动,因此,曾经作为“劳动后备军”的穷人,被重新估价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并没有给穷人有用的社会功能——不论是实际上还是潜在的——并且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他们改善这一地位的机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兴起与衰落,表明了以上章节中所描述的转变,支持个人的不幸是集体责任的公众一致性的凸显与当前反对这项原则的共识的突然出现之间的密切关联。

第四章的内容,关乎上述内容的结果:穷人被社会化生产以

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径。最近一个时髦的概念是“下流社会”(underclass),这一概念被仔细审查,并被发现它是作为一个“权力支持”工具。

最后,本书提及穷人与贫穷可能的未来,也提到了赋予工作伦理一个新意义的可能性,使其与发达社会的既有条件更加相符。贫穷能够用普遍公认的方法来对抗和征服吗?能够在已经不存在的社会中加以估量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寻找新的方法,比如说,生活的权力与劳动力贩卖之间的“退耦”<sup>①</sup>,还是把社会认可的工作概念的外延,扩大到劳动力市场之外?面对这些问题,努力寻找实际的解决办法,到底有多么紧迫?

---

<sup>①</sup> 电力学术语,指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 工作的意义：创制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是什么？简言之，工作伦理是一项戒律，其附带两项坦言不讳的前提，和两个心照不宣的预设。

第一项前提是：人类为了获得生存与快乐所必需的事物，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值得为此支付报酬的事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都是要交换的，“以牙还牙”；为了获取，你必须先给予。

第二项前提是：满足于一个人所获得的事物且安于拥有较少而不是更多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像是道德上的闹剧，并且愚蠢至极；一旦已经获得的看似令人满意，就停止发展自我，停止继续奋斗，这是毫无价值和不合理的做法；除非是为了汲取力量做更多的工作，否则休息就是有失尊严的事情。换句话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项高贵并且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工作所能带来的那些你确实没有，或者你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就是好事，而不工作，是种罪恶。

如果没有这个心照不宣的预设，这些前提和戒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如此这般显见，而这个预设是，大多数人拥有可出售



的工作能力,而且通过出售这一能力能够维持生活,并能够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他们渴望得到的;无论他们拥有什么,都是对于过去的工作和继续工作的意愿的奖赏。工作是所有人类的普遍状态;而不工作则是反常的。大多数人在履行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与那些有工作能力却因为种种理由没有工作的他者来分享他们所得的利益或是好处,这对他们而言有失公允。

另一项心照不宣的预设是:只有被他者承认其价值的劳动——可以要求薪水和工资的劳动,可以用来买卖的劳动——才具有工作伦理所认可的道德价值。这尽管简单,在我们这个被以“现代性”命名的社会类别中,却是对工作伦理在历史上所假定的形式的概述。

无论你何时听到人们谈论有关伦理的话题,你应该确信,某处的某人对他人行动的方式感到不满,并且希望他人能够采用不同的方式。这种提供建议的方式很难较工作伦理起到更大的作用。

自从工作伦理在工业化的早期突然进入欧洲人的意识中,在现代性与“现代化”交缠的进程中,其呈现多种具体化的样貌,工作伦理像是嘹亮的号角被政治家、哲学家和布道者使用或者是当成一个理由,以便他们不择手段地根除那些被视为首要的障碍,这些障碍是大众的习俗,有碍于他们勇敢建立新世界的意图:据传是广为流传的尽可能避免工厂雇佣这一明显庇佑的倾向,并且拒绝顺从由领班、时钟和机器所设定的生活节奏。

在工作伦理成为公众争论的时候,其意欲抗争、毁坏和根除的一种病态和危险的习惯,是植根于人类的传统倾向中,即认为个人的自我需要是被给予的,并且不去渴望除了自我满足之外

的更多的东西。一旦这种习惯上的需要得到满足，“传统主义”工人便找不到继续工作的理由，或者去赚取更多的钱；究竟为何要工作？有那么多其他的有趣且体面的事情去做，这些事情不能用钱获得，但是如果一个人从黎明到黄昏只顾追逐金钱的话就会忽略、轻视和失去这些事情。这种体面生活的门槛被设置得很低，被固着并禁止跨越，一旦迈过这一门槛，就会失去继续高攀的驱动力。至少，这就是那时的企业家、意识到麻烦的经济学家和热切改善情况的道德布道者描绘出的图景。

历史的记忆被妥善保管，历史由胜利者撰写。难怪这幅合成的图景会被列入历史叙述的经典准则中，成为现代理性的先驱发起并且获得胜利的，对抗大众拒绝进步的勇敢战役的官方记录，这些大众没有理性、无知、毫无理由并且完全不可宽恕。根据记录，这一战争的赌注是使盲人见到光明，迫使愚蠢和智力迟钝的人运用智慧，并且教导人们如何期冀更好的生活，渴望新鲜和更好的事物，怎样通过期待他们自我改善，成为更好的人。或者，如果有需要的话，迫使反叛者表现得似乎他们也有这种渴望一样。

结果，事件的真正进展，完全和早期企业家在他们对无能迟缓的工人的抱怨中所暗示的相反，而且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后来所验证的历史事实相反。事实上，这是造成“工作伦理”所假定的，工匠与其工作之间亲密关系瓦解的工厂系统的出现。被作为揭开工作伦理序幕而战的道德十字军（或是作为“表现原则”应用的培训）事实上是试图使前工业社会的态度在使其失去意义的新的条件下基本复苏。道德十字军旨在工厂内部，在雇主控制的规训下，重造一心一意、专注的工匠，并做出“完美的”工作表现，这些是工匠们一旦可以自己控制他们的工作，

就自然表现出的态度。

## 驱策人们去工作

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抱怨说：“我们几乎徒劳无功地发现，工人阶级总的来说无法实现优工优酬这一公正荣耀，其原因主要在于，所有的努力在服务的形态上，都试图获得更多而回报更少。”对于工匠到工人的转换，以及市场的非情感性、成本效应的理性转化，他表示了一种哀叹，这些转化对于前现代的工人技艺的本能来说，其残余的属性逐渐衰减。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着该语境中工作伦理的这种吸引力，同时也使得雇主更倾向于让雇工更疏离市场理性，而这对工人投入自身的工作来说具有一种破坏作用。在这种工作伦理的遮掩之下，有一种规训的伦理得到张扬：不用理会荣誉和荣耀，理性和目的——只管努力工作，日复一日，分秒必争，尽管你并不能看到自己这种工作节奏的意义和原因，也无法解释自己这种努力的意义何在。

现代化先驱们所遭遇的真正问题，是需要迫使过去习惯于设定自己的工作目标、控制工作进程、从而获得意义的那些人，运用他们的技术与劳动能力去执行那些由其他人设定和控制，因此对操作者而言缺乏意义的任务。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机械地训练劳工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服从，同时对做得很好的工作不感到自豪，并且习惯于从事没有意义的任务。正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论述的，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是人类部件：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中没有灵魂的小齿轮。这场战役是为了对抗其他没有用处的“人类部件”——与生产努力无关，

并且对生产中所雇佣的其他部件产生不必要干扰的人类利益和野心。基本上，工作伦理是对自由的放弃。

伪装成“工作伦理”的道德布道对于那些最终接受改造运动的人而言，真正的意义，在一位匿名织袜商 1806 年的陈述中，有着生动的描写：

我发现人类对于任何规律性的时间和习惯有着极度的厌恶……他们自己非常不满，因为他们无法如其所愿的随意进出，任意放假，并且继续以他们一贯的方式行事；工作结束之后，还遭到其他工人居心叵测的观察，到了痛恶整个系统的地步，而我则不得不停顿下来。<sup>①</sup>

不论何种意图与目的，工作伦理的改造运动都是一场控制与降伏的战役。除了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底的权力斗争，以工作生活具有高贵的伦理为名义，强迫工作者接受一种既不尊贵、又不能与自己的道德价值相匹配的生活。

改造运动的另一目的，则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因而有意义的事情完全割裂；把工作本身和工作过去可能提供的可以感知和理解的目的割裂开。如果工作伦理可以完全由生活的逻辑来推动和吸收，就会用“走过场”取代一切其他人类活动，例如反省、评价、选择以及目标设定。此外，这种敷衍并非由个人的节奏主导。难怪那些对日益重要的现代性的批评，会以保存他们认定的真正的人类价值为名义，支持“懒惰的

---

<sup>①</sup> 引自 S. Pollard, (1963) *Factory disciplin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16:254 - 271。

权利”。

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会将生产努力从人类的需求中分割开来;这也是历史上首次“能够做到什么”比“需要做些什么”获得优先权。这使得人类需要的满足,与为生产付出努力的逻辑,以及最重要的是这种努力的限度,毫不相干;这有可能造成“为成长而成长”的现代矛盾。

……引进机器与大型组织的后果之一,便是工人服从于令人疲乏的机械与管理条例。部分生产的早期进程,给工人提供了真正的机会,得以让其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个性,甚至有些还容许体现让他们感到愉悦的艺术概念……《伯明翰暴动实录》(*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Riots of Birmingham (1799)*)的匿名作者解释了工人为何参加暴动,指出他们的雇佣本质乃是“只被教会动作,并非思考”。<sup>②</sup>

哈蒙德夫妇(J. L. and Barbara Hammonds)在其总结中尖锐地写道:

除了那种奴隶主所期望于奴隶的道德准则之外,上层阶级不允许劳动者有任何道德准则。工人必须要勤勉而专心,不要想到自己,只对主人忠诚,并依附主人,明白自己在国家经济里的适当地位,就如奴隶在蔗糖种植园经济中的地位。我们会用来称赞一个人的美德,

---

<sup>②</sup> W. Bowden, (1925) *Industrial Society in Engl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pp. 274 - 275.

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了恶行。<sup>③</sup>

事实上,在那些平静且不假思索,规劝服从于不涉私人、缺乏人性和机械化节奏的训道词中,令人不解地把一种本质上是前工业与反现代的奴隶经济心态,和那种在美妙、奇迹般丰富的世界里才有的大胆视野混杂在一起。这个新世界是在传统习惯所形成的羁绊被打破之时,随着人类的发明,最重要的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必然会出现的。

正如沃尔夫·雷彭尼斯(Wolf Lepenies)所观察到的,17世纪末以来,谈论“自然”(也就是指,所有已经由上帝创造而塑造完成的事物,“既存的”,且未经过人类理性与技能处理和触碰的事物)的语言充满了军事概念和隐喻。<sup>④</sup>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没有给想象留下任何空间:自然就应当被征服,并且被设置为努力工作的角色,一旦自然可以提供给人类利益和舒适,这比将自然置于不顾要好得多。笛卡尔(Descartes)把理性的进步比作一连串对抗自然的胜利战争,而狄德罗(Diderot)则呼吁实践家和理论家,以征服和控制自然之名联合起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把历史的进步界定为:人类不可抵挡地朝主宰自然的方向迈进。无论他们和圣西门(Claude Saint-Simon)或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之间有什么意见分

---

<sup>③</sup> J. L. Hammonds and B. Hammonds, (1966) *The Town Labourer 1760—1830* (first published in 1917). London: Longman, p. 307.

<sup>④</sup> W. Lepenies, (1986) *Historisierung der Natur and Entmoral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in A. Peisl and A. Mohler (des) *Natur und Geschichte*, wol. 7. Munich: Schriften der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 pp. 263 - 288.

歧,在这一点上却没有任何异议。

一旦这一终极目标确定,实际工作所产生的唯一意义,便是缩短人类和彻底征服自然之间的距离。其他的权威标准则可以成功地予以辩驳,使之逐渐且不可逆转地失去效用。在逐渐遭受抛弃的评价标准里,首当其冲的是怜悯、同情和关照等行为准则。怜悯受害者会削弱决心,让富有同情心的人放慢变迁的步调,而任何停滞或缓慢的进步,都不合乎道德。另一方面,只要是能够促进最终征服自然的事物,都是好的,而且“归根到底”都符合伦理,“从长远看来”也有助于人类的改善。工匠捍卫他们的传统权利,前工业时期穷人抗拒机械化工作的理性、效力与效率体制,都被视为是陷入麻木茫然的自然放置在进步之路上的另一项阻碍,企图拖延注定的失败。就像自然那些已经遭破坏、揭穿和解除,或索性扫到道路旁的计谋一样,这种抵抗也会被毫不在乎地予以突破。

42

运用人类智慧和经验所建造的通往光荣世界的引路明灯——机械的设计者,以及使用机器的先驱——从未怀疑进步的真正带动者,是发明者的创造性思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于1785年争辩道,所有其他人的体力操作,是实现发明者理念的必要条件,但“只能被视为可运作的机械力……他们几乎不需要使用理性”。<sup>⑤</sup>然而,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则抱怨道:

训练人类“放弃散漫的工作习惯,并且让他们与复杂的自动机械一成不变的规律相协调”相当困难。若要

---

<sup>⑤</sup> B. Inglis, (1971) *povert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p. 75.

有效地运转这个复杂的自动机械，就要持续有人看管；而很少有乡下的男女喜欢一天花上十几个小时，关在工厂里看管机器。

这种抗拒加入人类步调一致的工作本身就经常被引作证据，证明穷人的道德松懈，以及强硬严格、不打折扣的工厂纪律的道德优点。驱使穷人和“自愿懒散”的人工作，不仅是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道德任务。当时那些开明的意见，即使彼此在所有其他方面有所不同，在这点上却没有什麼争议。《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写道“主人对劳工的影响，本身就是朝道德提升的方向迈进了一步”，<sup>⑥</sup>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则尖酸地对正在进行的文化改造运动提出批评：

新慈善计划的构想，并非来自“慈善”精神……被尊崇为新道德秩序的开端……在这个新秩序里，拥有财产者重新获得了像父亲般照顾那些不幸者的地位……但不是消灭贫穷——几乎没人把这当成是个好主意——而是消除罪恶行径、匮乏，以及身体上的不幸等更为绝望的形式。<sup>⑦</sup>

盖斯凯尔(P. Gaskell)是位作家，并且是个社会行动家，历史上流传他是穷人朋友中最具慈爱精神、热心肠，且富有同情心的一人，即使如此，他仍相信他所同情的对象“与自

---

<sup>⑥</sup> Revolt of the workers, *Blackwood's Magazine*, vol. 52 (1842): 646 - 647.

<sup>⑦</sup> The claim of labour, *Edinburgh Review*, vol. 81 (1845): 304 - 305.



自然界中没有受过文明教化的孩子,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sup>⑧</sup>而且他们需要其他比较成熟的人,来注意他们的言行,并替他们的行动负责。持学究观点的人都同意,目前或未来的劳动者无法自行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自治和分辨好坏、何者有益、何者有害的能力,同那些愚蠢、没规矩的孩子差不多,更别说是知道什么东西在未来“对他们有利”了。他们只不过是待加工处理,捏塑成正确形状的人类原料;未来至少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们注定只能够是位居在接受社会变迁的末端,是人类社会持续进行的理性翻修的客体,而非主体。工作伦理是全面性道德/教育议程上的关键项目之一,而其为思想家和行动者所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颂扬现代启航者称为“文明化”历程的核心。

就像任何其他合宜、高尚、值得称赞的行为伦理准则一样,工作伦理同时是一种建构性的视野,也是重塑破坏性工作的处方。工作伦理否定了伦理改造运动所针对的那些人原本享有的习惯、偏好或欲望。它描绘出正确行为的模式,但最主要的是它不信任那些被指定要接受训练的人,在未经教导和强迫的状况下可能会做的一切事情。不能信任这些人的倾向;如果让他们随心所欲而为,全凭自己的奇想和癖好,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努力奋斗,宁愿在污秽里蹒跚也不愿关注自我改善,把暂时的、转瞬即逝的消遣放在较为长远但稳定的快乐之上,总而言之他们喜欢什么都不做,胜过去工作。所有这些病态的、没有节制的冲动,都是“传统”的一部分,是逐渐兴起的工业必须勇敢面对、斗

---

<sup>⑧</sup> P. Gaskell, ([ 1836 ] 1968) *Artisans and Machinery*. London: Frank Cass p. 78.

争,最后予以消灭的目标。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试图指出的,回顾过去已经做过的工作,工作伦理“形同一种对一般工人的传统主义的攻击”(见米歇尔·罗斯的恰当总结),这些工人“依据一种固定的物质需要的想象去做事,这种想象使他们偏爱休闲,而自愿放弃只要工作得更辛苦更久,就能增加收入的机会”。传统主义“遭到了贬抑”。<sup>⑨</sup>

的确,对现代性新世界的先驱而言,“传统”是个令人感到沮丧的词。传统代表了工作伦理要奋起对抗的,在道德上可耻并且应当受到责难的倾向:安于习惯的人类有着以昨天所拥有的来衡量今天要做多少事的倾向,也有着逃避“得到更多”和忽视更好的生活的倾向,如果得到这些需要付出许多额外的努力(其实,要变得更好,就必须服从于粗糙、残酷、令人困惑且无法理解的陌生体制)。工作伦理对抗的前工业时期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里公开指明的敌人,明显是保守的人类需求(needs),以及低标准的人类欲求(wants)。真正的战役——最猛烈无情的战役——是要对抗打算进入工厂的工人那种不愿意承受这种工作体制里不舒适与无尊严的折磨心态,这种工作体制是他们既不想要、也不了解,而且肯定不是自愿选择的。

45

## 工作或者死亡

工作伦理意欲一石二鸟:解决蓬勃发展的工业所需的劳动力供应问题,并且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让人头疼的

---

<sup>⑨</sup> 参见 M. Rose, (1985) *Re-working the Work Ethic: Economic Values and Socio-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B. T. Batsford, p. 30.

麻烦事——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的改变,在新的条件下不能维持生存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被安装在工厂工作的流水线上;还有那些老弱病残者,勿用多想,他们也无法适合工业雇佣的严格的要求。布莱恩·英格利斯(Brian Inglis)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无论穷人是否归咎于他们的条件,穷人是可以被消费的。如果有任何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穷人,不给社会造成风险,李嘉图(Ricardo)和马尔萨斯(Malthus)一定会大力推荐,政府也会高度重视,前提是必须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sup>⑩</sup>

46

但是,并没有这种“简单的消除穷人”的方法可以使用,另外,在这种方法的空缺之下,需要找到另一种不那么完美的答案。把工作——任何条件下的任何工作——视为唯一得体的,道德上行得通的使人获得生存权利的方法,这种认知历经很久才被找到。没有人能够说出比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他1837年关于民权运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更加直率坦诚的“次佳”策略了:

如果穷人过得悲惨,那么民众中穷人的数量就会下降。这是所有捕鼠人都知道的秘密:堵上谷仓的裂缝,用持续的猫叫、警报、捕鼠陷阱来折磨,你的“被控诉的劳动者”会消失,并逃离这个建筑物。更简洁的方法是使用砒霜;或者如果允许的话,使用更温和的方法。

---

<sup>⑩</sup> B. Inglis, *op cit.*, p. 408.

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她对贫穷进行的有纪念意义的研究中,用下列的说法来分析这种观点:

像老鼠一样,穷人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被消灭,或者至少被驱逐出视线。需要做的就是下决心像对待老鼠那样威胁穷人,并假定“这里的穷人和不幸者只是要被损耗和削减的讨厌的人”。<sup>①</sup>

在致使“民众中穷人减少”的努力中,工作伦理的贡献的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任何由劳动收入所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性。有了这种伦理准则的武装,有着良好愿望的改革者就可以宣告,社会提供给穷人的所有“非赚取”的资助都是“资格缺失”的准则,并认为这种准则是朝一个更人性的社会迈出了具有深远道德意义的一步。“资格缺失”意味着依赖救济而不是工资获得资助的人的条件,一定会让他们们的生活比受雇的劳动者里最穷困、最悲惨的人还缺乏吸引力。被期待的是,没有工作的穷人的生活越是被降格,越是深陷贫穷,对于那些为了换取最微薄的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工作的穷人来说,工作就越有诱惑力,或者至少难以忍受的程度会降低;而正因如此,工作伦理的肇因得到支持,也更接近胜利了。

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考虑,必定曾在19世纪20和30年代“贫穷法”改革者们的思想中盛行,之后,他们经过拖沓且时而尖刻的争辩,做出了一个基本一致的决定,用以限制所有用于贫穷人口(边沁〈Jeremy Bentham〉喜欢称其为“废物”或者是“渣

---

<sup>①</sup> G. Himmelfarb, (1984) *The Ideas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London: Faber & Faber, p. 193.

滓”的人口)的可利用的资助都在救济院内部。就促进所提及的工作伦理的肇因而言,这项决定有几个好处。

首先,它把“真正的穷人”从那些为了避免做单调工作带来的不适而冒名顶替的可疑的人分出来。如果救济院的条件被弄得足够恐怖,除了“真正的穷人”,没有人会选择被限制在救济院里。获得资助的条件是要呆在这样单调又肮脏的救济院里,这也使得“生活状况调查”显得多余了,或者宁可让穷人自我管理:不论是谁同意被限制在救济院里,必须真的除此之外无法生存了。

其次,外界资助的废止使得穷人在决定工作伦理的要求是不是“不适合他们的”,决定他们是不是不能够应付规律的工作的要求,应对工厂工作的严酷,或者许多方面都让人无法忍受的要求与其他选择相比是不是更差之前都会一再考虑;相较之下,甚至在工厂里那收入最微薄、最繁累单调的苦差事都显得可以忍受——甚至令人渴望了。

“新贫穷法”的原则也在那些愿意被革新转化为遵守工作伦理戒律的人和那些完全真正无药可救,无论如何不择手段都挤压不出一点为社会的益处的人之间,划定了一条清晰且“客观”的分界线。

最后,“新贫穷法”守护那些工作的穷人(或者有潜在工作能力)免受毫无指望的懒人的污染,通过巨大且无法穿透的墙壁的帮助,把他们和麻烦分隔开,很快通过无形,但却不缺乏实体的理由被复制成文化疏离之墙。从救济院墙后泄露出的消息越是让人恐怖,工厂劳工的奴役就越是会看起来自由,他们的惨状就越像运气和恩惠。

由前面所叙述的部分可以猜测,要一劳永逸的把“真正的

穷人”从那些仅仅是假装的、开小差的和滥竽充数的人中区分出来，并且从有希望的劳动者中分离出那些无望的人，以免使前者遭受道德病态的污染，这样的做法是永远不会成功的。用“值得的”和“不值得的”这两种合法的区分方法来分类穷人，确实对彼此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却并没有必要到成为改革者宣称的救济院构成的主要原因。

为那些曾经因穷困而被资助的人（或者，如改革者所偏好的表述，“选择”）建立新的，尤其是让人惊讶又冷漠的条件，确实让穷人更容易接受雇佣劳动那令人怀疑的吸引力，并因此防止被懒惰污染这种公开的威胁，但是这却让他们陷入了贫困，且因此对工作伦理曾经得胜的又意欲消除的危害，做出使其不朽的贡献。救济院生活骇人的丑恶担任评估工厂生活质量的参考点，大大减弱了雇主推进雇员承受力的程度，且不用担心他们反抗或者罢工。最终，在那些拥抱工作伦理指导和拒绝这么做的人，或者和那些当尝试拥抱工作伦理，并依照其戒律生活，但却跌倒在路边的人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在早期现代性的道德改革者里，最有洞察力、最持怀疑态度、最愤世嫉俗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这种理论上精美的区分穷人的类别视为娱乐的幻象——真正的和假装的——这种区分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策略表述出来。他们也不相信这种策略的分歧，按照资源经济或者以脆弱的伦理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显著的是，边沁并未在“工厂之屋”（houses of industry）之间做出区分：贫民习艺所，救济院和制造厂（关于这点也有监狱、

疯人院、医院和学校)。<sup>⑫</sup>他坚持,无论他们表面的目的如何,他们都面临同一个实际问题且有共同的关注点:他们不得不把一套一致的规则的模式和可预言的行为加诸一群多样化且本质上无法无天的同住一室的人口身上。简单地说,他们必须中和或者去除人类习惯和倾向的多样化,以便这些人获得同一种行为标准。工业工厂的监督者和救济院看守人面临的是同一份工作。为了获得他们所期望的——一种规训的、重复的规矩——两种居住者,“工作的”和“不工作的”穷人一样,都必须服从一样的制度。怪不得,尽管在伦理布道者和改革者的争论中被给予了如此密切的关注并被赋予了关键的重要性,但是这两种类别的人在道德上的差异几乎没有在边沁的论证中出现。毕竟,他的策略的中心是精确提供与所确定的目的毫不相干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没有足够的权能影响结果。

50

由于采用了这种立场,边沁与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圣贤们的话语一致了。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弥尔在不久之后写道,政治经济的兴趣点不在于人类的激情与动机,“除了那些被认为与对财富的渴望相敌对的原则,也就是对劳动的憎恶,和对高价放纵获得短暂享受的渴望”。<sup>⑬</sup>正如所有学者都在找寻经济生活中“客观”的、不受个人情绪影响、意愿上独立的法则一样,边沁把改进新的社会秩序的工作的新教会

---

<sup>⑫</sup> 参见他的“全景监狱”或“监视之屋”,其中包含了各种机构的新营造原则观念,使得任何人可以在其中收到监控,见于 B. Bentham (1843)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 4. Edinburgh: William Tait, pp. 40 - 126。

<sup>⑬</sup> J. S. Mill, ([1836]1967) 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eoper to it, *Collected Works*, vol. IV.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 321.

的装饰物褪去，直褪到工作的硬核（hard core），这种装饰在工作伦理的争论中如此普通，而这一硬核是对日常、规则的行为的一道防卫工事，工事基于由从头到脚的高效监管和帮助的，无条件的规训。他无暇担忧精神的教化和思想的改革；他没有期许在一所类似全景监狱的建筑物里的人们去爱他们的工作（他认为他们对工作无药可医的憎恶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为颂扬工作使人在道德上变得高贵而困扰。如果这些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被收容者打算遵循工作伦理的规则行事，这不能归功于他们道德上的转变，而是因为他们被置于没有选择的境况中，没有可选项的个人表现出来仿佛工作伦理的戒律已经为他们所接受，且毕恭毕敬。边沁没有把希望放到培育选择者的美德上，而是他们面对的选择的简化，或者完全没有选择。在圆形监狱里，不论其是救济院、贫民习艺所还是工厂，“如果一个人不工作，那么从早到晚就不要给他事情做，就让他吃坏了的面包，喝白水，没有人跟他说话……对于他，做到极限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超出极限，就没有必要了。”

工作伦理的推进鼓舞了许多来自教堂布道坛的说教，鼓舞了很多道德小说的著作和主日学校的迅速增长，这些学校尽全力把正确的规则和价值观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去；但是就所有实际的意图和目的而言——正如边沁以其独特的直率和清醒的头脑所揭示的——现在的工人和那些有意要在工厂工作的人们所面临急剧减少的选择压缩了。救济院外部不提供救济的原则是建立“无选择”境况的推动力的证明。同一策略的另一个证明是引入现挣现吃的存在方式——把工资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使劳动力的生存只能维持到第二个工作日的黎明，使另一天



的辛苦工作必要且“别无选择”。

尽管两种权宜之计都蒙受风险，既然最终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都把目标诉求为理性的能力，无论是一个被怎样贬抑的版本：为了有效率，两种方法都需要在接收端有能够思考、计算的人。但是思考可能是把双刃剑；或者说，是在坚实的墙上有道危险的裂缝，麻烦、无法预知和不可计算的因素，比如人类向往有尊严的生活的激情和自我肯定的动机，都会通过这道裂缝从被迫的放逐中爬回来。需要采取额外的保障，且没有什么比对身体的威胁更安全的了。肉体的惩罚，在维持生存的水准下把工资或者食物的供给切断，且首先是持续的、无处不在的监视和对违反规则的言行的立即处罚，无论多么琐碎，这些做法会让穷人的处境更接近无可选择。

52

这使得工作伦理的说教看起来有表里不一的嫌疑。实际上，如果依靠工业生产线上人们的道德完善，则将使扩张他们自由的领域成为必需——这领域是道德自我能够成长，道德责任得以成就的唯一土壤。但是至少在早期的历史上，工作伦理却倾向于减少，或者完全消除选择的余地。

表里不一并非有意而为，也不总是有意识的。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工作伦理的推动者漠视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更别提去假定他们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了。那些被计划和应用的方法的残酷在于，他们被正大光明地看做是道德改革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视为强有力的教化机构和本身就是一项崇高的道德运动。辛苦劳动被称赞为令人向上的经验——一种精神上的提升，这种提升只有通过破釜沉舟去做普通的善事才能获得。如果诱使人们去辛苦工作且使辛苦工作成为他们的习惯，这会

造成他们的痛苦,然而这是为未来的收获所付出的合理代价,不只是为了辛苦工作的生活去获得道德收益。正如基思·麦克莱兰(Keith McClelland)指出的,如果“体力劳动被许多人视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沉重的、强制的”,它“也被看作值得称颂的活动”,<sup>⑭</sup>因为它能给这个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不只由于它会给予工人自身的道德改善。

## 制造生产者

社会倾向于对其自身持有理想化的看法,这将允许其“恪尽职守”:辨识并找出那些疤痕、缺陷和其他毁坏其外表的污点,除此以外又要确保有能够治愈或者抚平这些不足的疗法。去工作——找份职业,有个老板,做那些老板既然准备支付别人报酬,他就一定会认为有用的事情——对那些被质疑而又不得不去证明,却无法用其他的方法来保证他的体面或者人品,这是成为一个体面的人的方法。给所有人工作,并让所有人都成为工人,往往被视为治疗那些由于社会(暂时的,正如其被期许的)的不完备和不成熟而遭受的那些疾病和困苦良方。

在政治序列中,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不曾质疑过工作的历史角色。生活在一个“工业社会”的启蒙意识与转化为工业工人的人口数量必然不会停止增长的那种确信相随,也与工业社会必然会显现一种巨大工厂的最终面目的那种确信相随,在

---

<sup>⑭</sup> K. McClelland, (1987) *Time to work, time to live: some aspects of work and the re-formation of class in Britain, 1850—1880*, in P. Joyce (ed.)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4.

这个工厂里,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男性都将被生产雇佣。普遍就业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的状态,但是代表了即将到来的情形。根据这种状态,没有工作就是作为失业、不正常和破坏常态出现的。“去工作”和“让人去工作”是一对孪生的训词/魔法,以期同时解决人们的麻烦和共有的社会疾病。这些是现代口号,在用于分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性版本的巨大分界两旁回响。受到马克思主义鼓舞的立场,其对抗资本主义的战斗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将要出现的无阶级社会的版本则是各方面都与工厂相像的社会。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古典时代,工作同时是作为整体的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性再生产”)的中枢。

先从个人生活开始。某人所从事的工作提供其生活所需;但是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别,限定了他在与其最直接邻近的范围内,和在那个想象中被称为“社会”的整体中,其所合理期望或者要求的地位。工作是个人的社会方位(placement)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除了那些归功于世袭或者已获得的财富,从而能够将悠闲生活与自给自足结合起来的人,对其余人而言,“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被问者受雇的公司以及在受雇公司中他的能量。在一个以分类和归类为诀窍和喜好而闻名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的分类,与生活有关的一切都以此从其他因素中区分出来。工作类型界定了与某人匹敌的对手,他可以将自己与之相比较并找到自己的定位,比他优秀的人,他可以给予尊敬,比他差劲的人,他有权期望或者要求其服从。工作类型界定了某人应该符合和服从的生活标准,界定了其在社会生活里,应当“不辜负其期望”的那些人,和应当与其划清界限的那些人。工作生涯标识出生命的旅程,并且回顾性

地提供了一个人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和遭受的失败的最初记录；这段生涯，也是自信与犹豫、自满和自责、骄傲及羞耻的首要来源。

换句话说，在这个后传统（post-traditional）的现代社会——这个社会评定和奖励其成员，要依据对他们的选择能力和自我主张责任的假设——对于数目众多，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大多数男性来说，在其长达一生的对于身份的构建和维护上，工作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这项生命规划或许起源于许多雄心，但是他们都被所选择或者被分配的工作类型包围着。工作类型丰富了生活的全部；其不仅决定了与工作进程直接相关的权利和职责，还决定了被期待的生活的水准，家庭、社会生活和休闲的模式，以及礼节和日常事务的标准。工作类型还是一种允许人们几乎不犯错就可以塑造和预测其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独立变量”。一旦工作类型有所决定，职业规划也有所归因，那么其余一切也就尘埃落定，个人就能够相当确定，在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里什么才是要做的。综上所述：工作是主要的定位点，所有其他的生活追求都可以依据这个点作出计划和安排。

就工作伦理在制定社会秩序的规章而论，由于大多数现代社会的男性成员在社会的工业化阶段，把大部分醒着的时间和壮年生命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依据罗杰·苏 [Roger Sue] 的计算，在 1850 年代，用于工作的醒着的时间平均是 70%），<sup>⑮</sup>工作场所是社会集合的主要地点；在这里，对标准的服从和被规训的

---

<sup>⑮</sup> R. Sue, (1994) *Temps et Ordre Social*. Paris: PUF. 苏的计算显示：1850 年以后，平均工作时间有系统地下降了；到了他写作的时候，清醒的时间只有 14% 用于工作。

行为这些必要的习惯被期许加以训练且被吸收,在这里,“社会性格”也会被形成——至少在与一个有序社会永续性的相关方面是如此。除了大规模的征召军队,工厂,这另一项伟大的现代发明,也是现代社会主要的“全景机构”(panoptical institution)。

工厂生产出许多各式商品,但是除此以为,所有工厂都制造了现代国家顺从的主体。这第二项却绝不是附属的生产线,虽然就显著性而言略微逊色,且少被提及,但是其为工业劳动获得了一项对于社会生存来说,比从工作的表面角色——物质财富的生产——推演出来的更为基本的功能。至于另一项潜在的功能究竟有多重要,我们可以从在整个现代时期爆发的周期性恐慌中获得信息——无论何时新闻发布消息说,成年人口中相当数量的人在体格上不适合有规律的工厂工作或者在军队服役,总会爆发这种恐慌。无论用以证明这种关切、无能、体弱和精神损伤的理由是多么明确,都会被视为威胁并引起恐惧,因为这使得这些弱者脱离了维持社会秩序所依赖的全景训练;不受雇佣的人,也就是未就业的人,不受控制的人——失去监管,不受监督,不服从任何规则,以及成规。难怪由19世纪具有社会意识的医药科学发展起来的健康典范,是那些能够被工厂和军队服务所需要的能够运用体力的男性。

如果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顺从于工厂工作训练的影响,这是制造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方法,那么以受雇佣的男性(“口粮供应者”)作为绝对、不受质疑的统治者的、强大的、稳定的父权家庭,则是其必要的增补;工作伦理的布道者,作为一种统治,同时也是家庭美德和家长不可撼动的权利与义务的宣扬者,就绝非偶然。在家庭内部,丈夫/父亲被促使对妇女和儿童执行相同的监督/规训的角色,就像工厂里的工头和军警,在工作现场

或在训练场对待工人或者士兵的方式一样。正如福柯所坚持的，现代规训权力的四散分布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将心脏压送出的血液，输送到有机体最遥远端的组织和细胞中去。在家庭中，丈夫/父亲的权威，将秩序生产和秩序服务网络的规训压力导向全景机构无法触及的人口部分。

最后，工作还被分配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角色，政治家们习惯将其表述为社会的生存和繁荣问题，并以“系统再生产”之名进入了社会学的论述。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质，现代工业社会的本质是，在可用能源（再次提及自然）供应的帮助下，对自然资源的再加工，而“财富”是这一加工过程的结果。这种再加工过程是在资本所有者/管理者的赞助下组织起来的，但却是通过使用雇用劳动力而完成的。因此，这一再加工过程的持续，要靠资本所有者成功地将人口的剩余部分投入生产角色。

在财富的扩张过程中，被用作必要来源的产品产量，取决于“活劳动”（living labour）生产性努力的直接卷入度和对这一努力的顺从逻辑；生产性角色是这个系统中的本质单位。政府的强制力量首先被用来实现这个目标——资本与劳动的商品化。换言之，也就是实现财富作为资本的潜力（亦即这种财富可以被用来制造更多的财富），实现社会个体成员作为“增殖”劳动力的潜力。活跃的资本和就业的成长，是政治的主要议题。政策的成功或者失败，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程度来测定的：由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雇佣力和人口涉入的程度而定。

简而言之：在用以分析的可区分的现代体制的三个层面上——个体、社会和系统——工作都占据了焦点的位置。此外，工作还是把三个层面连结在一起的关键，同时也是使三个层面的沟通合作能够得以协商、实现和保留的主要因素。

由此看来,工作伦理是将现代体制带入的关键工具。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日常功能和延续来说,资本和劳动这种不可或缺的相互交织,被工作伦理表现为所有成员(更确切地说,所有男性成员)的道德责任、使命和职业;工作伦理号召人们自觉自愿的、欢天喜地的,热情高涨的去拥抱那个事实上就无法避免的必然——新经济的从业者在新国家立法者的帮助和教唆下,尽可能致使这种情形让人无法逃脱。但是自觉自愿地拥护这种必然,就意味着放弃了对那些经历起来有如附加痛苦般的规则的所有抵抗。在工作场所,有自主性的工人是不被容许的。工作伦理呼吁人们去选择投入劳动的生活;但是投入劳动的生活意味着无从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 从“更好”到“更多”

58

对工作伦理的教条那种满怀热忱的宣讲,和那些即将失去自由而成为劳动者的人的抵抗成正比。宣讲的目的在于征服抵抗。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使用这一工具的目标,就是对工厂体制的顺从,以及导致独立的丧失。

工具理性允许选择一切手段,并根据这些手段所能达成预期结果的效率,进行批判性的评估,且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抛弃和替换。工作伦理,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对那些目前是,或者将要成为的工厂工人们情感和意识的诉求,只不过是推动工业系统车轮运转的诸多手段之一。工作伦理并非必要的最有效的手段,当然也非可意识的唯一手段。工作伦理也不是最可靠的手段;工作伦理的布道者费力灌输的,如同所有道德一样,变化无常——,飘忽不定的工作道德,可能保持了

一项用于达成预期的人们行为的很差的引导，一种为了符合工厂惯例所需要的严苛、不容更改且单调的勤奋工作的压力，这压力却又不足够稳定。工作压力不能依赖道德情感，也不能诉诸道德责任（因此最终付诸选择），来获得运用体力的恒定节奏和对工作体制的彻底服从。

我们已经指出，当向穷人和懒人进行工作伦理宣讲的时候，会同时采取更为可靠的施压手段，比如强制拘留，法律约束，取消除救济院外的任何救助，最后还有体罚威胁。工作伦理的宣讲号召道德选择；而工作实践却减少或者完全消除了选择，以力求确保目标对象仿佛改头换面般行动，不论这种转变真诚与否，不论工作伦理的福祉被相信与否。现代组织——现代的工厂也包括在内——的一般趋势，是造成人类个体道德情感与行动的不相关性（adiaphoric），以便使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规律且可以预言的，那无法通过非理性的道德冲动来实现。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的发明，大部分美国社会史学家赞同的是，润滑了美国工业车轮的是企业精神和向上层流动的欲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奉献于工作，更进一步献身工作，似乎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们看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工作本身具有什么价值，也并非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职业：工作是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的手段，也因此更加独立；工作是去除为他人劳作这种令人讨厌的必然性的方法。就工作令人高贵的品质而论，无需假装，甚至是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也会以未来的自由之名而被接受，且平静地承受。工作不需要被热爱或是被信仰以成为美德的标志；只要对最可怕的条件承受被看做在不远的将来换取



自由的幸福而暂时付出的代价，工作可以被公开憎恨，却不会导致规训坍塌的风险。

就米歇尔·罗斯(Michael Rose)的观点<sup>⑩</sup>，在美国，漠视工作伦理且对其置之不理的趋势已深化，在20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趋势也在加速；那时，盛行的管理上的革新以如下方式操作“用破坏努力工作奉献的方式。但是他们依旧我行我素，看起来似乎可能是因为对努力工作的奉献并不可靠”——或者，其因为在富裕的国度贪求的氛围里才被视作如此。这整个趋势在由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创始的科学管理运动中达到顶点：

在他成套的管理技巧里，工作伦理几乎没有一席之地。对工作的积极投入，主要是通过谨慎操作金钱刺激来加以鼓励。泰勒的劳工典型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是荷兰移民，某位施密特(Schmidt)先生。施密特让泰勒为之着迷的地方，当然不是施密特对高效、独创性工作有道德义务，而是他看到1美元钞票时兴奋的反应，和为了得到这1美元，他可以做任何泰勒让他做的事的意愿。

由于人类生存条件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显著，令人丧失能力的工厂规训的压力变得愈发无情，因此，不能指望劳动者对工作内在的那种崇高的特质的信仰，这是个明智的选择。然而，降低美国梦的承诺，这一优势也变得日益明显——所有在工作场所的遭遇会被证明只是暂时的麻烦，而对于老板一时兴起的屈

---

<sup>⑩</sup> M. Rose, 前引书, 第79页。

从,则是以后自己成为老板的手段。毕竟,站稳脚跟立足的机会变得日渐渺茫,而从体力劳动转向获得“为自己工作”的自由的道路也缩减并阻塞。勤奋工作的独立性必须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得,才能使其从对工作的道德奉献和被拔高的工作生活美德的观点中区分出来。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在“工作的物质动机”中,都发现了其他手段:与顺从接受工厂规训,放弃工作者独立性相关联的报酬。不论是否得到大棒威胁的协助,过去可以通过说教达成的目的,现在越发是通过胡萝卜的诱惑才能实现。与其声明努力工作是通过道德优越的生活的途径,不如现在所宣扬的,努力工作是赚更多钱的方法。不必介怀“更好”,“更多”才是唯一紧要的。

在工业社会之初,为了自主与自由而战的权力冲突,已经逐渐、然而坚决地转向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物而斗争,同时默然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并把对其的修订删除在议程之外。渐渐的,获取更多剩余物的能力被看作是恢复人类尊严的确定方法,当由工匠转变为工人的时候,这种尊严曾一度丧失。在这一过程中,诉诸努力工作而使人道德升华的能力则被丢到一旁。现在,衡量生产者声望与社会地位的标准,不再是真正或是假定的热衷奉献的美德,或是对工作态度冷漠的恶行,而是工资的差别。

关于社会生存品质的权力冲突已经转向为金钱收入数量上的争斗,经济所得则成为自主与自我肯定这一壮志的唯一表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引出了工作伦理最初力争实现却徒劳无功的结果,尽管曾利用经济手段,间或是肉体胁迫的协助。充斥在现代生产者脑海里以及

行动中的,不是用“资本主义精神”,而是用金钱报偿来评估人类的价值与尊严的倾向。这也将人类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坚定且无法逆转地转向了消费领域。这些结果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之后的历史,从生产者社会,转移到消费者社会。

在现代社会的所有分支里,对后一条路的遵循方式和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虽然在现代世界的所有部分里,都使用了胁迫与占有欲刺激的混合物来确保对工作伦理的遵从,但这些成分却按照不同的比例加以混合。最为明显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版本中,诉求与隐藏在生产者背后的消费者,显得那么不一致、缺乏热心且难以令人信服。这或许是造成现代性的两种版本之间裂痕不断加深的原因之一,而深刻改变了西方生活形态的消费主义的崛起,令共产主义政体感到畏惧,发现自己毫无准备,无法企及,且更倾向于认输,承认自己的低人一等,以减少损失。

## 第二章

#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个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

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作为一个“消费者”意味着什么。消费者就是消费的人,消费意味着要消耗某些东西:吃穿用度、娱乐以及其他人们的需求和欲望的事物。由于在我们的世界中,大多数情况下,是金钱在欲望和获得满足之间“斡旋”(mediates),成为消费者也意味着——通常意味着——占有(appropriating)大部分注定要被消费的东西:购买之、为之付费、且使之成为某人专属的财产,禁止其他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之。

消费也意味着毁坏。在消费过程中,被消费的事物就表象和精神而言,都不复存在了。这些事物要么是从实体上被“消耗”到完全消失,例如被吃掉或耗尽,要么是失去了吸引力,不能再诱引欲望,从而丧失了其满足人们需要和愿望的能力——例如,被过度使用的玩具或者播放多次的唱片——而不再适合用来消费。

这就是身为消费者的意义,但是当我们提到消费社会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在消费社会里身为消费者,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此外,难道不是每个已知的社会,就某种程度而言都是消费

社会？所有在前述段落中列出的特征，或许除了为打算消费的事物支付金钱的需要外，在任何一种社会中都有切实的体现。当然，我们把何种物品看作潜在消费对象，怎样消费它们，或许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没有人，无论其置身何时何地，能够不消费便存活。

因此，当提及我们的社会是个“消费社会”时，我们所考虑到的，一定多过那个次要、普通且没有特别说明的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消费。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就其深刻和基本的意义而言，与人们（前一章所述现代社会的工业阶段）过去所称“生产社会”一样，尽管生产将伴随人类物种起源与灭亡的始终。现代社会里较为陈旧的类型之所以被称为“生产社会”，是因为其中的社会成员首先是作为生产者的；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法受社会角色分工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左右，对其成员而言，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能力且愿意去担任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目前晚期现代、第二期现代以及后现代阶段，社会要求其成员——又是首先——要具备作为消费者的能力。而目前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法首先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的摆布，对其成员来说，这个标准就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

现在与过去的差异，并不像摒弃某个角色而以另一个取而代之那么彻底。这两类社会必定要有部分成员负责生产有待消费的物品，而两种社会里的全部成员，当然都要消费。两类社会的差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但是这种重点的转移确实社会、文化和个体生活方面造成了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深刻而普遍，以至于足以证明我们的社会是具有独立且独特类别的社会——消费社会。

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的过程,导致了許多意义深远的变化;然而,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是人们为了符合社会身份的要求而接受的训练和改造(也就是男人和女人们被“整合”进入社会序列中,且获得一席之地)。在这方面曾经非常关键的全景机构,逐渐变得不适用了。随着大量工业就业机会的急剧缩减,和少量、自愿、专业服役取代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大部分的人口便不再受到全景机构的直接影响。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力即使在就业缩减的情况下也能够增加;工厂员工人数变得越发精简;“缩小规模”是现代化的新原则。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编辑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估算,1970至1994年间,欧盟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30%下降为20%,美国则由28%降至16%,而工业生产力则以平均每年2.5%的比率攀升。<sup>①</sup>

全景机构的训练方式,几乎很难用来训练消费者。全景机构擅长用例行、单调的行为来训练人,且通过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来达成这种效果;但消费者的美德(实际上是“角色要求”)却是没有规则,并不断选择的状态。因此,在后工业与后征兵时代,伴随着大幅缩减,全景式训练与消费社会需求也相悖而驰。全景机构擅于训练的气质与生活态度,与理想的消费者大相径庭。

由宗教/伦理所激发的职业的和渴求的激情,轻落在清教徒们的肩头,如同马克斯·韦伯继巴克斯特(Baxter)之后重申的

---

<sup>①</sup> M. Wolf (1997) Mais pourquoi cette haine des march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p. 15.

一样：仿佛一件随时准备被丢到一旁的轻斗篷，<sup>②</sup>而理想中消费者所获得的习惯也应当如此放在肩上。事实上习惯被不断地、日渐迅速地丢弃一边，从未有机会能聚集成铁笼的栅栏。就理想意义而言，消费者不应当固守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永久的风险，没有需求可以被视作完全的被满足，也没有任何欲望可以被认作是最终的。在“直到进一步通知”时，应当有一个附件附加于任何效忠宣誓和任何承诺上。

所有的消费都要占用时间，事实上，这是消费社会的毒瘤，也是商品推销商主要的担忧。理想化来说，消费者应当立即得到满足，而这又有双重含义。被消费的物品应该立即带来满足感，不得拖延，不用漫长的经验累积，也不需冗长的奠基工作；但满足感应当在消费所需的时间结束时消失，而这段时间应该被减少到最短。如果消费者不能在任何对象上控制他们的注意力且长久集中他们的欲望；如果他们缺乏耐心、易冲动、躁动不安并且重要的是，易兴奋且同样容易失去兴趣，那么这种时间的减少就会达到最佳效果。

当欲求不用再等待就能得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或许远远超越天生的需求或外在需求所设定，以及欲望对象的物理耐用性所决定的那些限制。需求和满足之间传统的关系将要被颠覆：对满足的承诺和期许会优先于需要，且总大于既有的需要，但是又不能太大以至于消除了对所承诺物品的欲望。事实上，纳入考虑的需要越是陌生，承诺的吸引力就越大；经历那种从来不知其曾经存在且可以获得的经验，有着很大的乐趣。这

---

<sup>②</sup> M. Weber(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181.

种全新而前所未有的兴奋感,就是消费者的游戏。正如马克·C. 泰勒(Mark C. Taylor)和伊莎·萨特(Esa Saarinen)指出,“欲望并不渴望满足。相反的,欲望渴望依然是欲望”;<sup>③</sup>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消费者的欲望。对于欲望的期望会消失、消散并且看不到任何复苏的征兆,或者这期望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会引起欲望的世界,这必定是理想化的消费者的最大的恐惧和不安。

为了提升消费能力,决不能让消费者休息。他们需要不断被置于新的诱惑之下,以便于一直保持激动状态,永不让兴奋萎缩,且事实上,是在一种怀疑和不满足的状态中。指令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确认这种怀疑,同时要为宣泄不满提供一个通道:“你以为你看到了全部? 可是最棒的你还没看见呢。”

人们通常说消费者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是为了做到这点,就需要有那些时刻准备着,并且热切希望被诱惑的消费者(就像为了控制劳工,工厂老板需要的是有纪律性并且习惯遵从命令的员工)。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会积极地去寻找让自己被诱惑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从一处吸引到另一处吸引,从一个诱感到另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去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有些不同,而且或许比之前的更要强烈;正如他们以生产者身份生活着的前人们,从一个传送带到运转到另一个传送带。

对那些羽翼丰满、成熟的消费者来说,这种行事方式是一种强制、一种必然;然而这种“必然”,这种内化了的压力,这种以

---

<sup>③</sup> M. C. Taylor and E. Saarinen (n. d.) *Imagologies: Media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Telereotics, p. 11.



其他方式生活的不可能性,却以一种自由意愿的形态展现在他们面前。市场或许早就已经选择他们并把他们训练成消费者,因此剥夺了他们忽略市场诱惑的自由,但是每一次来到市场中,消费者有充足的理由感觉是自己在掌控。他们是法官、评论家和选择者。他们终究会拒绝所展示出的无数选择中的任何一个,而只流连在其间从事选择本身。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种被认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有个事实毋庸置疑:每个个体在具有其他身份前,必须首先是个生产者。在“第二现代性”(modernity mark two)中,即消费者现代性,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是,在个体能够思考成为具体的人物前,需要首先成为消费者。

## 制造消费者

近几年,我们听说各党派的政客们异口同声且热烈又不怀好意地叫嚣,“消费导向复苏”。下滑的出口额、空白的订单、冷清的高级街区的贸易,都归咎于消费者兴趣或者“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用信用购物的欲望,强大到足以压过破产的恐惧)的缺乏。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情况获得转机的希望在于消费者们重新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愿他们重新购买,大量购买,更多购买。“经济增长”是现代对事情是否正常并规范运转的主要测量手段,也是社会按照应有的模式运作的主要指标;在消费社会里,“经济增长”并不依靠“国家生产力强度”(健康而充裕的劳动力,富足的国库以及颇具胆识的企业主和经理人),而是被视为,依靠消费者的态度和消费热情。工作曾经扮

演了连接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角色,现在这个角色由消费者活动来担任。

将“前现代”拆解为——传统的,社会地位的归属机构,留给人们的只有“恪守本分”、遵守(但不能超过)附属于出身的“社会类别”标准这些相对直接的任务——现代性派遣给个体的任务是“自我建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章法的话,至少要从基础入手,建立个人的社会身份。个体的责任——曾一度受限于遵守一些没有既定条款的规则,这些条款意味着如何成为贵族、商人、雇佣兵、工匠、佃户和农场工人——现在已经扩展到社会定义自身的选择,以及让这种定义在社会上得到认可和赞同。

起初,工作是被用作对付这种全新的、现代责任的主要工具。勤奋建立起的,受到广泛认可的社会身份是将工作技能、工作场所和与工作相关的职业规划作为主要的决定因素。身份一旦选择,就必须为了生活而彻底地树立,并且至少在原则上身份应关乎工作、职业和工作的一生。对于这种社会认同的建立必须是平稳而持续的,经历几个连续又界定清晰的阶段(难怪会选择“建立”这个隐喻来传递“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的特性),职业生涯也是如此。工作生涯的必经之旅与长达一生的身份建构的先决条件,彼此间水乳交融。

然而,稳定、耐久而持续、逻辑清晰且结构严密的工作生涯却不再是百病皆医的药方了。只有在相对罕见的例子中,通过工作表现可以界定永久的身份,更别提固有了。长久的、良好保障和确定的工作,现在成了稀有物。旧有的工作,“一辈子”,有时甚至是继承来的,局限于少数旧行业和职业,在数量上也迅速减少。新的职位空缺倾向于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直到有更进一步的通知或有兼职者。这些职位通常结合了其他职业,且没

有任何持续就业的保障,更别说永久就业了。目前的口号是“灵活性”,这个逐渐流行的概念,代表了一场没有什么规则可循的雇佣和解雇游戏,但只要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就有单方面改变规则的权力。

在这种变化不定的环境中,不能合理期待建立什么能够真正持久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至少到目前,除了一些高技能要求和享有高度特权的从业者),那种纯粹简洁的,在工作的基础上去建构一个终身的身份的期望已经死亡且被埋葬了。

然而,这个意义重大的新起点,并不能被视为像大地震那样攸关生死的威胁。这是因为普遍关于身份的成见,其本质已经改变,这使得旧式的工作职业完全不合时宜,而且和新的身份认同所关注的那种任务以及担忧完全脱节。依照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提出的有力的警句,在所有的文化产品的都要根据“最大化的影响和即刻的退化”来测算的世界中,对先验规划身份的毕生建构,实际上会带来麻烦。如李嘉图·佩托拉(Ricardo Petrella)所指出的,当前的全球趋势指向,“通过大幅缩短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经济开始朝向朝生暮死、反复无常以及不稳定化的生产格局(暂时、灵活以及兼职工作)”。<sup>④</sup>

无论个人打算获得和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和当今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必须能够接受短期通知或者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必须遵循持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或者至少尽可能多的有所选择。未来必定充满意外,因此以其他方式行事,相当于自我剥夺:放弃那些未来命运辗转

---

<sup>④</sup> R. Peterlla (1997) Une machine infernal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p. 17.

所带来的未可知的,仅仅是雾里看花般觉察到的利益,也不要那前无古人且始料未及的命运供给。

文化时尚仿佛大爆炸一样涌进了公众的浮华世界,但是甚至比抓住公众眼球用时更少,其也会沦为过时且荒谬的旧风尚。因此,最好让每一个当前的身份都是暂时性的,只是轻轻地抱住,以确保一旦双臂张开,去拥抱新的、更加夺目或只是尚未加以尝试的替代者时,旧有的身份能够消失。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自我身份是多重的: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遍布被丢弃以及遗失的身份。每一种相继的身份都可能是不完整且有条件的,因此,主要的隐患来自于如何避免其僵化的危险。或许,由于在最为普遍的生活经历方面,“身份”掩盖的内容比揭露的要多,因此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对于社会地位的专注,越发常见的忧虑,是担心身份过度僵化,以至于不能在需要的时候予以取消。对身份的渴望,和满足这种渴望的恐惧,对于身份的思索所激发的吸引与排斥,混杂在一起,造成了持续的情感矛盾与混淆。

这类关注更多地来自于反复无常、无限创新又无章可循的生活消费品市场。无论是为了耐久消费还是暂时消费,从定义而言,生活消费品就没打算要永久维系——此处与“毕生的工作生涯”和“为了生活的工作”毫无关联。生活消费品就意味着使用殆尽;作为消费客体,这个名称的内在本质就意味着暂时和短暂;即便是使用隐形墨水,生活消费品遍体也都被写满了死亡的象征。

因此,在生活消费品的本质与当代身份关注具有的本土情感矛盾间,有一种预先注定的和谐或者共鸣。就如生活消费品一样,身份有待于被攫取和拥有,但只是为了被消费,因此也为

了再度消失。在市场化的生活消费品这一例子中,对于身份的消费不应当——不必——销毁对于其他新生的以及经过改善的身份的欲求,也不能剥夺吸收这些身份的能力。在市场上进一步寻找工具的理由要比寻找市场空间的理由更为充分,这便成为需求。“聚合身份”——被松散安排在一起的购买地点、不太持久的、容易拆分且可以被完全替换,在商店里就能买到的表征——似乎确切成为跟人所需要的来迎接当代生存挑战的东西。

如果这就是身份问题所释放的能量之消耗,那么就没有“标准规则”或者“样式维持”这样特别制定的社会机构是必要的;这些机构看起来也不那么招人喜欢。传统的、全景式的训练方法显然抵消了消费者任务的收获,并且对围绕着欲望和选择架构起来的社会造成灾难。但是其他符合标准规则的备选方法就更好吗?标准规则这个观念,至少在整个社会的范围来说,难道不是过时的产物?在劳动者社会里一度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让人们去工作”的口号,在消费社会里难道不是已经失去效用了?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人类选择的自由去限制,或者完全消除选择的自由;推开或者完全切断所有的可能性,除了一种可能——由规范所宣扬的选择。但是选择消除的副作用,尤其从标准的、秩序灌输的规则这一观点看,最令人憎恶的选择——反复无常、变化不定且容易取缔的选择——将等同于在人类中消除了消费者;这是或许降临到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灾难中,最为恐怖的一种。

标准规则对于消费者市场的永续、平滑运作和繁荣是如此“官能不良”且不受欢迎,同时,对于市场客户,也显现出了这一规则让人厌恶的一面。消费者的兴趣与市场操作者在此撞击;在一种奇怪又无法预料的形势下,“通用汽车的好消息,就是美

国的好消息”，一语成谶（加上一句附文：“美国”除了是其公民的聚合之外，别无他物）。“消费者精神”，非常像借此兴盛的商务公司的反对普遍规则。消费者社会，反对所有加诸选择自由之上的法律限制，反对把一切潜在的消费对象非法化，并且通过扩大对大多数“解除管制”方法的支持，来表明这种不满。

相似的不满还表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于社会服务的削减，迄今闻所未闻的赞同——对必需品集中管理和保证的条款——只要这种削减与降低赋税同日而语。“纳税人口袋里有更多的钱”这个口号在政治领域里的左翼右翼中是如此流行，以至于对此都不再有严肃的争端，该口号呼吁消费者履行选择权，这是已经内化且更新进生活天职（life - vocation）中的职责。税后口袋里有更多钱的承诺，对于选民而言，吸引力在于，不是更多消费的承诺，是更多可供消费的选择，更多购物和选择的愉悦的前景；正是这种不断使用选择的承诺，令人相信其具有惊人的诱惑力。

对于所有实际的意图和目的而言，这是手段，而非目的。完成消费者的工作，无论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消费，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拥护消费者的形态，意味着首先要和选择陷入爱河；其次，才意味着消费更多，而且并非不可或缺。

## 以美学评判的工作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他们的职责；生产是集体的努力，规定了任务的分工、参与者的合作以及行动的协调。某些特定部分的行动，有时可由个人单独执行，但是即使把这些行动与其他行动密合起来以集中于最终产品的制作，仍保留了任务最重要的

部分且保留在执行者的意识中。即使生产者分别是行动的，他们也仍然集中在一起。每个人的工作只有通过更多的人际沟通、协调与整合才能获得。

消费者正好相反。消费是完全个人、独立且最终，是孤独的活动；完成这一活动要通过抑制诱发，缓和或刺激那种通常是私人的、且不易传染的欲望。没有类似“集体消费”这种事情。没错，在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会聚集在一起，但即使这时，实际的消费活动还是保留着完全的单独、个体经历的体验。聚集在一起只是构成消费行为私人化的基础并且增加购物的愉悦。

在有其他选择者陪伴的情形，选择这个行为也变得让人满意了，最好是在一个供选择的做礼拜的教堂里，挤满了选择的朝圣者；在已有满满预定的餐厅用餐，在拥挤不堪的商场或游乐园里转悠，群体性交，这些都是最本源的愉悦之一。在所有这些以及相似的例子中，被得到共同颂扬的，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每一次选择的个性，通过选择群体盲目的模仿行为，会得到重述与再次确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消费者从群体性的消费中就无法获得任何东西。消费活动是所有协调与整合的天敌。消费同样对协调和整合的影响具有免疫力，致使所有凝结在一起的努力在克服消费行为本质的孤独感时，都显得那么虚弱无力。即便是聚集在一起行动，消费者依然是孤独的。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社会里的层级阶梯，并且也设定了消费社会成员，消费者记录其生活热望的框架——此框架界定了朝向自我提升并包含“美好生活”图景的努力方向。个人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重要的是拥有更多可以自由使用的选择，那他在社会阶层里的位置就更高，可以期许的公众顺应与自尊就更多，也因此更接近“美好生活”的理想。财富与收入当然重要；没有他

们,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者完全被否定。但是财富与收入作为资本角色——首先且主要用来把钱变成更多的钱——如果没有从观念中(动机源)完全消失的话,也会退却到第二和较为次要的位置。财富和收入的首要意义,是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

积蓄、存款或者投资只有能够承诺未来扩展消费者选择时,才有意义。然而,这并不是提供给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做法,如果大多数消费者这么做,会招致灾难。存款增加和信用购物缩减都是坏消息;作为“情况走上正规”的确定标志,消费者信用的膨胀受到欢迎。消费社会不会轻易接受延迟满足的呼吁。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不是存折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世”社会;是一个欲求社会,而不是一个等待的社会。

无需“标准规则”和与之相随的规训,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以确保人类的需求已经和市场操纵者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或者也不需要再造“经济需求”、生活消费品经济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对之前的经历看低和遮蔽,却展示诱惑、未经测试的欲望,对未曾尝试的感觉给予承诺,这么做很有效果。前提是,讯息要落入接收者的耳中,且在扫描讯号的时候,所有目光要集中在那些预料中会让人激动的事情上。消费,越发丰富与多样的消费,必须以消费者可以享用的权利出现,而非必须承受的义务。消费者必须受到美学旨趣的引导,而非伦理规范。

是伦理学,而不是美学,被用以整合消费者社会,维持其正常运转,并偶尔救其于危难。如果伦理把至高的价值赋予尽忠职守,那么美学则把奖赏给予卓越的经验。责任的履行有其内在的、时间延续性的逻辑,因此,这种履行建构了时间,给了时间一个方向,并且使得日积月累或者履行的拖延这样的观念具有意义。然而,对经验的找寻却没有好的理由足以拖延,因为随拖



延而来的除了“浪费机会”，别无他用。（增加）经验的机会不需要基础，也不用证明这种基础的正当，因为机会到来的时候无需声张，而且如果没有旋即抓住，机会将消失无影（当然，就算抓住了也会慢慢溜走）。（增加）经验的机会是需要在其盘旋升空的过程中抓住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时刻特别适合这么做。在这方面，一个时机和另一个时机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一个时机都相当好——成熟——对这个目的而言。

另外，这个时机的选择对于那些把选择当做生活模式的人来说，毫无用处。这并不能让消费者判断，那个让人心慌意乱的（增加）经验的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并且因此她或他必须准备好敞开大门迎接这个机会。他或她必须保持警觉，当机会降临时永远都能够辨识，并且做一切必要之事，对其进行充分利用。

如果生产者社会默诵自己是柏拉图派，寻求无法忤逆的规则以及事情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派——实用、灵活，坚守临危不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原则。对于明智的消费者来说，唯一可掌握的主动权，就是在众所周知的机会满布的地方，到达那个地点，并且要在机会的出现最为稠密的时候守在那里。这种主动权只会累积类似“实践智慧”中（*phronesis*）的智慧，也就是经验原则（*rule of thumb*）的积累，而不是傻瓜似的处方和计算命令。然而这需要极大的信任，首先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港口，在那里，信任可以安全抛锚。毫无疑问，消费社会也是咨询与广告的天堂，还是预言家、算命先生或者是贩卖神奇药水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综上所述：现在是消费美学占据了过去由工作伦理曾经统辖的位置。对于经过消费者训练而成功毕业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由可能性构成的巨大母体，有强烈且愈加强烈的感情，有深

刻甚至更加深刻的经验(与德国概念 *Erlebnis* 传递的意思相同,区别于 *Erfahrung*;两个德语词汇英语中都翻译为“经验”。粗略而言,*Erlebnis* 指“我经历的事情”,而 *Erfahrung* 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世界及其所有碎片都由他们激发感觉和 *Erlebnisse* 的能力来评判——诱发欲望的能力,消费者一生的追寻中最为快乐的阶段,比满足本身更令人满意的能力。根据每样物品、事件和每个人能力的迥异,在地图上加以标注;世界地图最常在美学层次上使用,而不是认知或道德的层次。<sup>⑤</sup>

被工作占据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由所从事的职业所占据,无法避免受到当前美学标准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其优越地位——是自我建构与身份建构得以围绕其旋转的中轴。工作也不再是伦理关注的焦点,不是道德升华、悔改与救赎的必选之路。就像人生其他的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由美学来判断。工作的价值以其产生愉悦经验的能力来判断。缺乏这种能力的工作——无法提供“真实的满足”——也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其他标准(及其假设具有的对道德的高尚影响)经不起竞争,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工作从被美学引导的情感收集者(*collector of sensations*)贬斥为无用以及降低人格的非难中拯救出来。

## 作为特权的职业

就工作能够带来满足的能力差异而论,实在没什么特别新

---

<sup>⑤</sup> 关于认知、美学和道德的空间化,参见 Z. Baman(1993)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鲜的。有些工作总是让人竞相追逐,并被视作非常让人满意和“有成就感”的,而很多其他的工作则被看成是苦差事。某些工作是“有意义的”,且比其他类型的工作更容易被当作是种职业,是骄傲与自尊的来源。然而,从伦理的视角看,没有工作可以被严格认定为毫无价值或者是降低身份的;所有工作都增加人类尊严,且所有工作都是道德得体与精神救赎的根源。从工作伦理的角度看,任何工作——单就工作而论——都是“人化”的,无论其为执行者所持有的即时愉悦(或者愉悦的缺失)是什么。就伦理意义而言,完成一项任务的感觉是工作能够带来的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最终也是最充分的满足感,就此而论,所有类型的工作都一样。甚至是少数几个可以把其从事的贸易或职业当作是天职,当作是世俗使命的幸运儿,他们经历过自我实现的那种引人入胜、兴奋不已的感受,倾向于将这种感受归因为“忠于职守”的警醒,而这一原则对所有工作的执行者都适用,即使是最普通、最不用费心的工作。工作伦理传递了一则平等的信息;它降低了本应明显的工作间的差异,这包括令人满意的潜能,赋予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所提供的物质利益。

对于工作的美学推敲和评价却并非如此。这里强调区别,把差异放大,且将某些职业拔高到令人入胜的层级,成为精制的美学对象,事实上成为艺术、经验,同时否认其他的获取报酬的职业类型有任何的价值。“高层次”的职业要求有与艺术鉴赏相匹敌的品质——良好的品位、巧言善辩、富有洞察力、无私奉献以及接受过大量学校教育。其他类型的工作一律被认为是可怜的、毫无价值的,以至于不管怎么想,这些工作都不能成为意愿的对象,和不用强迫就作出的选择。某个人只有出于必要,只有无法获得其他任何谋生手段的时候,才

可能去从事这类工作。

第一个类目的工作是“有趣的”；第二个类目的工作是“让人厌烦的”。这两个主要的评判标准涵盖了赋予其本质意义的复杂的美学标准。它们“无需证明”，“不许辩驳”的率直，也是目前美学在工作分析领地获得统治权的佐证，而此前，这是伦理学的领域。就像其他任何可以合理期待成为欲望的对象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目标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种多样、让人兴奋、容许冒险、包含一定程度（但不会过度）的风险，且总是有机会获得新的感受。单调、重复、循规蹈矩、不需冒险、不容首创，无法挑战智力，也没有自我检测与自我肯定的机会，这样的工作便是“让人厌烦的”工作。很难想象，完全成熟的消费者会自愿从事这样的工作，除非是陷入别无选择的境地（也就是说，除非作为一个消费者，一个自由的选择者，他或者她的身份已经丧失，被撤销或者被否定）。这种工作缺乏美学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由一个工作者工作就是为了积累经验的社会里，很难有成为一种职业的机会。

然而，要点是，在这个美学标准至上的世界里，刚才提到的那些“让人厌烦的”工作也没有保留其先前假定的伦理价值。只有未经消费社会改造，和没有变化成消费主义者的人，会自愿选择那样的工作，并且满足于出卖劳力以交换赤裸裸的生存（来自贫困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和“外来务工者”，或是涌进由四处寻找廉价劳动力的移民资本所开设的工厂中的贫困国家居民，都可以算作这个类别）。其他人则需要被强迫，才会接受这种提供不了美学满足的工作。曾隐藏在工作伦理掩体之下的粗暴威压，现在也毫无隐瞒，赤裸地呈现了。那些在消费社会里原本应当有效发挥整合与激发的工具，也就是引诱以及激发欲望，

在这种情况下却让人震惊的毫不想干且毫无作为。为了让已经转变为消费主义者的人们去填满那些缺少美学测试的工作,必须人为重塑一种没有选择、强迫且为了基本生存而奋斗的情境。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崇高道德的可取之处了。

就像选择和移动的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在消费社会里已经转化成强有力的层级化因素。所用伎俩不再是把工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以便为休闲空出更多空间,相反,是完全消除正式职业和副业、工作与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抬高到最高和最让人满意的娱乐层级。娱乐式的工作是最让人垂涎的特权。那些被赋予这种特权的人,便一头扎进这些工作所提供的强烈的感官刺激的经验里。没有固定时间的“工作狂”,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挑战里,这些人不会在奴隶群中被发现,而是在那些幸运又成功的精英群中。

80

让人获得满意经验的工作、自我实现的工作,与生活意义相关的工作,作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枢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或者恶名根源的工作,简而言之,作为职业的工作,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是精英所特有的标记,是其他人只能心怀敬畏、只能远观并赞叹的生活方式,是只能通过廉价小说或电视播出的纪实剧的虚拟场景而间接感知的经验。其他人没有机会以作为职业的方式来经历他们的工作。

“灵活劳动力市场”既不提供,也不容许对任何目前正从事的职业奉献终生。专注于手中的工作,沉醉于工作所要求的,以所执行的工作或者是需要施展的技能,来标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会成为命运的人质;由于任何工作都短暂的本质,以及各种合同中“直到进一步通知”的条款,这既不可能发生,也不被鼓励去做。不同于被选择出来的少数人,大部分

人在当前的“灵活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想把工作作为一份职业去热爱,要冒巨大的风险,并且,这也是心理和情绪灾难的引子。

在这种情况下,勤奋和奉献的劝告词听起来既不诚恳又很空洞,通达的人应当接受劝告,并认定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透过目前职业的外部标志,看到老板们玩的游戏的本质。老板们并不真的期待雇员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是真心话——老板们只希望双方都假装相信这个游戏是真的,并且据此行事。从老板们的观点看,诱使雇员们严肃对待假装出来的职业模式,意味着聚集了风险,而无论下次“裁员”或者另一次“合理化(公司规模)”何时爆发,这种风险都会爆发出来。道德说教的短期成功,就长期而言,不管怎样都证明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会让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真正的职业中分散出来——他们身为消费者的追求。

“做”与“不做”,梦想与代价,投降的诱骗以及防患未然的警告,所有这些纠结在一起,提供给寻找职业的人一种奇观。我们看到伟大的运动员或者其他明星,到达了他们职业技能的顶点,但是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和声望,意味着代价是要把他们成功路上所有阻挠的事物全部去除。他们放弃了所有凡夫俗子们珍视的一切乐趣。他们的成就有梦想成真时的所有症候。几乎只有在田径场或者网球场,对“真才实学”的检验才会引起更少的争议,且更让人信服。谁会怀疑从一个狂欢、爆满的剧场中折射出的歌手的优秀?在这些奇观里,似乎没有假模假式、诈骗诡计、装模作样、暗度陈仓的余地。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每个人都看得见并且可以评判。职业这出戏自始至终都在忠实的人群面前公开上演。(或者看来如此。事实上,表演的可信度取决于大量的脚本和片段化。)

明星崇拜的圣徒,如同所有的圣徒一样,获得赞扬并被视为典范,但却不是被效仿的对象。同时,他们体现了生命的理想,以及这理想的无法企及。运动场与舞台上的明星,都非常富有。很显然,他们的奉献和自我否定给他们带来了把工作当作是职业所孕育出的果实;详述网球、高尔夫、斯诺克或者国际象棋比赛冠军那令人难以想象的奖金总额,或者是足球运动员转会的费用,如同叙述殉道者们的奇迹或者所遭遇的苦难故事,在有虔诚信仰的圣徒崇拜中所占的地位一样,这些都是这种崇拜的重要部分。

然而,明星崇拜的圣徒屈从交换的东西,就像令人敬畏的收获一样让人刺骨寒冷。其中的一项代价就是荣耀的转瞬即逝。明星们从不知名的某处一跃升空,备受瞩目,也终究会回到其身所系的某处,且销声匿迹。难怪男女运动员们无争议地成为职业道德剧的最佳演员:他们的成就就本质而言必须是短暂的,就像青春本身注定是一出简短的插曲。正如运动员们所展示的那样,以工作为职业是种自我毁灭,是迅速朝向终点的生活。职业或许意味着很多事情,但最明确的是,职业不是——至少在对其的解释中不是——生命项目的命题或者整个一生的战略。就如明星们所展示出的,职业像后现代体验的集成者们生活中的任何其他经验一样,只是个插曲。

韦伯所称的“清教圣徒”,过着一种把工作当作是深刻的伦理奉献的生活,如同去实现神圣的使命,自然而然就把他人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视为本质上的道德课题。如今的精英同样自然地趋向于把所有工作都看做是美学满足的问题。就社会阶层底部的生活实现而言,这个概念,如同先前提到的一样,是

不折不扣的滑稽模仿。<sup>⑥</sup>然而,这却让人相信,被那些位于顶端的人所自由而热切地选择,且一旦被选择便被珍视,被积极保护的工作条件的自愿“灵活性”,对其他每个人也必然是一种毫无限制的恩惠,包括那些对其而言,“灵活性”并非意味着选择的自由、自主和自我肯定的权力,而是意味着缺乏安全,被迫居无定所以及无法确定的未来。

### 做消费社会里的穷人

在生产者社会的平稳期,工作伦理跨越了工厂与救济院的围墙。工作伦理的训诫提出了一种正确且适合,然而还未有实现的社会版本,并且到那时,这个版本可以作为当前行动的导向,以及对当前境况进行评定的标准。这个社会版本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就业,是个只由工作者构成的社会。

“完全就业”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位置上,同时担当权利和义务两种角色。两种角色中哪一方在前,取决于需要“劳动力雇佣合同”那一方的原则;但是与所有的规范一样,两方面都必

83

---

<sup>⑥</sup> Xavier Emmanuelli(*Le Monde*, 15 April 1997, p. 11) 嘲讽了另外一种密切相关的光学幻象,那是将精英的全是投射到社会阶层最底端生活方式的趋势,所导致的后果。旅行、移动或脱离家庭限制的自由,在赋予的观光客,以及跟家庭决裂而涌到大城市需找“不一样事物”的青年人之间,是极度收到推崇的价值,他们的勇气和自信,通常会得到赞扬(或是浪漫化),并视为是替他们在一个称赞与回报个人创新的社会里预备作准备。埃马努埃利(Emmanuelli)则指出,若认为穷人小孩的有当是“启蒙的旅行”,让年轻人得以“发现自我”,那么没有什么观念“比这种想法更加错误了”。没有比这种“启蒙的舞台”和那种没有目标、没有前途的错误之间,差异更大的了。“没有什么更具破坏性的了”。



须出现以确保原则的普遍适用。完全就业作为“常规社会”不可分离的特质，蕴含了一种普遍且能被自愿接受的义务，以及一种共同分享、提升到普遍权力层次的意愿。

作出正常定义的同时，也下了不寻常的定义。工作伦理把异常状态压缩进失业现象中——“异常”就是没有工作。可预期的是，对于穷人的持续存在，会倾向于被解释为工作短缺，或是缺乏工作意愿。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或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等人提出的观点——有的人在完全就业状态下依然贫穷，因此贫穷现象不能以工作伦理的扩散不足来解释——震惊了向来观点开明的英国。只要工作伦理被普遍接受，在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中占据最显著的位置，并且继续被看作可以治愈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那么“工作的穷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矛盾。

随着工作逐渐从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复制的汇合点的中心位置脱离出来，工作伦理——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慢慢从最高的管理功能上下滑下来。到目前为止，工作伦理已经从之前其直接或者间接统治的许多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中退出，或是被推挤出来。没有工作的那部分人，或许是工作伦理最后的退路，或者不如说是其最后的存活机会。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

在大多数的人类历史中，贫穷意味着对肉体生存的直接危害——饥饿、得不到医疗救治的疾病或者缺乏住所导致的死亡威胁。在这个星球的许多地方，贫穷还意味着所有的危险。即使穷人的状况已经提升到仅求生存的水平上，贫穷总是意味着

营养不良、没有充足的保护以抵御反复无常的气候,以及无家可归——这一切界定,都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对什么是营养、义务和居住的合宜标准的认定。

然而,贫穷现象并不能减缩为物质匮乏和身体的痛苦。贫穷也是社会和心理状况:人类存在的适当与否,是通过特定社会的高尚生活的标准来衡量的,不能依照这种标准,本身就是苦恼、痛苦和自我屈辱的来源。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生活”之外。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这导致自尊心的降低,也会导致羞耻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在特定社会里过所谓的“快乐生活”的机会绝缘,无法获得“生活所提供的事物”。这会导致怨恨加重,以暴力行为、自我贬损或者两者兼有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消费社会里,“正常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在公开展示的愉悦感和真实体验的机会之间,专注于做出相应的选择。“快乐生活”的定义源于对许多机会的把握,只能放过极少数机会,或者一个也不能溜走,抓住那些最为人乐道,最渴望获得的机会,而且不可落后于人,最好是捷足先登。就像社会中的其他类型一样,消费社会里的穷人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人,更别说过快乐的生活了。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无法过快乐生活或者只是过正常生活,意味着是失败的消费者,或是有缺陷的消费者。因此,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在消费社会里,导致社会(地位)降格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是个人作为消费者的不适当。这种不适当,这种无法尽消费者义务的不作为,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

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克服这种消费者的不充分状态,很可能被看作是唯一的处方,或者是脱离羞耻情形的唯一出路。

彼得·凯文(Peter Kelvin)和乔安娜·贾勒特(Joanna E. Jarrett)在他们有关消费社会里失业对社会心理影响的先驱研究中发现,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一种境况尤其令人痛苦:⑦“似乎是毫无尽头的闲暇时间”,随之是他们“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时间……日复一日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安排”,但是失业者没有办法以任何称得上是有意义、令人满足或是值得的方式来安排时间:

感觉自己被隔离在家中,是失业者们最常提到的抱怨之一……失业的人不仅认为自己无聊又受挫,【而且】这么看待自己(事实上也是如此)也让他们易怒。易怒成为失业者每天的生活常态。⑧

斯蒂芬·哈钦斯(Stephen Hutchens)从他的受访者那里(年轻的男女失业者)获得了以下他们对所过生活感受的报告:“我觉得无聊,我很容易沮丧——大多数时间,我就呆在家里看报纸”。“我没有钱,或者说钱不够花。我真的是无聊”。“我一般就躺着,除非去看朋友,当我们有钱的时候去泡吧——实在没什么好吹嘘的”。哈钦斯总结他的发现,得出结论:“用来描述失业经历的最流行的字眼显然是‘无聊’……无聊以及时间方面

---

⑦ p. Kelvin and J. E. Jarrett(1985) *Unemployment: Its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7 - 69.

⑧ p. Kelvin and J. E. Jarrett(1985) *Unemployment: Its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7 - 69.

的问题；‘无所事事’”。<sup>⑨</sup>

无聊，是消费者世界不为其留下余地的抱怨，也是消费文化着手根除的对象。正如消费文化所定义的，快乐生活是一种确保不无聊的生活，是种不断“有事发生”的生活，有新鲜、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令人兴奋则是因为事情的新鲜。作为消费文化的忠实伴侣以及必要补充的消费者市场，保证能够对抗怒气、倦怠、过度饱和、愁思、犹豫、感到腻歪或是无动于衷——这些都是经常出现在富裕且舒适的生活中的烦闷。消费者市场确保的是，任何时候都没有人会因为“全都尝试过了”，以及耗尽了生活必须提供的愉悦的源泉，而感到失望或者郁郁不乐。

正如弗洛伊德在消费者时代开始前所指出的，没有像快乐状态这样的事情；只有当一个令人烦恼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有短暂的快乐，但事后的无聊感立即侵入。一旦欲求的理由消失，那么欲望对象也就失去了诱惑力。然而，消费者市场证明比弗洛伊德所想象的还具有创造力。消费者市场像是用魔法召唤出了弗洛伊德认为不会达到的快乐状态。之所以消费者市场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其努力使欲望激发的时间快过抒发的时间，欲望对象更换的速度，快过对所拥有的物品感到厌倦和无聊的时间。永远不会无聊，正是消费者生活的准则，这是个现实的准则，是可以达成的目标，因此那些不能达到目标的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并且轻易成为其他人轻视和非难的对象。

缓和无聊感需要花钱——如果想要一劳永逸地避开无聊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快乐状态”，就需要一大笔钱。欲望自由

---

<sup>⑨</sup> S. Hutchens (1994) *Living a Predicament: Young People Surviving Unemployment*. Aldershot; Avebury, pp. 58, 122.

来去,而使欲望实际可行,并因此能经历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品无法用医疗保险的药方获得。钱是进入那些可以治疗无聊的地方的通行证(比如购物中心、游乐园或是健身中心);仅仅是出现在这些地方,就是避免无聊的最有效的方法;来这些地方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持欲望沸腾,不受压抑,且不可遏制,却因为预期的满足而感到深深的快乐。

因此,无聊是其他各种专属于消费社会的分层因素的心理必然结果:选择的自由和充足,流动的自由、突破空间以及安排时间的能力。无聊作为社会分层的心理学维度,是那些层次较低的人,最为感到痛苦,并最愤怒拒绝的对象。逃离或者缓和无聊,这种决绝的欲望,或许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然而,阻碍他们的行动以达成目标的几率也非常大。穷人没法获得对抗无聊的一般药物,而那些不寻常、不规则或者创新的对抗手段必然会被归类为不合法的,并且使采用这些方法的人遭受到法律与秩序捍卫者的惩罚。反常的是,或者终究没有那么反常,通过挑战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以命运作注,本身或许会变成穷人最喜爱的替代品,以取代富裕消费者那种对抗无聊的好脾气的冒险,在这个过程中,欲望和可以承担的风险都经过仔细权衡。

如果说穷人境况的本质特点是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么那些缺衣少食的邻居,就没有多少余地可以集体制定可供选择的安排时间的方法,尤其是要制定被公认为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方法。对懒惰的指责,总是在失业者的家园上空危险盘亘,但可以(且曾经用过,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用夸张、卖弄并且最终是仪式性的家庭劳碌来对抗懒惰的指责——擦洗地板和窗户,清洗墙壁、窗帘和孩子们的连衣裙、长裤,常在后花

园劳作。不过,没有一件事可以拒绝作为不充分的消费者的污名和羞耻,即使在类似的有缺陷消费者的聚居区中。与周围人的标准看齐将是徒劳的,因为正确的标准已经制定了,并且不断从遥远的区域被传送回来,通过每天的报纸,和一天二十四小时给消费者传递福音的光鲜的商业广告。以当地邻里消费者们的智力能够创造出的替代品,不可能对抗这种竞争,以担保能实现自我满足,缓和明显劣势带来的痛苦。对自己作为消费者是否称得上合格这一评估,来自远程的控制,而自己人的观点并不能对作出的判决提出抗议。

如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对其读者的提醒,<sup>⑩</sup>当今社会的秘密在于“认为制造出并且主观感受到的不足得以发展”,因为对其基本原则“没有什么比人们宣称自己已经满足于所拥有的更大的威胁”。人们确实拥有的东西,在有钱人那种咄咄逼人过度张扬的奢侈消费相比下,也被玷污、显得寒酸、相形见绌:“有钱人成为普遍崇拜的对象”。

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些也曾是“白手起家”的人,后来被视为个人英雄并受到普遍的崇拜,他们的生活概括描述了严格且固执地遵循工作伦理,由此产生的良性效果。情况不再是这样的了。现在受到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保障了最新奇最挥霍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某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是做过了什么。有钱人身上受到普遍崇拜的是他们挑选生活内容——居住的地方,住在一起的人——以及毫不费力随意改变的那种令人惊奇的能力。他们似乎永远不会中途弃权,

---

<sup>⑩</sup> J. Seabrook (1988) *The Race for Riches; The Human Cost of Wealth*. Basingstoke; Marshall Pickering, pp. 163, 164, 168 - 169.

他们的再生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尽头,他们的未来在内容上日益丰富,而且比过去更为诱人。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似乎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财富所打开的前景的广漠程度。事实上,这些人似乎受到消费美学的指引;他们的伟大之处以及受到普遍崇拜的核心在于他们对于美学的掌控,是他们的鉴赏能力,而非对工作伦理的遵循和在财富上的成功。

希布鲁克指出:“穷人并非生活在与富人相分离的文化之中,他们必须生活在为那些有钱人的利益所设计的同样的世界中。随着经济增长,他们的穷困状况也随之恶化,就如因为萧条和停止增长造成的强化一样。”让我们再加一句,这具有双重意义,贫穷“会因为经济增长而加剧”。

首先,在这段话中,无论“经济增长”的概念指什么,都和用“灵活性劳动”来代替工作,用“浮动合同”取代工作保障,固定周期的工作委派以及临时劳动雇佣不无关系;也与机构缩减,重新架构和“合理化”有关——所有这些最后都概括表现为减少就业数量。对于这其中的关联,没有比下列事实更能生动说明的了:撒切尔执政后的不列颠,是所有这些“成长因素”的先驱和最为热心的捍卫者,也是在西方世界里,宣称拥有最惊人的“经济成功”的国家,却也是全球的富裕国家里贫穷的程度最骇人的地方。联合国发展计划当局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发现,英国的穷人比其他任何西方或者是西方化的国家的穷人还要贫困。英国有接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是“经济上有麻烦”的意大利的五倍,是“落后的”爱尔兰的三倍。五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贫困——这是台湾或者意大利的两倍,芬兰的六倍。总体而言,“‘收入贫困’的穷人所占比例,在撒切尔主政下,跃升了近

60%”。<sup>①</sup>

其次,在穷人变得更穷时,有钱人——那些消费者美德的典范——却变得更有钱。在英国,这个被评为最近“经济奇迹”的国度里,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所能购买的东西,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西方国家的相同层级的人口相比,是最少的,但是英国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是欧洲最富裕的一群人,他们所享有的购买力可与传奇般的日本精英相匹敌。穷人越贫穷,在他们眼前呈现出的受到他们崇拜、垂涎与效仿的生活模式就越发显得高不可攀,更加反复无常。因此,“对于不足的主观感受”,以及伴随这种感受的污名和耻辱带来的痛苦因为生活水准的降低和相对(相比较而言)剥夺增加的双重压力而恶化,这两者都在当前已经解除管制、自由放任的经济增长下,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减缓。

消费者梦想的天界线升得越来越高,而曾经设想的“让下层阶级都能够飞上天堂的恢宏的飞行器”,首先是耗尽了油料,然后被丢到“逐渐停止”的政策垃圾堆里,或者被循环利用,制成了警车。

---

<sup>①</sup> 引自 G. Leam 和 B. Gunnell 的报道,UK poverty is worst in the West, *Independent on Sunday*, 15 June 1997.





## 第二部分



## 第三章

#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这个概念传递的理念是：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就是保障其所有主体的“福利”（也就是说，比起只是活着，要享有更多的东西：在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中，有尊严地活着）。这个概念把包含在公众福利<sup>①</sup>——个人有尊严的生活的集体保障——中的责任，加诸由国家经营和国家资助的机构。公众福利可以被视为一种集体保险的形式，由集体的每位成员联合起草，并全体适用；这种保险政策承诺依据个人需要的范围，按照比例予以赔偿，而不是依据付出保险费用的多少来决定。公众福利的原则，从纯粹的形式而论，是需求上的平等，这个原则优

95

---

<sup>①</sup> “公众福利”是曼恩（Mann）所提议的用词，他当时正讨论 1955 年提姆斯（Titmuss）提出的财务福利、职业福利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区分。他指出，区分“社会福利”和其他两种福利的做法，“有点误导，因为其他两种元素显然也是社会性的”，曼恩建议用“公众福利”来取代。曼恩指出，“之所以成为公众的，是指其明显可见，而且公众（当然是一般性公众）能够分辨出该元素乃福利国家所为。”（参见 K. Mann（1992）*The Making of an English Underclass: The Social Divisions of Welfare and Labou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 13.）我们在这里用“公众福利”一词，——和曼恩的不太一样——作为总称的概念，指称一切集体提供个人的较特定的形式，而不论提供的形式为何，以及负责管理的机构为何。

先于支付能力的不均衡。福利国家的理念,要求国际机构担负履行公众福利原则的责任。

一般意义上的公众福利理念和特殊的福利国家,与工作伦理之间的关系含混不清。事实上,福利的观念和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之间,有两种彼此对立又难以调和的关联方式,这使其成为长期争论的主题,至今都没有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一方面,由集体保障个人福利的赞成者们承认由工作支持的生活的正常性;然而他们指出,对所有人而言,由于缺乏永久的就业状态,因此所谓的标准远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而且如果要工作伦理的训诫符合实际,就需要把那些底层的失败者拉起来。那些在艰难时期暂时失业的人也需要得到照顾,让他们准备好“行为正常”,也就是说一旦经济复苏,工作机会再度出现,他们便可以进入工作状态。依次论证,福利国家需要支持工作伦理作为社会健康度量标准和规范的权力,同时,把在标准持续普遍执行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产生的反作用力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由于宣称得体与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种权利”应当确保政体中的成员人人享有,随时享有,而不用管他们对共同财富的贡献有多大,公众福利的这个理念允许(明白地或者含蓄地)把生活从“对社会有用的”,被视为只有在就业时才可能存在的生产性的贡献中区分出来的可能性,而根据同样的理由,损害了工作伦理最为神圣和不受质疑的前提。这种理念,将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界定为公民身份的问题,而非经济的表现。

这两种含意之间的矛盾确实存在,因此福利国家自世纪之交的初始就处于争论的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理由充足的情况下,福利国家被有些人看做是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而其他人则认为福利国家是对抗工作伦理的政治阴谋。

然而,这并非争论的唯一原因。福利国家是“压制的机构,或是扩张人类需要,缓和自由市场经济之严酷的系统?是资本积累与利润的辅助,还是像口袋里的钱一样,予以捍卫和增加的社会工资?是资本家的欺诈,还是工人的胜利?”伊思·高夫(Ian Gough)如此发问,试图去了解看似是这一冗长争端唯一结果的混乱状态。<sup>②</sup>最合理的答案应该是:福利国家拥有所有这些特质,此外,还有更多其他的特色。

福利国家出现在几个条件的汇聚点上:病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形成的压力,没有政治援助的情况下无法独立再造其自身生存条件;来自组织劳工的压力,他们在没有政治协助只依靠自己的情况下,无法确保自身可以对抗反复无常的“经济循环”;通过缓和最为不公正和最难以忍受的情况来保护和重新确认社会不平等原则的冲动;意欲通过将那些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边缘化,以激发对于不平等的接受;以及对政体成员帮助的迫切需要,以安然度过政治上难以控制的经济腐败的影响。

多亏所有这些虽是异质的,但却强大并彼此聚合的驱动,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市场、民主)社会的某个先进阶段出现的福利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重决定”(over-determined)。那些导致福利国家出现,并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保持供给使其恢复活力的压力如此沉重,以至于一般人认为由国家管理的福利供应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自然属性,就像某种经过选举的权力机构,或是某种货币形式。

直到最近,进步观点才算忠实地支持了那些流行的想法。

---

<sup>②</sup> I. Gough,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p. 11.

即使是最敏锐且有见地的观察者也会发现,难以设想一个没有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1980年2月,在一篇发表于 *Perugia*, 后来于1981年10月出版的论文中,最敏锐的当代趋势分析家,克劳斯·欧菲(Claus Offe)断言在某种意义上,福利国家“成为无法逆转的结构,若废除福利国家,便如同废除政治民主和工会,并导致政党体系的根本变革”。欧菲完全同意普遍的观点,他抛开“超越福利国家的远景”,认为“不过是旧中产阶级中,某些空想家政治无能的白日梦”。事实上,没有福利国家的生活其坏处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没有大范围国家资助的住宅、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广泛的强制性社会安全计划,工业经济的运作将无法想象……福利国家这个窘境是隐秘的,然而其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击会是破坏性的……废除它会有毁灭性的后果……矛盾在于资本主义无法与福利国家共存,却又不能离开其生存。<sup>③</sup>

98

确实,在欧菲写这段话的时候,这一切听来都是真的,废除或甚至是大幅缩减福利国家,就会把集体的保险留给私人企业兴办,以及一般福利供应的“私有化”或“撤销管制”,这些想法看起来不过是空想者的白日梦。然而,不到二十年后,不可想象的变成了可以想象的,一个不是福利国家的国家,以及没有国家主管安全的安全网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还称不上是最富裕且“经济成功”的社会的话,就具备了明显的可能性。促使这种境

---

<sup>③</sup> C. Offe,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pp. 152 - 153.

况成真的压力,目前显现出势不可当的趋势。

在福利国家这种戏剧化的命运翻转中,依据什么标准,工作伦理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其在演出时被描绘成了什么?而这种大变动对于其未来的展望,会有什么影响呢?

## 排除与容纳之间

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经过了多年由玛格丽特·撒切尔,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或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进行政治资助的“新自由主义”的精神训练,以及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发动的“新自由主义”政变之后,已经很难把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爵士——即使算不上英国福利国家之父,也是福利国家的助产士——看做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社会民主政策的左派评论家的话)。然而贝弗里奇认为他的全面福利国家的蓝图,是自由主义的美好社会合法又无可避免的实现:“我相信我最渴望见到完成的事务,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事务——将自由主义的伟大传统,带到新的世界。”因为“一切基本自由的平等享有”是“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可以且应该利用社区的组织力量,来提高个人可享有的权利”。如果社区未能确保全体成员“免于匮乏和恐惧匮乏;免于懒散和恐惧由失业造成的懒散”,<sup>④</sup>那么对这种增强了

<sup>④</sup> Sir W. Beveridge, (1945) *Why I am a Liberal*, 引自 E. K. Bramsted and K. J. Melhuish (eds) *Western Liberalism: A History in Documents from Locke to Croce*. London: Longman 1978, pp. 712 ff.



的自由和权利的享有就不是每个人都平等的。

对于像贝弗里奇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向所有人宣称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依据法律每个人所拥有的利用这种自由的方法和倾向。贝弗里奇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拟就了《社会保险与联合服务报告》(*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并递交给政府,而当时的政府所关注的是,在即将获胜的战争之后,如何赢得和平。用贝弗里奇自己的话来说,这份报告:

……提出了社会安全计划来确保国家的每位公民,在能够工作和作出贡献的条件下,如果因为其他任何理由——疾病、事故、失业或是年迈——而无法工作,也无法为他和依赖他生活的人赚取足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的收入时,有一份让他可以继续生活的收入,在他一无所长时也还算足够的收入,以及在他拥有财富时,也不会因为家庭状况调查而被缩减收入。

100

很明显,这份报告出现之前,工作伦理的统治已经两个世纪没有受到过挑战。工作伦理完成了任务。也已经为这样的信息做了铺垫,即每个身心健全,有工作能力的人(男性),如果能够工作的话都要去工作,而且到了20世纪中期,这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唯一留待解决的问题是,万一不论什么原因,无工作可做,或是有工作无法承担时,该怎么办?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恐惧,折断了人们的翅膀,麻痹了他们的进取心,剥夺了面对危险时所需要的勇气。对抗这种情况的共同的保险,会分散无法工作的恐惧,并给予个体承担风险的自由,这种风险是任何坚持己见的努力都会带来的。坚持己见的自由要免于匮乏和懒散,并免于担忧这两者。

如果这种自由没有扩及到社区的每个成员之中,而只能(在伤害已经造成之后)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那些不幸的,没有远见的,“一无所长”的人——那么,这种主要被理解为预防/启动手段的观念,当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如果仅聚焦于那些最需要的人身上,就像今天大多数政客的提议,那么就无法接近贝弗里奇的宏大目标。在恐惧已经造成破坏,匮乏和懒惰已经从那个骇人的不测事件转变成现实之后,才提供帮助,有胆识、坚持己见、自信且依靠自己的人类根本无法实现自由主义的梦想。

即使依靠纯粹的成本效益计算,“集中的”家庭状况调查还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如果贝弗里奇的策略奏效,福利国家就可以逐步任其自己运行直至失业,但是如果像过去一样让恐惧纠缠在人们心里,只会扩大受害者的行列,并且因此不断推高保释那些已经需要这些帮助的人的成本。因此,任务在于消除恐惧本身,找到达成目标的方法,唯有所提供的协助不会因为是幸运或者勤俭的人“拥有自己的财富”“却被任何家庭状况调查所削减”。

正因为废除家庭状况调查的允诺,贝弗里奇的先见之明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如果有人对这种构想可能为他们造成的财务成本发愁,也几乎没有人抱怨“我们担负不起”(就像普通家庭的成员接受了每个人在饮食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首先却没有预备足够的储量,也没有弄清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满足所有人的胃口)。如艾伦·迪肯(Alan Deacon)和乔纳森·布拉德肖(Jonathan Bradshaw)在他们所写的优秀的家庭状况调查史<sup>⑤</sup>中

---

<sup>⑤</sup> A. Deacon and J. Bradshaw, (1983) *Reserved for the Poor: The Means Test in British Social Poli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rtin Robertson, p. 1 ff. 42.

指出的,贝弗里奇的报告赢得“惊人流行”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承诺废除家庭状况调查。

国家保险法案最终成为法律之时,《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2 February 1946)将其解释为“家庭状况调查的实质废止”。事实上,这种废止从未真的发生过;截至1948年末,英国有三种须经家庭状况调查的救助,大约有两百万人接受调查。然而,这一数字与后来无法遏制的经由家庭状况调查进行的社会服务数量相比,相形见绌。到了1982年12月,某些形式的家庭状况调查已经影响到了一千两百万人——这种成长速度,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比得上。

普遍性和选择性(家庭状况调查)的社会福利供应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类型;差别在于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冲突,被不同社会群体感知的方式,以及政治命运的前景。

102

选择性的实践逐渐但有不可逆转的取代了普遍主义者的野心,也许没有人比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和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更为热心地加以对抗了。蒂特马斯不顾一切地阻挡上升的趋势,在1968年写就的书<sup>⑥</sup>中,他提醒读者“给穷人提供的服务依然是贫穷的服务”——服务仅局限于人口中缺乏政治权势与公众话语权的穷人时,选择性的社会供给倾向于吸引整体中最差劲,而不是最好的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然而,两位学者都反复主张,不论这个已经非常严重的缺陷是否属实,将社会救助仅提供给通过家庭状况调查的穷人,会对整个社区造成危害更大的后果。只有社会服务以整个社区为目

---

<sup>⑥</sup> R. M. Titmuss, (1968) *Commitment to welfare*. London: Allen & Unwin, p. 143.

标,并且有利于每个人,社会服务才能“像战争期间那样,促进社会整合和共同体的感受”。<sup>⑦</sup>

事实上,对家庭状况调查的废除会让社区中的受益者(在这种情况下等同于全体人口)认为,福利国家的花费是值得的;毕竟,这些钱是花在最好,最慷慨也最值得信赖的保险上,以对抗所有种类的“买得起”的坏运气。社区本身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家,和一个每天都要算计权利与义务的最适宜(最佳)平衡的场所。将服务的提供限制为通过家庭状况调查的人,社区就立即分裂成为那些付出却没有任何回报的人,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最近在选举中获胜的“新工党”的一位部长大卫·布朗克特(David Blunkett)很清晰地说明了这种感觉,他在1997年7月29日写给《卫报》的一封信中,把——他声称“效率低下且无法存活”的——福利国家缩减为“将社区里某一部分人的钱交给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理性因此与团结的伦理形成对抗,伦理本身成为了“能够负担”什么的问题,或是在政治上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家庭状况调查的整体效果是分隔而不是整合;是排除而非容纳。新的,规模较小的纳税人社区通过运用正事势力建构有缺陷的公民类别来进行自我建构,然后把自己的同类放置在一起,坚决地把这个类别边缘化,并且因为其无法达到作为建构与自我建构的核心标识的生活标准,而对其进行惩罚。那些让人愤慨又自以为是的判决,例如波伊森(R. Boyson),认为金钱来自“活跃、成功而勤俭的人,转给那些懒惰、失败又

---

<sup>⑦</sup> A. Deacon and J. Bradshaw, 前引书, p. 65.

不负责任的人”<sup>⑧</sup>,这种论调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接受这些钱的人,现在与敲诈款项的人不可思议地相像,必定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大多数人将自己的好运气归因于节俭,而他们必定是失败的,因此大多数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个成功的故事。如汉德勒(Joel F. Handler)所论,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部分真正的或者假定的价值,才能够被重新确定:“观察者通过建构他人来建构自身”。<sup>⑨</sup>

所造成损害的细目并未到此结束。这类福利国家最有生命力,最长远的影响,是使政治变得贫乏,并且让一般公民对政治失去兴趣,尽管这类福利国家已经简化为服务一小群人的需要,而且在普遍观点看来,是人口中较低劣的那一部分人。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对政治的关注最后只剩下让财政部的手远离他们的口袋。其他就没有什么攸关利害的事了——他们很少期待国家还能提供什么,因此他们觉得越来越没有什么理由要积极投入社区的政治生活。福利国家的“缩减”和积极关注政治性公民身份的萎缩,同步进行。

## 福利国家失业了

这似乎是无情地朝向家庭状况调查漂移的“非预期的结果”(或者,如弗吉[Zsuzsa Ferge]和米勒[S. M. Miller]的说

---

<sup>⑧</sup> R. Boyson (ed.) (1971) *Down with the Poor*. London: Churchill Press, p. 5.

<sup>⑨</sup> J. F. Handler and J. Hasenfeld, (1991)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London: Sage, p. 16.

法, ⑩是“准目的性的”, “有指引但是无计划”的结果)。不过, 令人好奇的是, 是否从福利国家的任务列表中删除“社区感”的生成——一方面如蒂特马斯和汤森建议的, 另一方面由“焦点协助”所主张的——只是致命的目光短浅的后果, 或是在恶化的经济平衡下, 不想要但是却无法避免的后果。

如前所述, 福利国家爆发性的进入工业化世界, 其最初在政治上令人惊讶的成功和对其进步几乎没有认真的抵抗, 都起因于其“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 把那些分散在对抗性角落里的利益与压力聚合在一起。保持福利国家的条款完整无损, 过去反复归于社会阶级之间未成文的“社会契约”, 如果没有这个契约, 这些阶级彼此间就如鲠在喉。福利国家惊人的延续性, 往往以其创造和维系和平的功能来解释: 福利国家更好地确保了工人接受资本家老板所制定的规则, 而且在强制性措施的全力支持下, 付出比工作伦理要求的还要低的代价。

相反, 今天福利国家的内爆, 让原本热切要使其运转的支持迅速蒸发, 以及削减、撤回福利供给, 甚至是废除原本看似无可撼动的原则时的那种平静镇定, 都暗示着类似的“多重决定”。用捍卫者意识形态的转变, 以及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者或者新保守主义的宣传对公众心态的影响来解释福利国家命运的逆转, 也都是本末倒置的。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宣传拥有如此广泛的听众, 而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中目标。欧菲在写于 1987 年的一篇论文中正确解释了这个问题, 论文题为“民主制反对福利国家?” (Democracy Against the

---

⑩ Z. Ferge and S. M. Miller (eds), (1987) *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hot: Gower, p. 297 ff.

Welfare State?)，福利国家迅速失去其政治支持的事实，“不能完全由经济或者财政危机的论调来解释，或者由强调新保守主义精英和意识形态崛起的政治论点来解释；也无法仅在道德上诉诸既存的福利国家在机制配置上的争议和正当，就能解决问题”。<sup>①</sup>

事实上，所有这些常见的争论最后都只是针对已经采取的措施，提出政治上的合理化和意识形态的正当化，而不是提出解释。新保守主义精英的崛起不能算是个解释，但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待解释的现象。另一个需要解释的谜题是，为什么“道德上诉诸正义和正当”，过去能够促进与推动福利国家的稳定扩张，现在却几乎毫无例外地被用来主张大幅缩减和废弃福利国家。

鉴于其多重决定状态，如果在福利国家式的公共保险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之间没有找到共赢点，就难以想象，在资本主宰的社会里，福利国家会获得最初政治上的风行。在其诸多的其他功能之中，福利国家在永久性的“劳动力商品化”中扮演了关键要角；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完备的医疗服务，适宜的住宅，并为贫穷家庭的孩子提供健康的营养品，以确保资本主义工业拥有稳定供应的可雇用劳动力——这是任何一家或几家公司都无法自己确保的效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久依赖于不断购买劳动力，预期的劳动力必须成为商品，以让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雇主不能也不会购买劣质产品。福利国家维持了随时能够积极投入服务的劳动“后备军”，并且在不需要他们服务的时候，让他们保持良好状态。

---

<sup>①</sup> C. Offe, (1996) *Modernity and the State: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172.

然而,雇主们再次需要劳动后备军的服务目前由国家来管理照料的愿望,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当前过剩的劳动力,或许永远无法再次成为商品——并不完全是因为劳动力本身品质不佳,而是缺乏需求。这种需求还是有可能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出现——需要随意性、偶然性与“灵活性”(也就是说,不是“资格过高”或是“训练过度”)的劳动,但可能忽略那些福利国家在其平稳时期力求培养的教育良好,体格强健且自信的劳动力。即使是那些数量较少,部分现代工业或许还需要的旧式劳工,也很可能是在任何单一国家难以企及的遥远领域寻找,因为财务金融享受不受拘束移动的新自由,以及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所珍视的灵活性。马丁·乌拉考特(Martin Woollacott)最近的评论,准确地掌握了这个趋势:

瑞典与瑞士合资的 Asea Brown Boveri 集团宣布要裁减其西欧劳动力达 5.7 万人,而在亚洲另外创设工作。Eletrolux 随后宣布要裁减 11% 的全球劳动力,大部分位居欧洲和北美。Pilkington Glass 也宣布要大幅裁员。就在十天之内,三家欧洲公司裁掉的工作数量,就比得上法国与英国政府创设工作的提议……众所周知,德国在五年里失去了一百万个工作岗位,而它的公司却忙着在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建造工厂。如果西欧的工业大规模迁移到西欧之外,那么这一切对付失业的最佳政府策略的论调,就几乎派不上用场了。<sup>⑫</sup>

---

<sup>⑫</sup> M. Woollacott, (1997) Bosses must learn to behave better again, *Guardian*, 14 June.



雇主乐得将“劳动力再商品化”的代价转嫁给财政部,只要追逐利益生产的目标不变,劳动力就要增加。然而,情况逐渐不再如此。公司的大部分盈利源自“预支”(up-front)支出(约达总成本的80%),而这些并不包括雇用更多的劳工。对劳工的雇用越来越从资产转变为负债。经理人,尤其是顶级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由于成功“缩减”了劳工规模而获得丰厚的报酬——例如 Chase 曼哈顿银行的总经理托马斯·拉布瑞克(Thomas Labrecque),由于裁减一万个工作岗位有功,而享有900万美元的年薪。证券市场分享与强化了股东的优先性。雷诺汽车的老板路易·史威茨(Louis Schweitzer),由于关闭比利时的雷诺工厂导致公众不满反应而感到挫败和愤愤不平;毕竟,这项行动得到了证券市场的支持——企业智慧的终极表现——让雷诺的股票面值上涨了12%。<sup>⑬</sup>

108 尽管在税收方面不甚灵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由国家管理的福利服务还是很好的投资,假定公司打算扩张时,需要雇佣额外的劳动力,并且在公司想要补充劳动力资源时,就可以向国家福利的使用者招募。然而,当前的趋势是通过股份和股息的价值而不是产量,来衡量企业的影响力,同时还要考虑劳动力生产角色的快速衰落,和企业全球分布自由的问题,福利供应的投资最终就没那么有利可图了;用更少的代价,就能够获得同样,甚至是更好的效果。在偏远的地方,在需求负担较少的政府庇护下,廉价获取“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似乎是个比较好的主意。他们所承诺的是不用负责任的机会,而且当这些“在

---

<sup>⑬</sup> D. Duclos, (1997) *La cosmocratoie, nouvelle classe planétair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ugust, pp. 14 - 15.

经济上合理”的机会来临时,在严酷的竞争需求的重压下,很少有头脑清楚的企业家会坚持他们的责任。

新近获得的移动的自由,和随之而来的免于担负财政重担的补充劳动力的自由;似乎有无穷的生涩、温顺且未被惯坏的劳动力储备,在远处招手诱惑。在一个部分覆盖了成熟消费者社会的星球上,还是有广袤的处女地,那里有不需要唤醒消费者欲望就能够获得的顺从的劳动力;那里有为了满足生存而奋斗的基本需求,而要去做的工作,在其他地方却要不断创新欲望,诱使工人吵嚷着要得到满足,以及不断要求调升工资,以便让这些欲望成为普遍需求。

这似乎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作为主要的动员与整合力量,作为化解冲突和维持秩序的康庄大道,驱使自身为消费欲望所用,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倾向于“使劳动力价格过高而退出工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陆续耕耘过的每块土地,迟早都会土壤枯竭,从而成为收益递减法则的牺牲者。为了保证生产利润,必须找的新的、未经开垦的处女地。这种困局经历了一长段时期,来解释消除一切自由贸易障碍,首要的是资本自由移动阻碍的压力。更有甚者,这种压力还会与另外一种压力合作,让阻挡劳动力自由移动的高墙滴水不漏。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是,资本的伊斯兰教徒发现,在多种劳动中行进,比在呆在家里呼唤这些劳动更为方便和便宜。

因此,“劳动后备军”及其随时准备积极服务的成本,现在是全球性的,但所有的福利供应都受到国界限制——如国家权力本身——都是地方性的。国家的手臂太短,触不到真正的要害。对资本的扩张和安全而言,旧式国家的协助已经大体变得无关紧要。地方性的企业家非常清楚,如果他们还要继续经商,

最好是超越地域,最为的需要的是他们的总理和外交部长担任贸易代理人,在他们的外交之旅期间,让目标地的权威对他们产生好感,如果需要的话,还要补助旅费。

因此,最主要的利益,也可以说是诞生在福利国家摇篮里的众多利益中的主轴,已经脱离了曾经持有的计划。没有这一主轴,整个利益群就会土崩瓦解,而且首当其冲,就是丢掉了经济基础。鉴于为劳动力的“再商品化”付出已经无利可图,也很可能不再需要,称职的企业家用他们新获得的全球自由,在被要求承担福利成本的时候,把他们的钱和企业带往国外。坚持要维持福利国家水准的国家,因此承受了“双重打击”的恐惧:无家可归者与无继承权的人成群而入,而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则蜂拥而出。

可以想象,唯有容许降低当地的劳动力成本,雇主们才有可能被说服而留下来;但是在这一点上,由国家所保障的最低生存水准,也就是福利国家观念的核心,是一个主要的阻碍,而不是帮助。此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将当地劳动力大规模贫民化,就长期而论,或许更快,就能证明反生产性。地方性的被雇佣者,同时也是当地的消费者,正是针对这些人的偿付能力和购买意愿,日常性消费品的生产者才会怀有经济成功的希望,并寻求抵挡利润下降和破产的保障。

即使遭受经济基础崩溃的威胁,难道福利国家不能依靠其曾经享有的跨政党和跨阶级的政治支持而继续维持吗?毕竟,历史近来不断地向我们展示,民主越有包容性,就会越坚定地倾向于保护弱势,以及以集体的保障来对抗缺陷。投票权成为普遍权利之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权利赋予那些承诺这么做的政客——以集体的力量来修补个人蒙受的挫折和痛苦。福利国

家的原则在民主的手中,似乎是安全的。事实上,由国家管理的对弱势保护的成长势头不可遏止,引致 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这样的政治学者,将社会权利纳入到民主公民权的观念中,认为这种权利是民主逻辑的必然产物。

流行的理论对这种逻辑的解释,则是有点浪漫地指出,这种民主实践会培养出一种共同承担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区之福利的责任感。有些分析家则指出,由于政治社群的成员里没有人——包括目前较为富裕的——能够在没有可靠的安全网的情形下,真正确保其身为公民的地位安全,保证不会跌落到体面生活的标准之下,因此,即使那些目前能够依靠自己的人,也不能离开某种形式的集体保护。换句话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主政治的明显逻辑使得观察家们假定,虽然有某些人比其他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而且需要的更为急迫,这种服务的存在与其普遍可及性,是所有人都“很明白”的好处。

111

### 满足的大多数?

二十年来,政治生活的事实似乎否定了前文的推论。在各个国家,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执政党,都明确要求缩减福利供应,或是允诺更为优惠的个人所得税,这其实不可避免地有同样的效果。“增税”成了政客口中的诅咒,选民们耳中最讨厌听到的东西。

政治序列上的各个政党,在这一点上的意见惊人一致,这也让某些分析家,作为一种主要争论,断定一种新的“团结”方式的出现;一种“超越左右”的新的政治共识。这种论断所粉饰的是过去的事实,直到不久前,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是完全不分党

派的问题，“超越左右”，是跨阶级团结的真实基础和表现。对于福利国家政策的态度，传统上都获得了广泛的民主共识。时至今日，和半个世纪前相比，情形还是如此，只不过当今赢得共识的态度，刚好与先前几乎得到全体支持的态度相反。民主共识这种轴心的转变，也正是需要解释的地方。

对这种令人吃惊的公众情绪的转变以及在政治上的效应，没有人——仅在二十年前最富有洞察力的学者也无法预料的——比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关于“满足的大多数”的讨论中所提的解释更好了。加尔布雷思问道，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选民，如何能够自由支持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自从投票权成为真正的民主权利，从有产阶级扩展到所有成年人，成为普遍权利以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

112 这种状况一定有个好的理由。毕竟，贫穷与懒惰的人，不能糊口维生、自食其力的人总是少数——甚至是政治上可以忽略的少数。此外，他们也不会去投票；忽略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一向相当容易，而且绝对不会危害政客的政治生涯。偏向于将财富重新分配，消除不平等，以及首先是由集体来保障个人的所得，持这种想法的大多数人，一定是来自社会的不同地方。这其中当然包括“中间选民”，离极端贫穷还有一段安全距离。那些投票支持国家设立安全网的选民，一定不是那些有必要立即使用这张网的人；这些人甚至满心希望永远没有必要用到这张网。面对这项议题时，他们一定是以利他的行为：准备好个人的牺牲，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不会得到回报，而且最好任何时候都不要有所回报。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最为可能的是，驱使他们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自信。他们可能努力自我经营至今，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

的运气——既然这是个关乎运气的问题——会持久吗？他们周围的世界总因为不平顺、不调和和不稳定而声名狼藉。在这个世界里，可以见到最耀眼的财富消失得无影无踪，把无数地位不那么显赫的、有弱点的生命拖进深渊。一个人需要怎样足智多谋，才能真的保证安心度日？这种安稳所需要的根基，难道不比任何个体的勤奋努力所聚集起来的更加强大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这似乎是个相当合理的问题；而在这种修辞之下，就只能获得一个，且仅有的一个答案。

不过，情况一定已经变化了，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问，如果问，也暗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大多数中间阶层的选民似乎相当确信，如果自己照管好自己，也能过得更好。他们依然需要保险来抵抗厄运和其他的意外，因为相比之下，他们并不比父辈们控制得更好，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私下可以担负的保险，比起国家提供的低劣而且平均水准下滑的服务，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利益。一言以蔽之，新的情绪不单是自信的问题了，而且是对于这一事实的清醒的思考，即虽然依赖自己无可避免会引致风险，但其他选择似乎更不讨人喜欢。

这种新信念（或者说是对于无可避免之事的认命）改变了有所牺牲以便维持福利供应，以及这种供应的价值之间的平衡；或者，这至少修正了在平静和快乐的时刻衡量这种平衡的方式，因为这时请求国家援助似乎是缘木求鱼。多亏了赋税降低，使得钱都进了个人的口袋，比起异常抽象的公共关照的可能性来说，这似乎是个更好的前景，而且这种关照的水准和吸引力正在下降。用当今很容易理解的方式简单来说，公共供应，不是“好的投资对象”。

中间选民看待财务成本和福利利益之间的平衡方式，还因

为另外两个原因而有所改变(当然,通过简单地使其他选择看起来不那么有吸引力,从一个侧面强化了自信和自我依赖的欲望)。

第一个理由是家庭状况调查的长期效果。效果之一是福利服务品质持续以及无可挽回的恶化。和所期待的一样,一旦这些服务只保留给需要的人,这些服务就无法依靠那些(至少目前为止)“不需要”的人的政治力量,因此,便自然成为意图减税的政客们所寻求的可以节约开支的目标,以此来迎合那些更为幸运的人的口味。另一方面,需要的人却明显缺乏任何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

最近胜选上台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府(socialist government of France),首要的目标是符合加入单一货币所需的预算标准,于是迈向了长期以来一直避免的家庭状况调查之路,就迄今为止普遍适用的家庭津贴,实施了所得上的限制。就此,塞尔·哈利米(Serge Halimi)总结了其他较早踏上这条道路的国家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观察:

一开始是拒绝中产阶级平等享用某些集体供应。然后,这些供应越来越显得是和那些被剥夺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是唯一的得利者。供应的总量不断缩减,依照美国式的说法,这个法则就是“为穷人设计的方案都是糟糕的方案”。迟早会发现“欺诈、蒙骗和滥用”:一个单身母亲,通常是黑人,利用食物券买了伏特加(这是里根政府主政时期不断重述的部分),不负责任的穷人,由于福利供应的鼓励而生育等等。在最后阶段,福利保障完全得不到支持,中产阶级对维持福

利措施不再感兴趣,同意将其废除。<sup>⑭</sup>

把福利国家的利益限制在潜在选民中被政治边缘化的那些人,是降低这些利益品质的完美处方,其水准降低到在人口中不那么赤贫的人眼里,即使是那些私人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可疑的保障,相比之下看起来都很奢华。(不过,有趣的是,衡量国有保险公司恶化的程度,同样降低了私人保险所提供保障的品质,也降低了一般的期望水准。)福利供给恶劣(且日益恶劣)的品质,是反对所需支出的最佳论证:这些服务的价值变得如此低劣,以至于大部分选民认为花上面的钱都是浪费。

拖沓的家庭状况调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附着在福利接受者身上的污名。这个讯息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于,就算不用这么多字来说,就是,需要帮助就是失败的象征,表示自己无法赶上大部分人似乎很容易达成的生活水准。申请救助就是承认失败。那是个耻辱的、自我排斥、自我边缘化的决定,这有鉴于这样的事实:大部分人似乎从来不使用公共财富(不论是以税收减免、职业特惠和津贴,或是直接与间接的商业补贴形式所获得的利益,在公众的话语中,是他们的信用,而不是债务)。申请救助是最没有吸引力的前途,使得所有备选出路,不论品质如何,看来都更加合理且令人向往。

第二个理由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消费文化的确立。消费主义最为重视的是选择:选择,纯粹形式上的样态,本身便是价值所在,或许是消费主义文化里唯一不需要,且不容许,证明其正当性的价值。选择是消费社会中的“元价值”(meta-

---

<sup>⑭</sup> S. Halimi, (1997) Allocation, equeite, egalit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ugust, p. 18.



value),是评价与排列其他一切价值的价值。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消费者的“选择”不过是竞争的反应,是市场的活力源泉。要生存,进而繁荣兴旺,消费市场首先就必须依照自身的形象来塑造消费者:选择是竞争所提供的,而识别,则让这种选择更有吸引力。

有识别能力的消费者的神话,与作为自由选择的供应商和自由偏好的捍卫者的市场的神话,彼此相互滋养陶冶。若无前者,后者便难以想象。正确的消费者类型,应该是珍视选择的权利,胜过被选择的对象,并且把对市场的介入,颂扬为鉴赏能力的公开展示。各式各样的展示货品,以及各种选择的可能性,可以把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抬升到鉴赏家的行列,而身为一位技巧娴熟,有教养的挑选者,在消费社会里——根据挑选能力来区分阶层的社会——是最令人垂涎的奖赏。确信自己身为有教养的挑选行家,是十分可喜的事情。<sup>⑮</sup>

---

<sup>⑮</sup> 这一点当然是幻觉,许多研究消费主义的学者已经多次指明,但这种幻觉保护了现实,若无此幻觉,则消费市场的现实便无法运作。事实上,选择的允诺和明细可见(使是标准的麦当劳牛肉汉堡,你都可以吃它的好几种化身),诉诸活力充沛、精心讲究的选择之爱,企图吸引有希望的消费者光临,来到选择相当固定而有限制的市场。不论消费者的选择为何,他们永远不会脱离市场所提供的选择范围,而市场所提供的选项本身,并非由消费者决定,而是由不加选择,并非由民选的经理所指定——全球公司越来越能够垄断对消费市场的政治。如维达尔(Vidal)(在《汉堡的帝国》一书中)发现,“在八个部门里,包括汽车、太空、电子、钢铁、军火和媒体,前五名公司控制了50%的全球市场。”他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再局限于金融方面,还是文化性的。它开始支配生活的根本要素。十家大企业现在几乎控制了世界生物链的每个面向。四家企业便控制了全球90%玉米、小麦、烟草、茶叶、凤梨、黄麻和林业产品的出口。”

无可选择的情况——拿取自己唯一能获取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提供其他东西;在选择时无话可说——据此,这是消费社会的反价值。被剥夺了选择权本身就是令人丧失体面羞愧的事了,无论对失去选择的人的所得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令人深感不满、乏味无趣且懊恼烦闷的状态。商品在被挑选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它们的荣耀与魅力;如果不去选择,它们的诱惑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一个“被自由选择”的对象,拥有赋予挑选者独特性的力量,而“分配”的物品,则显然缺乏这种能耐。因此,成熟的消费者会把选择置于相对稳定的配给与分派的物品上,即使伴随了风险和不熟悉,以及尝尝让人惊骇的陷阱。<sup>①⑥</sup>理想的消费者类型会忍受大量相比之下品质低劣的消费品,只是因为这些产品是“自由选择”的,而不是分配的。

因此,不论供给的品质如何,福利国家制度与消费社会的气氛格格不入。如果产品营销没有促进(至少是口头上),对差异与选择的崇拜就不能运作,那么不去诉诸人类状况、人类需求和人权的同一化的福利国家的理念,就几乎没有意义了。因此,消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意图相互矛盾。几率对福利国家不利;消费者精神上的压力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即使国家提供的服务比现在更好,还是承担了一项基本的缺陷,即缺乏依其申述的自由

---

<sup>①⑥</sup> 让我们回忆一下,西方对抗极权的宣传战里,最有效的指控之一,便是商店里缺乏选择。消费者是否要承受饥饿和匮乏的痛苦,或是享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不是都能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质量如何,而且没有选择医生的自由;不是学校或房产的价格或可及性,而是缺乏选择的能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的国有服务非常优越,但对其缺乏“消费者的选择”的普遍不满,这严重破坏了公众对这种服务的支持。

消费者选择——这项缺陷在已经转变的，全身心投入的，“重生”的消费者眼里，简直是无可救药。

## 导致毁灭的成功

说了这么多，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转变为精明的消费者？为什么现在又有数量相当多的人偏爱自行从事消费者选择，而不去依赖风险较低而且有保障的一切基本必需品的供应？为什么现在有相当多的人满足于依靠自己的资源，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许下面的例子，可以提供了解个中缘由的洞察力。

在过去大约十年里，一波反对所谓“特别保障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指在就业、晋升和大学入学方面，偏向于那些来自公认的社会贫困阶层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者，他们与那些社会地位较高，“有文化的”白人公开竞争，机会很少）的抗议横扫美国，并得到了里根—布什时代所任命的最高联邦法庭保守派成员的帮助与教唆。这项抗议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因为许多白人家长对于自己的子女取得较高的考试成绩，却因为大学位置被名义上比较低劣的学生占据，感到既困惑又气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越来越多、数量可观的非裔美国人加入了抗议行列。事实上，第一位根据“废除纲领”，要求结束“特别保障法案”而赢得国家立法席位的第一位民主党员，就是一位富裕的加州黑人企业家康纳利（Ward Connerly）。虽然遭受许多黑人与西班牙裔积极分子的责难与诽谤，康纳利还是在人数日益增多的非裔美国人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的行列中，得到相当多明显的或隐性的支持。击中这些人心中尤其敏感的心弦的论点，是自我

肯定的尊严。“特别保障法案的出现”，轻视并贬低了许多“付诸实行”且“办到了”的黑人的成就。如果没有人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名不副实的——只是个礼物，而不是刻意努力、个人才能、勤勉工作以及选对生活方式的结果，那当然会更加令人满意。

康纳利的支持者实际上是说，“我们不需要拐杖”，“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腿行走自如”。但是这种突然的自信来自何处呢？答案就在康纳利的话里：“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比赛场地现在已经更加平整了。”<sup>①⑦</sup>但是比赛场地的平整，要归功于“特别保障法案”，这是该法案无可否认的成功与历史性成就。三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目前的年收入等于或超过全美平均水平（目前为3.5万美元）；二十五年前，达到这个标准的黑人家庭还不到四分之一。超过五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目前的所得令人骄傲，超过5万美元——在美国，这算是富裕的指标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黑人律师、医生、公司经理，这些人的声音得到了倾听，也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如果没有“特别保障法案”，这一切还会发生吗？根据纽约大学法学院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有3435名称为法学院学生的黑人，因此有机会获得了全美利益最为丰厚的职业，而这些人当中，只有687人是依靠他们的考试成绩而获准入学的。

我们可以说，在不到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特别保障法案”达到了类似推动福利国家的奠基者的目标：它“自行完成了工作”。但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其也一定不是按照想象者

---

<sup>①⑦</sup> 这句话以及后文的引言，取自 Martin Walker 的文章“God Bless (white) America”，*Guardian*, 17 May 1997。

们的设想的方式进行的。由于积极的差别待遇,新兴的,有自信的黑人中产阶级诞生了。这些人不希望被提醒他们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和其他美国人的作为一样,或是假定如此,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勉,而是因为他们得到帮助获得了机会,才取得了今日的成就。他们大声而清晰地宣称,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每个人都能做到,如果有些人不行,那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这样的宣称是他们自尊宣言的一部分。毕竟,这意味着,那些做到的人,是因为真的努力过而做到的。

这个论调如果要言之凿凿,他们那些更为贫穷且资源更少的同胞,就要遭受怀疑而且被蔑视;首先,需要要求破除“特权”,那些“烦恼”让人想起自己“遭受损害”(因为被协助)的历程。那些已经到达顶峰的人,不再需要国家提供的梯子,而且巴不得把梯子送到废料场去。那些最先借助梯子攀爬的人,也是最先声称梯子失去了作用,并抱怨它给使用者造成了不法的、不体面的阴影。

然而,对福利国家或“特别保障法案”的创始者而言,这不是“自行完成工作”的意思。他们心中所想的是要摆脱贫穷,那正是集体的关照和正面差别待遇有必要的首要理由:弥补机会的不平等,使得机会均等。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大为不同:那些得到社群协助,脱离原来最初劣势处境的人,不但不再需要帮助,还成为这种制度最激烈的贬损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特别保障法案”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毕竟,从贫民区直接跻身到中上阶层的富裕的黑人从业者,比起他们的白人新同事,想当然觉得自己可以去责难“哺育期”,且有更多机会发声,而且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既真诚又可信:他们到达了,他们做到了,他们证明了他们能够办到,所以其他人也要这么做。但是,如果分数的

调整和肤色有关这样“不体面”的办法不再实施,其他人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吗?在德州大学法学院,去年有5.9%的黑人新生。而今年,积极的差别待遇宣告不合法之后,这个比例将只有0.7%。有谁能够将康纳利的愤慨带到下一代呢?

“特别保障法案”和福利国家当然是不一样的情况(最原始的福利国家观念反对任何差别待遇,而福利国家在后期所推动的差别待遇,根本谈不上是“积极的”),但是“自行完成工作”的社会-心理机制,在这两种情况里的运作方式很相似。加尔布雷斯的“满足的大多数”,很大程度上是福利国家的产物,是其成果的积淀。

福利国家一点也没有接近其奠基者永远消灭贫穷、耻辱和沮丧的梦想;然而,福利国家确实产出了一大批教育良好、健康、自我肯定、自我依赖、自信的人,为了维护自己新获得的独立,却把成功者协助那些依然失败的人作为责任的理念连根砍断。对这代人来说,他们从福利国家那里获得力量,如果不是因为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社群,提供了物质协助和令人安心的支持,这些“白手起家”的男女,就不能成功;但那种认为集体保险和社会工资无法主宰自己的论调,却正是这群人最听得进去的。不过,这种论调的真实性,是否会比最愿意接受这些论点的人还要长命,那就不清楚了。

如乌拉考特最近提出的,有很好的理由假设,那些目前主张大反转的人,提出的福利国家真正或被加诸矛盾的做法,事实上可以浓缩为:

仅仅是利用了历史上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福利国家所创造的社会资本还没有完全消散,而福利国家衰退所造成的新社会成本,也还没有很庞大。福利

国家和非福利国家的社会成本都很高,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转型的国家,其社会成本却可以因为忽视或造假,而显得很小时。可能是很小,但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sup>⑮</sup>

---

<sup>⑮</sup> M. Woollacott, (1997) Behind the myth of the self-made man, *Guardian*, 17 May.

## 第四章

# 工作伦理与新穷人阶级

19 世纪早期,工作伦理的倡导者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主题。在那个时期,劳动力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生产更多东西和往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是一码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渴望生产更多,而越来越多的贫民则不愿意如企业家所期望的那样工作。可以想象,工作伦理能使这两者相调和。工作可以在使国家富裕的同时消除个体贫困,这一观念听来可靠。

123

到 20 世纪后期,工作伦理再次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它在诊断当前的弊病与提供纠治的药方两个方面都凸显出来。它在以工代赈计划(welfare-to-work)中尤为突出,尽管这一计划由美国首创,但自从实施以来(不考虑其不确定的后果),其他富裕国家(包括英国)的政治家们都艳羡不已。汉德勒(Handler)和哈森费尔德(Hasenfeld)指出 WIN(美国以工代赈计划的代称)

……从其开始实施以及在其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证明 WIN 的说辞与其事实上的影响几乎没有关联。所有现存的证据表明,这项计划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后果……工作政策与计划以多种形式得到存续,尽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表明它们总体上并未能显著地减少救济名单或改善穷人的经济自足水平。因此,它们存续的



理由不在于对穷人和福利的有利影响,而在与它们对非穷人的效用。<sup>①</sup>

现今享受福利的穷人不愿意参与生产劳动,不管是真实的或是假定的,都不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增长。当今的企业不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增加它们的利润,即便确实需要,它们也可以轻松地其他地方找到,并且条件可以比在本地获得的更优惠——即使这么做会使本地的穷人更加贫穷。根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目前世界上有13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甚至以下;按照这些标准,在富庶的西方——工作伦理的发源地——仍然有1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在今天大企业的世界中,进步首要地意味着“缩编”,而技术进步则意味着电子软件对劳动力的替代。对接受救济者不愿意工作的谴责,以及认为他们只要摆脱麻木与依赖的惯习便很容易谋生的推论听起来多么有双重性,则被这样的潮流所证实:股票市场——企业利益的并非刻意忠实的代言人——对就业的波动会作出反应。这不仅仅是股市缺乏热望迹象的问题,更不用说当一个特定国家的总体失业呈不断加剧会引起股市恐慌的反应;对于就业率不会上升的消息,股市会作出反应,并且这种反应是激烈的。1996年6月至7月美国新的就业机会减少,正式失业人数因此上升,这一消息被以“就业数据振奋华尔街”为题报道

---

<sup>①</sup> J. F. Haddler 和 Y. Hasenfeld, (1991)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London: Sage, pp. 139, 196 - 197. 据“作者序言”,1971年WIN的架构中,评估了270万人,但实际登记只有11.8万人,而且其中只有20%上工至少三个月。中等公子是2美元/小时(p. 141)。

(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上涨了70点)。<sup>②</sup>AT&T的股票价格在公司宣布裁去40000个岗位的当天大幅上扬<sup>③</sup>——这一现象几乎每天在世界上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重演。

## 定居者与流浪者

罗伯特·瑞克(Robert Reich)<sup>④</sup>认为,当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四种受雇者:第一种,是“符号操纵者”——发明家、广告商、分销商和推销商;第二种,大部分是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教育者,在可雇用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劳动力和商品一样是可以购买和消费的)起着积极作用;第三种,是受雇于“个人服务”(通过消费能力来补偿其他人)的人——大部分是产品销售员和需求的刺激与培育者;第四种是“常规劳动者”,他们附属于传统的生产线及其“新式的、改进的”版本——自动化、电气化设备,如超市的收银机。

显然,最后一种受雇者在出卖劳动力时遇到的困难最小,其潜在的购买者不会特别挑剔。由于他们不需要掌握稀缺和特别的技术,在与顾客面对面打交道时也不需要特殊的聪明才智,“常规劳动者”在低技术的有偿雇佣中很容易变换工作。但出与同样的原因,他们很显然非常容易被用而弃之:他们的工作历来是不稳定的。雇主可以轻而易举的替换掉他们而不会有任何

125

<sup>②</sup>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 - 4 August 1996.

<sup>③</sup> C. Julien, (1996) *Vers le choc social*, *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er.

<sup>④</sup> Robert Reich,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损失,在业绩发展放缓时他们可以被裁员,因为一旦情况复苏,有大批像这样的人可以随时雇用。可见,“常规劳动者”没有“令人生畏的力量”,没有谈判的资本,没有赢得获取更好雇佣待遇和条件的机会,否则他们就能够和愿意去为之奋斗。

奋斗的需求,特别是与像他们这样的人很难有共同的奋斗需求以采取一致的行动。几乎所有的情形都以此为背景。这种类型的工作是脆弱的,随时可能消失而肯定不会持久;今天的伙伴几乎肯定会迁移到通常很远的地方去;今天还在一起的同事明天或后天可能就不在了……投身于工人之间的团结与集体抵抗,需要长期的、充满风险的努力,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要耗费巨大的难以估量的成本。如果这种情形长期持续而没有任何改观,那么这些受雇者的世界观和态度就会有相应的调整:“在今天挣尽可能多的钱而不管明天会怎样”、“人人为己,团结无益”潜移默化地成为毋庸置疑的训诫和谨慎有效的生存哲学。

126

如此而言,“常规劳动者”一词看起来有些误导。第四种受雇者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活动可能是单调、没有创造性和无趣的,对技术的要求很低,就像福特式工厂中旧式的常规工作那样。至于其所秉持的态度与行为表现为涣散,原因在于其公认的易变、狡猾、暂时、短视、短暂和朝三暮四等秉性。他们的工作是常规的,但其雇佣关系并非如此。“常规”意味着单调的重复,因此这也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受雇佣期间日复一日从事受人支配的活动。但这种常规性工作却使雇佣本身即获取这些工作并不常规。

即使是最常规、没有灵感和不振奋人心、无趣和有失尊严的工作,也青睐稳定、牢固和持久的人际关系,只要(也因为)人们

期望这种关系可以长期持续——事实上是希望它能恒久。认为“我们同舟共济”，并且无论发生什么都很可能不会改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促使人们追寻和培育最令人满意的或最少压迫的共存方式。然而，当一个人发现在接二连三的考勤中自己都是在不同的公司时，怎么还会为此烦虑。在这样的确定性下，所有持久的团体、牢固的责任和坚不可摧的友谊看起来都是挫折与伤心的秘诀。如果你碰巧喜欢你所供职的公司，并把它纳入到你未来的规划中，那你肯定会在下一轮的“外包”与“合理化”中遭到伤害。总而言之，这种致命的转型冠之以“劳动力市场的波动”给未来可能产生团结与持久的机会蒙上了阴影，更毋言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的、无条件的责任与忠实。

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在时隔20年后再次访问纽约的一个面包店，<sup>⑤</sup>他发现“员工的士气与动力在不断的压缩精简中急剧下降。生存下来的员工等着下一波削减的到来，而并未因为其与那些已被解雇的员工较量中胜出而沾沾自喜。”无论(已经)受罚还是(暂时)生存，他们培育着怨恨，并以同样的方式屈从于恐惧。这也有充分的理由：

在所有形式的工作中，从雕刻到餐饮，人们承担有难度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在这样充满变数的工作场所中，持不同语言的工人毫无规律地来了又走，每天有截然不同的订单到来，而唯一不变是机器，它成了真正的秩序标准，因此不论由谁来操作，都应当是简便易行的。在

---

<sup>⑤</sup> Ricard Sennett,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 50.

易变的机制下,困难将无益于达到目的;但由此带来一个悖论:当我们消解这些困难和阻力时,我们同样也为使用者的缺乏批判和漠不关心的行为创造了条件。<sup>⑥</sup>

对于临时性、可替换、用完即弃的“常规劳动者”而言,只要他们还在受雇之中,其身体在工作场所而精神却往往没有如此。工作场所是生存之源,但并非生活意义所寓;更不是牢固的、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的温床,因而也就不足以来支持和延续伦理律令和道德实践。在“变动不居”的工厂、办公室、车间和商店内部,“工作伦理”的训诫显得空洞无物。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工作本能”如果完全克服了这种变动性,则会寻求在其他地方来实现,并且消费者市场随时愿意提供可替代的空间。专业技能所带来的自豪感此刻可能转由购买优势(以适当的代价)带来——在迷宫般的大卖场里发现最实惠的“特卖”、在售货车上发现最优惠的用具或在货架上发现最好的小玩意儿。

被瑞克称为“常规劳动者”(临时和无常的、用完即弃和可以替代的,与其工作和工作场所关联薄弱)的人们没有资格要求,更不用说获得与雇佣他们的公司之间的亲密关系。雇员与其老板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称的,依赖也不再是相互的。“福特式工厂”的时代——巨型、庞大和笨重的工场中充斥从本地招来的工人,老板们的财富和利润仰仗其雇工的协力和士气,而工人的生计也依赖老板的仁慈——结束了。依赖不再是相互的,而

---

<sup>⑥</sup> Ricard Sennett,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第82页。

是单向的。求职者还和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没有迁徙的自由，其生活主要依赖于本地的工场——而资本现在却可以不受限制地流动，不必为距离和疆界所束缚。通常回答来自肖迪奇或维克菲尔德的电话咨询者的声音可能来自孟买或加尔各答……

资本所有者在招收工人时不再局限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没有理由不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和拥有大量要求不高、温顺和不惹麻烦的工人的标准来选择生产地。适合以及迫切要求成为“常规劳动者”，并可以以任何甚至非常低的工资水平接受任何工作的人到处都是。资本所有者完全没有必要承担由于本地劳动者日益膨胀的自信（和由此日益增长的要求）所带来的不安（和高的成本）——他们会受到长期雇佣的鼓励，和通过足够（太多）时间培育、增强和固化的团结来加强实力——当面对游走的资本时，本地的劳动者就没有机会阻滞，更不用说捕获资本，因此也就更少有机会可以为其权利要价及实现其野心。

129

但换成另外一种情形，即非常规的“获利受雇”是怎样的呢？

在雇佣频谱的另一头、接近权力金字塔顶端，是那些丝毫不受距离和空间影响的人：四处流动而不拘于某地。他们轻巧、活跃和易变，正如支持其产生和游走生存的、日益增长的全球和跨境贸易、金融那样。雅克斯·阿塔利（Jacques Attali）<sup>⑦</sup>这样描述道：“他们没有工厂、土地，也没有行政职务。他们的财富随身而带：深谙迷宫规律”，他们“酷爱创造、游戏和迁移”，他们生活在“无固定价值标准、对未来无忧无虑、自我中心和享乐主义的”社会中。他们“把新奇事物当作好消息，不确定因素当作价

---

<sup>⑦</sup> Jacques Attali, (1996) *Chemins de sagesse: Traie du labyrinthe*. Paris. Fayard, pp. 79 - 80, 109.

值,不稳定当作律令,混杂当作丰富”。在不同程度上,他们掌握和实践了“流体生活”的艺术:能接受失向,对眩晕免疫,对头昏能进行调适,能容忍没有指南、指导以及时间不确定的旅行。在提及这类人时,匿名为“赤脚医生”的《观察家》<sup>⑧</sup>专栏作家劝告人们优雅行事。按照东方超脱和宁静的先知老子的看法,生活状态应达到这样的效果:

如水流动……应当轻盈移动,不逆流而动,不停滞不前或留恋外物,诸如财富、地位或人。不要持守你的观点或世界观,而只是明智地保持它原来的样式大度地顺其自然而不刻意索取……

有照此行事的手对手存在,“常规劳动者”的战斗未战已败。并不必然是因为其对手的强大力量和技术,而是在于其“无怨无悔”的生活态度,他们选择逃避,竭力拒绝介入和履行责任,熟谙霍迪尼式的脱身术(霍迪尼可以从密封的牢笼中逃出和打开绝大多数复杂的锁)。

需要确定的是,“锁”顾名思义是力图捕获或至少减缓新的全球精英的全球化步伐,但它不是特别精密和牢不可破的;政府力图封堵资本所有者的牢笼也没有很多把锁。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资本的流动性对利率和汇率产生了影响;跨国公司的变动性侵蚀了控制投资区域分配量的机会,技术人才和专家的全球流动

---

<sup>⑧</sup> See Barefoot Doctor (2003) Grace under pressure, *Observer Magazine*, 30 November, p. 95.

使得对收入和财产课征累进税进而维持公共服务的水平增加了难度。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幽灵萦绕在所有工作之上。雇佣的类型区别仅在于其为受雇者进行抵制所能提供的资源上,针对雇主以及雇佣关系所呈现的反复无常,雇员则通过类似的弹性和“汽化”的服务以及转换雇佣来进行反制。没有哪种类型可以确保免于失业,也没有人可以免遭曾被称为“长期性失业”的境遇——现在更为经常和贴切的说法是倾向于称之为“过剩”。如果“失业”甚至是长期的失业意味着是工作生涯中短暂的一段,“过剩”更符合当前工作流失的性质。它意味着灾难的终极性和不可逆性,凸显了通往垃圾场的单向通道……

## 从“失业”到“过剩”

131

“失业”(unemployment)一词,直到近来一直被用于指代那些没有工薪来源的人,表征了受雇佣才是“正常状态”的潜在假设。“un”这一前缀标示了异常——奇怪的、不平常的和暂时的现象,如所有异常现象一样需要矫正,并且这样的矫正是立竿见影的。即使在经济发展放缓或陷入萧条之时,“充分就业”的光景是稳固的:一旦我们摆脱目前的低靡状态——我们是肯定可以的——工作机会就会纷至沓来,每个人因此也就可以获得工薪。

然而,不管怎样,萧条之后的复苏几乎没有可以成功地达到萧条以前的就业水平。无论当前的 GNP 和 GDP 统计数据如何鼓舞人心,工作机会还是继续消失,而徒劳地找工作的和因为绝望而放弃努力的人却在持续增加。先是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最终还是无情地。



“前进之路”的经济理念要求转变：以更少的劳动力完成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多的工作，简化招聘所需的管理。随着经济周期的演进，“失业”所包含的（就业）允诺公开地被抛弃，其所激发的希望也更为黯淡。与此相关，充足的经验累积而成一个真正的“转型范式”：“失业”这一术语被“过剩”所替代。

与旧的术语不同，新术语没有包含任何哪怕是间接的或隐含的承诺。没有“非常态”及其推论的暗示，即当前迷思的短暂特性；也没有失业只是短暂的刺激因而很快能处理好的暗示。在“失业”的语境中，失业者被认为处于可雇佣状态但却暂时失业，并被希望一旦形势好转就能回归到生产者角色，进而又“一切 OK”；“过剩”则与之不同，它意味着多余、超编和不需要。无论劳动者是生在了一个“满员”的社会中（不需要更多的人来从事生产社会自身存续和发展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还是由于后发的经济与技术进步导致劳动力富余（发展了新的能力，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和人力就可以满足社会对产品和服务与日俱增的需求）。人们声称“剩余劳动力”是在经济平衡的借方而非贷方，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都无法为社会增加财富，相反是增加社会的负担（“公共支出”）。他们是“资源汲取者”，是尚无找到解决之道的“问题”；“经济上活跃”的那部分人口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貌似无法创造出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和积极投身于服务。从现实的意图和目的来看，没有这些剩余劳动力经济会发展得更好；而没有更好的经济发展，他们只能徘徊在经济活动之外。

无论“回归工作”的理念变得多么含糊、幼稚和表里不一，都佐证了对“繁荣”以及经济生活趋向“好”与“坏”的理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一项对欧洲大公司现状的权威而深入的分析

中(题为“欧洲公司苦有所获”,次级标题一语中的:“削减成本带来了利润,如果不是带来工作的话”。参见:《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11月17日),汤姆·伯克尔(Tom Buerkle)对欧洲经济的“正向发展”欢欣鼓舞:

迅速改善的图景显示欧洲公司正开始从近年来痛苦的重组中获得回报。遵循1980年代美国公司所采取的方式,许多欧洲公司一直在裁去冗员、关闭或出售其认为无关紧要的业务,简化管理流程以提高获利能力。

利润确实增长很快,这使股东们感到欣喜,也得到资深分析家们热情的认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副作用”随之而来。伯克尔也承认“这一新近的欣欣向荣不大可能立马减少失业”。事实上,就在过去的六年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英国下降了17.9%,在德国下降了17.6%,在法国则下降了13.4%;就是在“正向发展”先行大约十年的美国,这一指标也“仅仅”下降了6.1%,唯独是因为早已“剔肉到骨”。

根据对当代欧洲人所关心、焦虑和恐惧的调查,备受其煎熬与威胁的失业毫无疑问占据头号位置。其中一项调查(由MORI完成)表明85%的芬兰人、78%的法国人和瑞典人、73%的德国人和72%的西班牙人把失业看作其国家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与保障“稳健的经济”的标准是相关联的,而失业率的下降却没有在这些标准之中。事实上,为达到“经济健康”标准而不顾一切的努力被视为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创造工作岗位来提高就业水平的主要障碍。

把工作同时尊为最高职责、道德礼仪的状态、法律与秩序的保证,以及贫穷瘟疫的良方,它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相适应,呼吁

增加劳动力以增加产量。现今简化、精简、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则把劳动力视为提高生产力的限制性因素。在对曾被奉为权威的斯密 - 李嘉图 -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挑战中,过剩的劳动力被当作受谴责的对象,所有理性化(更高的投入产出比)探索都首先将可能性聚焦在减少雇员数量上面。从所有现实的意图出发,“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是南辕北辙的;技术进步以替代和消除劳动力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在如此情形之下,工作伦理的训诫与诱惑日益变得空洞。他们不再反映“工业需求”,也几乎不能被视作为“国家的财富”的钥匙。他们的持续,更确切地说是他们近来在政治话语中的复苏,也只能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解释:工作伦理被寄希望在我们这个后工业、消费者社会的时代中发挥一些新的功用。

134

正如弗吉和米勒的观点<sup>⑨</sup>,近来鼓吹工作伦理的复兴,服务于这样的思维:“区分值得帮助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归咎于过去,以证明社会对其的漠不关心”,因此“接受贫穷是由个人缺陷所不可避免带来的灾祸,继之以对穷人和被剥夺者冷漠无情。”换言之,即使工作伦理不再为减少贫穷提供途径,仍然可以调和社会与永远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社会能一如既往和平安宁地生存下去。

## 发现“底层阶级”

“劳工阶级”一词从属于这样的社会图象:在这样的社会中

---

<sup>⑨</sup> Z. Ferge and S. M. Miller (eds) (1987) *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ot; GOWER, PP. 309 - 310.

富人和穷人的任务和功能是分离的——不同但互补。“劳工阶级”描绘了这样的图景：这一阶级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一种角色，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对社会做出了有用的贡献，因而也期望得到相应的补偿。

“下层阶级”一词从属于社会流动的图象：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处于流动状态，每个位置都是暂时的，原则是服从与变更。“下层阶级”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人们站在或被置于阶梯的底部，他们顺着阶梯攀爬以摆脱目前的低级位阶。

“底层阶级”一词从属于这样的社会图象：这一社会是不包含一切，非全面的，整体小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底层阶级”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人们超出了阶级而在等级制度之外，没有机会也没有需要被重新认可；人们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有用的贡献，原则上超出了救济的范围。

人们以底层社会共有的形象集聚到一起，甘斯（Herbert J. Gans）这样描述：<sup>⑩</sup>

这一基于行为的界定把那些辍学的、不工作的、年轻的靠福利生活的单身母亲定为穷人。此外底层社会还包括无家可归者、乞丐、穷困的瘾君子<sup>⑪</sup>和街头犯罪者。由于这个词有弹性，住在“廉租房”的穷人、非法移民

<sup>⑩</sup> H. J. Gans (1995)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p. 2.

<sup>⑪</sup> 正如甘斯指出的，“非贫穷的酒精中毒者可以在家，又是甚至可以在工作时喝酒，但是穷人经济被发现卧倒在贫民窟中。更甚者，生活境况较好的人，其道德上可疑的行为，常常最后变得完全合法，正符合了‘黄金定律’：拥有黄金的人制定规则。”（同前注，p. 4）

以及年少的混混也常常被包括在“底层社会”中。实际上,这一行为性界定的弹性使得其成为使穷人蒙羞的标签,无论他们真正的表现如何。

实在是一个完全异质和极端多样的集合。如何将它们放在一起而看起来是明智的?单身母亲与酗酒者、非法移民、辍学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一个确实标识他们的特征是:别人认为他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存在,并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存在他们可以过得更好。人们对底层阶级形成这样的印象,因为他们被视为完全无用——我们这些其余人会因此而日子过得不错。他们是美丽图景上的污点,丑陋而贪婪的杂草,不但没有为花园的增添和谐的美,反而吸取了许多植物的养分。只要他们消失,其他所有人都可以获益。

136

既然他们是全然无用的,他们所带来的危险主导了对其的认知。这些危险多种多样,包括直接的潜伏在街角的暴力、谋杀和抢劫,令人良心不安的人间惨象所带来的厌恶和困窘,“公共资源的拖累”。<sup>⑫</sup>一旦怀疑有危险,恐惧就随之而来。“底层阶级”与那些看得见的、明显让人感到恐惧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些令人生畏的人。

无用与危险属于盖里(W. B. Gallie)所提出的“本质上竞争的概念”:当用其来作为标识的标准时,它们就会显示出“灵活

---

<sup>⑫</sup> 联邦和地方对各项福利的支出总额在1992年少于400亿美元,这点无关紧要,这个数字只是后冷战时期年度国防预算的15%,比年度抵押贷款减税的总额少了100亿美元,或者,只是企业补助和富人赋税优惠预算总额的六分之一。“军火商对五角大楼的依赖程度,或许等于贫穷女性对福利制度的一来程度”,这点也毫不重要。(同前注,pp. 82-84)

性”而使分类结果精巧地适于囊括所有最凶恶的恶人，他们萦绕于饱受折磨——对任何效用的持久性存有怀疑，以及弥散的、没有根据而环于四周的恐惧——的社会之上。在此影响之下，在人们精神世界中所构绘的地图为继之而来“道德恐慌”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所产生的区隔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展，将新的威胁吸收和内化，同时允许分散的恐惧集中到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由于具体而变得可靠。

毋庸置疑，这是底层社会的无用性为社会所提供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再也没有哪个行业或专业能够确信自己是长期有用的；而底层社会的危险性也为社会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服务——使陷于过度焦虑中的社会能够有信心地说出恐惧什么，和怎样缓和这种恐惧。

在冷战陷于停滞、基于恐怖的权力快速流失之时，底层阶级出现，关于底层阶级的讨论也达到高潮、并在“邪恶帝国”崩塌之后被推到了公众关注的中心位置，这并非仅仅是个偶然。危险不再是来自外部，也不在于“外部内化”——外国势力在国内的据点和桥头堡、由外部敌人扶植的第五纵队\*。外力煽动和培育革命而带来的政治威胁不再真实，也难以置信。危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生根，现在就必须寄身于社会内部，在本土生长出来。有人倾向这样说：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制出来；事实上，它已经如此这般地被创制出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乞丐、吸毒者和未婚妈妈——当底层阶级受到质疑时，这些“凄惨”的或“令人反感”的人经常会被

---

\* 源于西班牙内战，后来“第五纵队”成为帝国主义与其他国家中收买的叛徒和派人的间谍的通称。——译者注

搬出来。然而,这的确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的出现一点都无法证实底层阶级的存在。把他们归与同一类别是出于归类的需要,并不是对事实的决断;把它们混为一体,统统冠以无用和对社会其他部分有可怕的危险,是一种价值选择和评价,而并非描述。总而言之,当有关底层社会的理念被置于社会(包含维持其独立生存发展的所有要素的总体)可能小于其各部分总和的假设之上,这一理念所指的底层社会则是大于其部分之和:概括的行为会增加各部分自身所没有的品质。在现实中,“单身母亲”和“底层社会的母亲”并不是同一人。将前者囊括到后者之中花费了巨大努力(虽然只是个小想法)。

## 工作伦理沦为底层阶级

“底层阶级”一词是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首次使用的,用于标识“去工业化”的危险——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不是因为那些失业者自身的不足或道德过错,而纯粹仅仅是因为缺乏能满足所有需要和渴望获得工作的人的岗位。这不是工作伦理没有起到激励作用的结果,而是社会没有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训诫来保障生活的结果。在缪尔达尔看来底层阶级的成员是受到排除的牺牲品。他们新的地位不是自己选择退出的结果,因为这种排除是经济逻辑的产物,那些被烙上排除印记的人自身无法对其施以控制或影响。

底层阶级的概念则很晚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始于1977年8月29日《时代》杂志上登出一则封面故事。但那时底层阶级的含义与现在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是指“大量难以管教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带有敌意的人。他们是无

法触及的美国的底层社会。”这一定义后面跟了很长的列举,包括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暴力犯罪者、未婚妈妈、皮条客、妓女、乞丐——这些都是所有体面人显然害怕的名字和藏于良心深处的包袱。

“难以管教”、“疏离”、“怀有敌意”,从而无法接触,伸出援助之手也无济于事——所以就袖手旁观。这些人无药可救,因为他们早就选择了病态的生活。

无法触及也意味着置身工作伦理的范围之外。劝戒、奉承、扪心自问都无法穿透其自愿隔离普通人所珍视的一切的墙壁。这不是拒绝工作或更喜欢过懒散和寄生生活的问题,而是对工作伦理所赞成的一切公然怀有敌意。

肯·奥雷塔(Ken Auletta)于1981年2月对“底层阶级”的世界进行了一系列探访,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进行了报道,并于后来结集为一本被广为阅读和有影响力的书。他自己承认,这一切是为绝大多数同胞的热望所激励:

我一直在思索:日益膨胀的犯罪、救济和涉毒统计,反社会行为显而易见的上升,在美国大部分城市里蔓延,这些现象背后是什么人?……我很快了解到,在穷困的学生那里,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存在相当明显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通常感到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拒绝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蒙受着行为和收入上不足的痛苦。他们不是倾向于贫穷,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是不入正轨的。<sup>⑬</sup>

---

<sup>⑬</sup> K. Auletta (1982) *The Under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xiii.



请注意底层阶级形象被塑造和维持所仰赖的话语的措辞、句法和修辞。奥雷塔的文本可能是最好的研究点,与绝大多数小心翼翼的后来者不同,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抨击底层社会”上,相反,他走到另一个极端来保持和昭示他的客观性,对其故事中的反面英雄他同情与谴责参半。<sup>⑭</sup>

请注意“膨胀的犯罪”和“膨胀的救济”,以及救济与吸毒统计同时被提及,并被置于同一水平。因而不需要论证,更毋庸说证据,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彼此为邻和为什么都被划到“反社会”行为范例的行列中。不需要冒险直截了当指出贩毒和吃救济类似都是反社会的,是同样的祸害;对这一结果的含蓄提示(如果是明显的提示则肯定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已经通过纯粹的语法战略达到了。

也请注意底层阶级拒绝一般的价值,但其却只感到被排斥了。底层阶级在与由“大多数美国人”作为另一方主角的双边关系中,是积极主动、采取行动、争取主导的一方。正是底层阶级的行动、其单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审视,并被称为不符常规。另一方面,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按照法律来进行裁决,但其裁决的正是底层阶级的行动。如果不是其反社会的行为,底层阶级就不

---

<sup>⑭</sup> 大多数当今美国讨论底层阶级现象论述所使用的修辞,较符合班菲尔德(Banfield)强硬而无休止的用语:“下层阶级的人或在片刻之中……冲动掌控了他的行为,因为他无法自律,为了将来的满足而牺牲当前,或者因为他根本没想过未来。他因此极端短视:只要不是立即有用的事物,他便认为没有价值。他对行动的偏好胜于一切。”(E. Banfield(1968) *The Unheavenly City;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our Urban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pp. 34 - 35) 注意班菲尔德对“底层阶级”的诽谤,听起来像是对消费社会中“理想的消费者”的准确描述。在这篇文章中,如同大多数其他讨论一样,“底层阶级”是恶魔的垃圾场,这些恶魔纠缠消费者保守折磨的灵魂。

会受到审判。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案子要思考,没有罪行要惩戒,也没有过错要矫正,司法程序也就不需要启用。

修辞随实践而来,从中它进行追溯确证,提出本来在首次使用时可能会缺少的论证。这样的实践越充分,进行实践的动议也就越能自证其实,修辞中的诡计被认出的几率也就越小,更不用说进行反对了。奥雷塔的大部分经验材料援引自野猫技术培训中心(Wildcat Skills Training Centre),该机构的设立有美好的初衷:通过改造使公认的底层社会成员回归社会。那么谁有资格入选呢?四类人被给予在中心接受培训的平等权利:候选人必须是新近的囚徒或还在接受治疗的瘾君子,靠救济且没有6岁以下孩子的妇女,或17岁到20岁之间辍学的青年。制定接收条件的人必须事先判定这四种“类型”——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他们是如此不同——经受着同样的问题,或确切说表现出同样的问题,由此需要同样的矫治手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被置于互相的陪伴之下,服膺于同一机制,每天都接受有关他们命运存有共同点的指导。呆在野猫中心内部为其持续提供了所有他们所需的社会界定,因而他们合乎情理能够为之努力。再一次,道成肉身。<sup>⑮</sup>

141

---

<sup>⑮</sup> 奥雷塔的田野调查让他过于靠近收到标准化治疗的对象,以致他没有注意到概化的标准和整批的分类,在经验上有多大的缺失。但他在书末描述了底层阶级在力量协助下一致化的长篇故事,他写道:“我从有关底层阶级和穷人的报告中学到了一课,就是概化——像保险杆贴纸——是了解之敌。概化底层阶级……或受害者……或是几乎消费的贫穷……或政府是问题所在,都是危险的作法。从三万尺高空往下看,所有人事物都像蚂蚁。”(p. 317)可以预见的是,这类警告没人注意,在期刊、政治与公众讨论中,奥雷塔研究的作用在于巩固了对于了解底层阶级的一致印象。

奥雷塔竭力反复地提醒他的读者，“底层阶级”不是贫穷的问题，或者说至少仅用贫穷无法解释。他指出有 2500 万到 2900 万美国人正式地处于贫困线以下，只有“估计 900 万人不适应”<sup>①⑥</sup>而“越出社会可以一般认同的行为界线”，其“‘异常的’或反社会的行为”<sup>①⑦</sup>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隐藏的一个暗示是：消除贫穷，如果是完全可能的话，也不会使底层社会现象终结。如果一个人贫穷但仍然“在被认可的范围内行动”，那么贫穷以外的因素才是这些人沦落到底层社会的罪魁祸首。这些因素被视为一种心理和行为方面的折磨，或许因为贫困的原因变得更为频繁，但后者没有决定性因素决定。

根据这一提示，沦为底层阶级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故意的或默认的。即使仅仅是因为没有做到或忽视可以使他们摆脱贫穷的努力而落到社会底层也是一种选择。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国度里，不做应该做的是很容易的，可以不假思索地被解释为选择了其他——即本案所指的“反社会的行为”。沦为底层社会是体现自由的行为。在一个自由消费者的社会，抑制人的自由是不容许的；但很多人会说，限制那些用自己的自由剥夺他人自由的人——通过搭讪、纠缠、威胁、扫他人兴、加重良心负担或使他人生活变得齜齜——则并没有削减自由。

将“底层阶级的问题”从“贫穷议题”中分离出来是一石多鸟的做法。最显著的效应是，在一个以诉讼闻名的社会里，拒绝那些底层社会的人通过把自己置于社会功能失调受害者的地位而要求“损坏索赔”的权利。无论案子后面是什么样的诉讼，证

---

<sup>①⑥</sup> K. Auletta, 前引书, p. xvi.

<sup>①⑦</sup> 同前注, p. 28.

据的压力将公平正当地转移到“底层社会”头上。是他们必须首先行动证明其善意和从善的决心。需要做到必须首先由底层社会自己做到(当然并不缺乏专业的和自主的顾问会建议他们哪些是必须做的)。如果什么也没做,而底层社会的幽灵拒绝走开,解释就简单了,谁该受到指责也一清二楚。如果社会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自责的,那就只是其遏制底层社会邪恶的选择的决心不够。到那时,更多的警察、监狱,更为严厉和吓人的惩戒看来是矫正这些错误的最明显的手段。

可能另一个效应更为重大:底层阶级失范现象使贫穷议题“正常化”。我们要记住,置于社会认可边界之外的底层阶级只构成“正式的穷人”的一小部分。底层阶级是个如此之大而紧迫的问题,以至于大量的人生活贫穷的现实之中并没有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贯丑陋和令人憎恶的底层社会景象的背景之下,“仅仅是贫穷”被认为是暂时的不幸,但本质上正派的人们——与底层阶级不同——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并最终回到社会认可的边界之内。正如沦落并留在底层社会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从贫穷状态恢复过来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这次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认为穷人的后代沦为底层社会是选择的结果,这一观念传递了一个暗示:即另一个选择可能达到相反的结果,将穷人从社会退化中拉出来。

消费社会一个中心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争论(尚未成文)的原则是,自由选择要求在使用选择权力的技术和决心方面进行竞争。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存在着好的和坏的选择,更好的和更糟的选择。作出某种选择是有竞争力或没有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的个人选择的集成产物,是其成员“没有竞争力的选择”的证据。

在其有高度影响力的有关现今贫困根源的书中，<sup>⑱</sup>米德(Lawrence C. Mead)把没有竞争力看作是导致富裕当中存有贫穷的顽症，以及导致国家消除贫困政策的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贫穷的人纯粹仅仅是缺乏竞争力来提高工作期限的优势；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把“不工作”置于“工作”之上。正是因为那种无竞争力，米德说道，工作伦理的行使没有被听进去，进而没有能影响穷人的选择：

这一问题绞合在穷人是否能对自己负起责任，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来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之上……<sup>⑲</sup>无论归咎于怎样的外因，无业者内心当中的神秘总是存在——赤贫者在寻求明显为其提供的工作机会时表现出了消极被动。解释无业者就无法回避地要诉诸心理和文化。很大程度上，赤贫的成年人倾向于逃避工作，不是因为其经济境况，而是因为其所相信的东西……<sup>⑳</sup>雇佣中禁止性的壁垒缺失，穷人的人格问题成为理解和克服贫穷的钥匙。心理是探究低度工作努力的最后防线……为什么穷人没有如文化所假设的那样勤勉地去抓住(工作机会)呢？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sup>㉑</sup>贫穷的文化核心看上去是没有能力宰制自己的生活——这在

---

<sup>⑱</sup> L. M. Mead(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sup>⑲</sup> 同前注, p. x.

<sup>⑳</sup> 同前注, p. 12.

<sup>㉑</sup> 同前注, p. 133.

心理学上被称为无效力。<sup>②</sup>

机会就在那儿,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机会也必须这样被看待和把握,并且这需要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乏这三项。通盘考虑起来,穷人的这一硬伤是好的、安慰的消息。我们是负责的,给穷人提供了机会。而穷人则是不负责的,拒绝接受这些机会。正如当他们的病人持续拒绝配合治疗时医务工作者会不情愿地放弃,我们所有人在面对穷人顽固地不情愿工作时也有可能放弃提供工作机会的努力。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的。工作伦理的教导对任何愿意听从的人开放,工作机会在等着被抓取——剩下的是就是取决于穷人自己了。他们没有权利再从我们这儿要求得到其他任何东西。

如果贫穷持续存在,并在日益增长的富裕中加剧,工作伦理就必定会变得无效。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无效的状态只是因为其训令没有被适当地听取和遵从,那么没有听从的原因只能从掉队的那部分人的道德缺陷或犯罪倾向来解释了。

我重复一下:一开始,工作伦理是填补工厂劳动力紧缺的十分有效的手段。随着劳动力很快变成更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不过这次是作为另外一种有效手段:涤荡那些在社会认可的边界内因为抛弃大量同胞使他们成为永久性冗余而感到内疚的手和良心。手和良心的纯净通过对穷人的道德谴责和对其他人的道德赦免这一双重手段达到了。

---

<sup>②</sup> L. M. Mead(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 145.

## 贫穷是种罪行

米德用来反对“选择”不为生计劳动的穷人的小册子强调：“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贫困，直到心智健全和被反对的体系瓦解与自身的重负。”<sup>②</sup>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底层阶级为当今丰裕社会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之一是，恐惧和焦虑被吸收而不再为外部潜在的敌人所利用。底层社会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替代外部敌人成为对保持集体清醒非常重要的药剂，成为由个人不安全感所引发的集体紧张的安全阀。

底层阶级尤其适于这担当这一角色。米德反复说，刺激“正常”、正派的美国人组成反对福利寄生者、罪犯和辍学者的，是在他们看来与其所联合发对的事物存在的可怕的不一致：底层社会冒犯了所有为大多数人珍视的价值，但同时却在依赖他们，并要求得到其他人所吹嘘已经挣得的消费生活的乐趣。换言之，美国人对他们中间的底层社会存有偏见，是因为底层社会的梦想和所欲求的生活模式与他们自己的是如此的相似。而相似性还很难被视为不一致的问题。正如彼德·汤森指出，是消费者社会的逻辑把穷人塑造成没有成就感的消费者：“消费者的生活模式对那些低收入者越来越不可及，这一收入水平过去是根据固定的生存或基本需要的固定购买价值来确

---

<sup>②</sup> L. M. Mead (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 261.

定的。”<sup>②④</sup>然而,无可置疑的是,消费者社会训导其成员去感受的消费者生活模式的不可及,恰恰是最痛苦的剥夺。

每一种社会秩序都会生产出对危及其身份认同的某种危险的想象。但是每个社会都生产合乎自身尺度的想象——在其力图达到的那种社会秩序的尺度内。总体而言,这些想象倾向于成为生产它们的社会镜像,而威胁的形象则倾向于成为带负号的社会自画像。或者,把这用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进行表述:威胁是一个社会内部自身有关路径-手段、有关存在及永葆活力的方式的矛盾情绪的投影。一个对其存在模式不确信的社会会发展出一个被团团围住的精神堡垒。那些攻城的敌人是自己内部的“心魔”:受压抑的、环绕的恐惧弥漫到日常生活中;为了使日常的现实能够持久,必须对日常平凡进行挤压,提炼出“常态”,并塑造一个异己:可触摸到的、可以不断进行斗争的、甚至希望征服的敌人。

147

与这个普世的原则相一致,萦绕在经典的、建立秩序和迷恋秩序的现代国家头上的危险是革命。敌人是革命者,或者毋宁说是头脑发热的、狂野的、极端激进的改革者,企图取现存国家管制的秩序而代之以另一种国家管制的秩序、翻转所有现存秩序赖以存在或力图达到的原则而代之以相反原则的颠覆性力量。

社会秩序的自我形象随着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了,因此威胁的图景——带负号的秩序图景——也获得了新的外形。显示出来的情况是,近年来犯罪率的不断上升(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

---

<sup>②④</sup> P. Townsend (1993) *Poverty in Europe*, in Z. Ferge and S. M. Miller (eds) *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ot: Gower, p. 73.



过程与共产党或其他寻求“替代秩序”的激进政党成员数的下降是并行的),不是功能失调或疏忽的结果,而是消费者社会自己的产物,这在逻辑上(如过不是法律上)是合法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其不可避免的产物。消费者的需求越大(也即是市场诱惑的有效性越高),消费者社会就越安全和繁荣。然而与此同时,有欲求和能够满足其欲求的人(那些受到诱惑和继而以受诱惑状态促使其行动起来的方式采取行动的人)和那些受到诱惑但是却没有能力按照受诱惑者所被期待的方式采取行动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变大变深。市场诱惑可以同时既是均衡器和分割器。为了行之有效,消费和消费更多诱惑必须全方位传导,并且无歧视地向所有愿意听的人进行传播。但更多的人是听的能力胜过于回应诱惑信息所注定要引发的潮流的能力。那些对如此诱人的欲求却无能力行动来满足的人每天都要面对那些有能力消费的人所带来的琳琅满目的景象。他们被告知大方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获取公众喝彩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发现拥有和消费特定的物品、实践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甚至是人的尊严的必要条件。

如果消费是人生成功、幸福甚至尊严的度量器,那么人类欲求的盖子就被打开了;无论多少占有和激动人心都无法“与标注同步”所许诺的那样带来满足——因为不存在可以达到同步的标准。终点线与赛跑者一块儿往前移动,目标永远在人们力图达到它们的一两步之遥的地方。记录不断被打破,人们的欲求看起来没有止境。人们惊奇而困惑地发现,在新近私有化进而“自由”的公司里——记得作为苛刻的公共机构时总是苦于缺钱——在职的经理抽取百万计的薪金,而那些被解雇的则也为其拙劣马虎的工作得到百万计的补偿。从所有的地方,通过

所有的渠道,传递出响亮清晰的信息:除了攫取更多,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除了“正确出牌”的命令,没有什么规则。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拿一手好牌。如果获胜是游戏的唯一目标,那些手气不好的就会被诱使去尝试所有其他他们能聚集的资源。从赌场老板的角度来看,一些他们分配或周转的资源就成为法定货币;而其他所有在他们掌控之外的资源,是被禁止的。划分公平与否的界线在游戏玩家一方并不都是同一的,特别是从即将成为并有抱负的玩家那边,更特别是从没有法定货币通路的有抱负但无能力的玩家那边来看。他们可能会诉诸他们确实拥有的资源,无论是被认为合法的还是被称为非法的,或决定从游戏中退出。然而,后一个行动方案在市场诱惑之下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去给予考虑。

对那些没有成就感的玩家进行缴械、停权和镇压,成为通过诱惑整合市场导向社会中的消费者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无能而懒惰的玩家将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游戏中的废品,若不慢慢停止和召集接收者,游戏就会不断地把他们吐出来。还有一个原因使游戏无法从叫停生产废品中获益:需要让留在游戏中的人看到其他选择(他们被告知只有仅仅的和唯一的选择)的恐怖场景,使他们能够并愿意忍受游戏带给生活的艰辛与紧张。

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境遇悲惨,曾被当作是集体导致的病害而需要同过集体的手段来加以解决;考虑到当前游戏的性质,这只能被重新定义为个体的犯罪。“危险的阶级”因此被重新定义为罪犯的阶级。所以监狱现在完全和真正代表了衰退的福利机构,总之,随着福利供应的逐渐缩减,也必须要逐步加大力度来这么做。

被归为犯罪的行为发生日益频繁,对一个走向完全成熟和囊括一切的消费主义社会并没有构成障碍。相反,这是其自然的伴生物和先决条件。出于种种原因,必须承认确实如此;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那些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人——那些没有成就感的消费者,他们的资源无法满足其欲求,因此遵从正式的规则他们在游戏中取胜的机会很小或没有——对于特定的消费者生活而言是“内部心魔”的活化身。他们的隔离化和犯罪化,是他们痛苦的艰辛,全然落到的他们头上的残酷命运,打个比方说,是祛除心魔并焚烧其肖像的方法。犯罪化的边缘成为自称的环境卫生的工具:将不可避免的但是有毒的、臭气熏天的消费主义诱惑倒入其中的下水道,因此成功地留在消费主义游戏之中人不用担心他们自身的健康状况。然而,如果这是伟大的挪威犯罪学家尼尔斯·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所称的“监狱产业”<sup>⑤</sup>欣欣向荣的首要刺激,那么这一过程减缓、更毋庸说停滞或反转的希望,在一个完全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的社会中是非常小的。

这一关联没有哪个地方比在美国暴露得更加充分,消费者市场无限制的规则在里根-布什一切自由的时代走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远。放松管制和削减福利水平的年代也正是犯罪率上升、警力和监狱人口增加的时代。在那个年代,更骇人听闻和残酷得令人吃惊的数量的人需要为其所犯的罪行接受矫正,以迎合那些沉默的或不那么沉默的、表面上成功的大多数消费者快速增长的恐惧和焦虑、紧张和不确定、愤怒和狂暴。“心魔”越是强大,大多数人要见证犯罪得到惩罚而正义得到张扬的欲求也越不知满足。自由派的比尔·克林顿赢得了选举,许诺增

<sup>⑤</sup> N. Christie (1993) *Crime Control as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加警察数量,建造新的更为安全的监狱。一些观察家(其中有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彼得·莱恩博(Peter Linebaugh)教授(《绞索下的伦敦》(*The London Hanged*)的作者)认为克林顿的选举得益于非常公开地处决一个智障者雷克特(Ricky Ray Rector),当时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他批准了雷克特的死刑。两年后共和党极右翼的克林顿的反对者横扫国会选举,向选民证明了克林顿政府没有充分地打击犯罪,而他们愿意为此做的更多。克林顿的连任选举中,两党候选人都试图在允诺加强警力和决不姑息所有那些“倚赖社会但侵犯社会价值”的人——这些人企图享受消费主义的生活而没有恰当的证明或者为消费者社会的永存作出贡献——发出压倒对方的声音。

1972年,正是福利时代到达顶峰而到了其衰弱的前夜,美国最高法院监视着公众的情绪,判定死刑是随意的和反复无常的,因此不适于服务正义。在后来的几个判决中,最高法院1988年允许对16岁的人处以死刑,1989年允许处死精神有障碍的人,最后1992年在那个不太有名的赫瑞拉(Herrear)诉柯林斯(Collins)的案子中这样判决;被告可能无罪,但是仍可以处以死刑,如果审判是正确地进行并且符合宪法的精神。最近由参众两院通过的《犯罪法案》扩展了可处死刑的罪名达到57项,或根据特定的解释达到了70项之多。在高度的公开性和大量的宣传之下,一个联邦管辖的技术先进的行刑室——规划有可以容纳120名囚犯的死囚区——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监狱中建立起来。1994年初,总共有2802名囚犯在美国的监狱中等待死刑。这其中有1102名是黑人,33名在青少年时就被判处死刑。

死囚区压倒性多数的囚犯如预期的一样来自于巨大的和增

长中的福利库,在那里消费者社会的失败者和不合格者在那里扎堆。如莱恩博所言,死刑的公开展示“讽刺地被政客利用来对增长的底层社会进行恐吓”。在要求对底层社会进行恐吓中,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试图吓走其内心的恐惧。

按照甘斯所言“更为幸运的阶级对穷人所怀有的感受是恐惧、愤怒和非难,但恐惧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sup>②</sup>事实上,情绪化的感情混合可能在动机上和政治上发挥效用,是只有当恐惧是令人紧张和真正骇人的时候。被广为宣传的穷人蔑视工作伦理以及他们不愿意分担正派的大多数人的辛勤工作,已经足以引起广泛的愤怒和谴责。然而,当懒惰的穷人形象被针对正派的多数人的财产和生命的犯罪和暴力上升的警报消息所覆盖时,谴责又被恐惧所覆盖;不遵从工作伦理成为令人恐慌的行为,并且在道德上是可憎和令人反感的。

152 贫穷由社会政策的主题转变为典狱学和刑法学的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中所有竞争上的失败者;他们截然成为社会的敌人。划分接受救济者和贩毒者、抢劫犯和谋杀犯的界线纤细又很容易被越过。被救济的人群是犯罪团伙的聚集地,让人一直靠救济过活意味着扩大作为犯罪者来源的蓄水池。

##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将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有另外一个效果:有助于把穷人从普遍的道德义务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实质是一种基于责任感的冲动——对其他那些弱

---

<sup>②</sup> N. J. ,Gans,前引书,p. 75.

者、不幸的和受苦的人的正直和安康负起责任,而穷人的犯罪化会削弱和找理由搪塞这种冲动。对现实的或潜在的罪犯而言,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豁免于我们道德义务。为穷人的残酷命运申辩不再是道德问题;相反,保护正派人正当得体的生活免遭发生在大街上、聚居区和禁区的有图谋的袭击,是一个伦理问题。

如前所述,在现今社会没有工作的穷人不再是“后备的劳动力大军”,良好地保存他们以备召回积极地参与生产已经没有经济意义。然而这并不是说为他们提供作为有尊严的人生存所需的条件本身没有道德意义。他们的美好境遇可能与提高生产力和赢利能力并不相关,但它与人类所具有的道德情感和关怀,以及人类社会的自尊心是相关的。甘斯在其书的开篇中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

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宣称,我的穷人们是快乐的;在他们中间没有无知,也没有苦恼;我的监狱中没有犯人,街上没有乞丐;老年人并不贫困,税赋并不苛刻……当这些成为了现实,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夸耀其宪法与政府。

在现代史的早期阶段,工作伦理在将经济利益与潘恩所理解的伦理关怀联系起来上有着独特的优势。把穷人放到工厂中去工作符合商品生产者和流通者的利益(这些利益甚至可以为宣传工作伦理提供最大的活力),但它也诉诸公众的道德情感——由失业造成的惨相带给人们焦虑、不安和羞愧。考虑到新兴大众工业无休止地渴求持续增长的劳动力供给,道德关怀可以找到一个合法的和现实的出口来传播工作伦理的福音。有

人也许会说,资本利益与全体社会的道德情感之间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偶然邂逅。

这种情形一去不复返了,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的工作伦理与公共道德迈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是道德情感的出口;相反,它成为20世纪后期“不置可否化”——伦理上的污名借此被道德所不容的行为所带走——的有力工具。

“不置可否”是宣称道德中立或评估时避开道德评价而不采用道德标准的行为。号召遵从工作伦理的训诫,现在作为对道德共鸣适用性的测试。那些向他们提出诉求的大多数被认为(肯定)通不过这项测试,并且一旦失败,他们可以摆脱良心谴责,假设他们选择了置身于道德义务的领域之外。现在社会可以放弃所有带来困境的责任,并且不会因为放弃道德责任而感到罪恶。尽管有道德冲动的普遍和对人类悲惨、痛苦、苦难和尊严的自发的共同的情感,但没有一点成就。

抑制道德冲动从来不能彻底完全,因此摆脱普遍的道德义务也不是随心所欲的。无论良心怎样受到有关没有工作的穷人道德堕落和犯罪倾向的新闻的不断轰炸,还是存在不可撤销的道德冲动的残余,也必须再次给其一个宣泄的出口。这样的宣泄出口由定期的“慈善嘉年华”来提供——被抑制的道德感受在骇人听闻的痛苦和使人震惊的悲惨等可怕的景象的触发下,大量的但一般来说短暂地爆发。然而,所有嘉年华都意味着加强而非削弱日常规则,大众慈善的演出逐日平静,道德冷漠变得更能忍受;到最后,它们加强了对驱逐穷人正当性的信念。

理查德·卡布辛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当代生活最杰出的记录者之一,近来解释道:这一效果通过三个内在关联的手

段来达到,这一做法为主持这些“慈善节”的媒体所采用。<sup>②7</sup>

首先,一场饥荒或另一背井离乡而被迫无家可归者一般会带来这样的提示,那同样遥远的地方——“如电视上看到的那样”,那里的人们死于饥荒和疾病——是出产“亚洲小龙”的地方。尽管所有“小龙”加起来也不及亚洲人口的百分之一,但这并不重要。它们是被用来证明饥饿和无家可归造成的令人抱歉的困境是这些人独特的选择。替代的方案是存在的,但由于缺乏勤奋和决心没有得到采纳。潜台词是穷人对他们的命运负有责任。他们可以像“小龙”一样选择勤劳节俭的生活。

其次,这些消息如此进行编写播报,以把贫穷和剥夺的问题变成饥饿的问题。这一策略带来两个结果:贫困的真正规模被低估了(有8亿人口处于永久性半饥饿状态,但有约40亿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中),眼前的任务被局限与为饥饿的人寻找食物。但是,正如卡布辛斯基指出,这样来呈现贫困问题(例如近来出版的一期《经济学家》以“如何喂养世界”为题分析了世界贫困问题)，“严重贬低和实际上拒绝给予我们声称要帮助的人们以充分的仁慈”。“贫穷等与饥饿”公式遮盖了贫困的其他许多复杂方面：“恐怖的生活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攻击性,破碎的家庭,薄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和没有创造力”。这些痛苦是无法用高蛋白的饼干和高热量的牛奶所能消除的。卡布辛斯基还记得在非洲的村镇闲逛时,碰到儿童“向我讨要的不是面包、水、巧克力或玩具,而是一支圆珠笔,因为他们在上学却被没有什么可用来写作业。”

我们还需要说的是,所有有关媒体所展现的饥荒的恐怖画

---

<sup>②7</sup> R. Kapuscinski(1997) *Lapidarium III*. Warsaw; Czytelnik, pp. 146 ff.



面与被指控违反工作伦理原则的穷人之间的关联,被小心翼翼地加以避免。人们看到的都是饥饿,但无论他们眼睛睁得多大,也无法从照片上看到一副农具,一块可耕种的土地或一头牲畜。就好像工作伦理在一个不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社会中的保证是空洞的,以及这些人的境况成为压抑的道德冲动的宣泄出口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工作伦理兴起于未受损伤,准备再用作驱赶在家附近的穷人鞭子,让他们远离试图从福利国家获得(这往往是徒劳的)的栖身之所。

第三,媒体播报的灾害场景,支持和加强了普通的、日常的道德从另外的途径撤退。除了卸载累积起来的道德情感,其长期效应在于:

156 发达世界系上了无责任的安全带,从而造就了全球性的柏林墙;所有从外部流入的信息不外乎是有关战争、谋杀、毒品、抢劫、传染病、难民和饥荒——总而言之,都是威胁我们的事物。

我们只能听到极少的、低声的,有关杀人武器被使用——但与内战和大屠杀没有关联;更是绝少听到提及我们知道但不想公布的内容:所有那些武器曾经使遥远的国度变换成杀戮的战场,而这些武器是由我们的武器生产商提供的,他们的订单令人羡慕,其竞争力引以为豪——而我们自己的鲜血则抚育了繁荣。自身的残忍的虚幻影像沉淀到了公众的意识之中:“贫民街”和“禁区”鲜明地展示着道德规范和获得拯救范围之外的黑社会、怪异的和非人的世界放大的演出。将这个世界从其自身造成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努力可能只是暂时奏效,从长远来看是注定要失败的。所有扔出去的救生索肯定要缠绕在一起形成死结。

作为经多次验证有效的、值得信赖的工具,不置可否论得到了发展:沉着冷静者理性地计算其成本和收益。在这种人身上花钱意味着浪费。而浪费钱则在每个人都会认为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饥荒的受害者不是伦理主体,我们对待他们的立场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只是为嘉年华准备的——壮观的、瞬间的但生命短暂的、爆炸性的同情和怜悯的聚合。当涉及我们(富裕者)对世界上悲惨的穷人的集体责任时,经济算计占据了上风,自由贸易、竞争和生产力取代了伦理训导。在经济说话的地方,伦理道德最好保持缄默。

当然,除非工作伦理是经济规则唯一容忍的随机变量。工作伦理不是追求赢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经济广告,而是必要的和受欢迎的补充。对世界上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和丰裕社会中富裕的那些部分来说,工作伦理是单向的事物。它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为生存而努力的人的责任,但对那些远在谋生水平之上而转向更高层次追求的人没有什么规定。特别的是,它拒绝前者依附仰赖于后者,因此免去的后者对前者所应负的责任。

在今天,工作伦理是使“依附”思维名誉扫地的推手。依附逐渐变成一个肮脏的字眼。福利国家被指责培育了依附,使其成为一种自我延续的文化——这是拆除它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道德责任是这场针对依附的圣战的第一个受害者,因为他人的依附只是一个人自身责任的镜像,是所有道德关系的起点和所有道德行为的基础假设。在把穷人的依附贬斥为一种罪孽的同时,当前大行其道的工作伦理给富裕者的道德不安则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 第五章

# 全球化世界的工作与冗余

158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存在于对世界连续的、不停的改造中。通常,改变事物、使他们比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要好的欲望和由此产生的、使这个欲望更强烈的行为被称为“现代化”。现代化不应当被理解为“通向现代性之路”:一种产生“变成现代”行为的结果,一旦这些任务完成,这些行为便停止消亡。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性。当现代化停止了,现代性随之而亡。现代化,对世界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强制的、妄想的、上瘾的改造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同义。永久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种存在方式将现代性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以一种一成不变的形式不断重复社会的人类的存在方式区别开来。

然而,在大部分现代史中,现代化被看做一个有限的过程或任务,一个带有终点的使命,而不是一种其内部自我推动的趋势。这种看法的目的是清除现代化中许多固有的不足的、不一致的、不明智的事物,使现代化达到一种不需要任何进一步修正和重塑或反思的形式。比如,一旦人类需求的总量可以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得到满足,经济便会处于一种停滞不前(steady state)的状态;它此前追求的经济增长也会像物品短缺及其引发的贫穷那样出现断裂和不平衡。因此,从它的终极目标,合理公平的社会前

景来看,现代化的价值在于它的是实现这样目标的工具。

但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逻辑与这一期望背道而驰。一开始,资本主义从征服和开拓新领土中获得动力,将劳动力和生产方式、商业活动和本国经济分离,把没有现代化地区的生活方式带人到市场经济,并将这些地方变成资本来源地。一旦不需要它们提供资本了,这些新领土很少做资本转移的场所,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更要依赖已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生存,用时下流行的话来概括叫“资本剥夺”(asset stripping)。这个重大的转变使现代创造性的特征——即使是不变的——更加不明显:它与破坏力的密切关系。

跟以前一样,现在一切都可以从创伤中被创造(ab nihilo)。因为以前被侵略过或殖民过的地方还有“未曾被侵略”的一面,殖民者可以得到原谅(显然这样认为是错误的)。当这些创伤无法得到医治,而且其中原因主要在于创伤是误导性的,也就是过往医疗的副作用,当这些重组的客体大多数是昨日重组尝试的末端产品,以往的那些破坏性尘嚣逐渐消停。任何人都清楚,除非那些自己本身不想知道的,所有的创造都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毁坏。所有的创造都会带来某种污染,遗留某种具有毒性的东西——理性化的残渣余孽,必须摒弃理性化主体本身的冗余或者无用部分,才能截留其良善的部分,最终根绝后者的存在(这里的有用的定义和测度是不同的)。

理查德·森尼特认为,近年来商业策略中最主要的定律是“对惯例的不连续的再创造”,把它破坏性的行为隐匿在“再造”<sup>①</sup>

<sup>①</sup>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p. 47 - 51.

(reengineering)的名义下。森尼特说“这种再造最显著的事实是工作的减少。”用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和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的话说,“这种再造意味着用少的成本获得多的利润”。比如,在美国,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这种再造的受害者——被裁掉的工人的数量估计在1300万到3900万。“再造”今天已经成了“更高效率”的同义词。同过去断绝联系,它产生出一种更紧密的运作。无论事实怎么样,不难理解对再造的热情,裁员预示着快速减少支出,股东的短期投资收益加剧了混乱的力量。结果是,有效可行的商业模式被破坏和扔弃,有能力的雇员被解雇而不是被奖励,仅仅因为公司必须向市场证明它有能力随机应变。

对人(员工)的裁减过多了,理由是,这些被裁掉的人(员工)是再造的主要“剩余品”。为了立足,很多公司必须向股东证明,投资收益像殖民扩张时期一样,仍然具备扩张和征服能力:创造性的破坏能力。在目前的环境下(有时有利,有时不利),达到这一效果的途径是企业合并,随之而来的是“资产剥夺”(asset stripping),“裁减规模”(downsizing),“外包”(outsourcing)和大规模裁员(无论自愿与否)。

## 殖民主义或剩余劳动力输出

1883年召开的贸易协会会议,关于国家的议题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一位发言人(来自萨尔特博恩(Saltburn)的托因(Toyne)先生)<sup>②</sup>表达了严肃的关注。

---

<sup>②</sup> See *Report of the TUC 1883*, p. 39.

在乡村,趋势是垄断土地,将小农场变成大农场。小的农庄解体,土地被并入大的房地产。这样的土地制度使人们失去土地,进入到矿厂和工厂,与劳动力市场上的技工竞争。这个国家的工人想从中马上得到救济。

抱怨还是老样子,只有那些疑犯和可能的被告对单调的反复出现在动荡的历史中的判断有异议,这些历史是关于记录在经济进步惯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托因说的情况是,劳动力市场的拥挤是由于农业新技术引起的小农的破产和衰落。几十年前,工业设备引起的手工业协会的解体是导致贫困的首要原因。几十年后,原因变成了农业进步的受害者曾需求拯救的矿厂和工厂。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减轻劳动者生活的压力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办法是减少寻找新工作的人的数量。对低工资和工资降低的人来说,这种办法看起来很明显,而且不会引起争议。毕竟,不缺少快速安置剩余劳动力的地方。正如农业工人联盟(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的传奇领导人物约瑟夫·亚克(Joseph Arch)1881年在农业特派官员(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f Agriculture)前证实的那样<sup>③</sup>：

161

问:你如何保证劳动者获得更高的工资?

答:我们已经减少了相当多的市场上劳动者的数量。

问:你如何减少市场上劳动者的数量?

答:在过去的8到9年间,我们已经移民了70万

---

<sup>③</sup> 引自 J. B. Jeffrey's, (1948) *Labour's Formative Year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

问:这70万人移民是如何实现的?通过何种资金资助的?

答:我去加拿大和加拿大政府达成了协议,给予他们人口,我们也从中得到我们需要的资金。

通过大量输出剩余人口,把现代化国家本国的社会问题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城市内部人口过剩,出现大量集中(critical mass),导致“自我毁灭”(self-combustion)。城市中不稳定因素间歇性、突发性的爆发会影响已经稳固建立起来的政权。1848年6月后,在巴黎的“贫民窟”(rough district),起义的穷人被大规模地清洗一空;没有被清洗的穷人被大量地输送到海外的阿尔及利亚。巴黎公社失败后,这一行为又一次上演,这次是选择了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岛,离巴黎更远的地方,作为输送的目的地。<sup>④</sup>

162

从一开始,现代化时代就是一个移民的时代。难以统计(也无法统计)的大批人口离开他们难以维持生计的故土,去往一个能够带来好运的新地方。取决于现代化地区的移动,通常被看好的迁移路线会经常改变,但从整体上看,移民多从更发达(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漂泊到欠发达的地区(在现代化影响下,尚未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地区)。

因此,这样的行程被过多地设定了。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些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在原来的国家出现了很多剩

---

<sup>④</sup> 参见 Jacques Donzelot, Catherine Mevel and Anne Wyvekens (2002) *De la fabrique sociale aux violences urbaines, Esorutm*, December, pp. 13 - 34.

余人口,他们不能得到有报酬的工作和维持以前继承的或争取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化的进程过快,有些国家的剩余人口,相比较那些还未现代化的地区的人们,享有一种技术和军事上的优越感(即使是暂时的),这种难以克服的优越感使他们把为未现代化的地区看做是不存在的或者作为不存在来对待(通过镇压当地的反抗,或者当移民者认为安抚太麻烦时运用武力使他们“不存在”),也就是说,叫嚣着大规模向外迁移。据不完全统计,在没有现代化的地区,从欧洲士兵和商人第一次到达和定居到20世纪初(此时,当地人口的数量落到了最低点<sup>⑤</sup>),大约有3000万到5000万(当地总人口的80%)的当地居民死亡。很多人被杀害,很多人死于外来疾病,很多人因为失去了先辈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而死亡。正如查理斯·达尔文对欧洲主导的“使野蛮人开化”的历史时所总结的那样,“欧洲人的脚步践踏到哪里,死亡便追逐着那里的当地人。”<sup>⑥</sup>

163

矛盾的是,为了给欧洲剩余人口开辟新地区而实施的对当地土著人的灭绝(把它们变成垃圾场,没有风险地处理欧洲国家经济进步所产生的剩余人口),同时也把剩余的欧洲人变为“经济移民”。西奥多·罗斯福把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看作是对文明事业的无私奉献:“殖民者和开拓者至少有他们的理由:这个伟大的大陆作为贫穷的野蛮人的禁猎区什么都剩不

---

<sup>⑤</sup> 参见 David Maybury-Lewis (ed.), *Annihilating Difference: The Anthropology of Genocid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43 - 53.

<sup>⑥</sup> 引自 Herman Merivale, (1861)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Londo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p. 541.



下。”<sup>⑦</sup>不过,罗卡(Roca)将军,阿根廷历史上著名的领导者,委婉地称对野蛮之地的征服只出现在对南美洲彭巴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中,向他国家的人解释道,他们的尊敬“依靠理性和力量,迫使他们马上投降,这些少量的野蛮人破坏了我们的财富,使我们不能以法律的名义完全地取得进步和保证自己的安全,占有共和国最富有、最富饶的土地<sup>⑧</sup>。”

### 解决地方既有问题的全球策略的兴衰

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了。

必须说明,这不是一个物理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论断。从物理学上的空间和人类共存空间扩展的角度看,地球不仅没有达到极限。相反,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缺少人类生存的条件的一些人口稀少或人口减少的地区,看上去正在扩张而不是减少。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提供了在以前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下新的生存方式,也侵蚀了这些地区曾经提供居住环境和食物的能力;经济进步使以前的生存方式不再可靠,难以为继,增加了未开垦和丢弃的土地的面积。

“地球已经满负荷了”这一论断出现在《社会学和政治学》(*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一书中。它指的并不是地球的状况,而是地球上居住者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说明了那些“没

---

<sup>⑦</sup> Theodore Roosevelt, (1889) *The Winning of the West: From the Alleghenies to the Mississippi, 1769 - 1776*. New York: G. P. Putnam Sons, p. 90.

<sup>⑧</sup> 引自 Alfredo M. Serres Guiraldes, (1979) *La Estrategia de General Roca*. Buenos Aires: Pleamar, pp. 377 - 378, quoted by Herman Merivale, *ibid.*

有主人”的土地的消失,那些被看做没有人类居住的、没有主权管辖的、可以作为殖民地和居留地的领土的消失。这些现在大量的消失的领土在现代史上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现代化过程产生的剩余人口的转移场所。

剩余人口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无用的人口,(过量的、过多的、多余的、过剩的人口,既不能也不愿意被这么认为和处于这样的状态),是现代化无法逃避和难以处理的后果,形影不离地伴随着现代性。它是秩序构建(order building)和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有人口中部分不协调的、不合适的、不想要的人口。经济进步离不开破坏和贬低以前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只能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们。

然而,现代史中更多的情形是,世界上很多落后的、不发达的地区,以现代化地区为标准衡量,仍然整体或部分的没有受到现代化压力的影响,也就避免了人口过剩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困境面前,这些没有现代化、不发达的地区越来越被看做能够接纳发达国家剩余人口的地方,输出多余人口的天然的目的地,处理现代化无用人口的场地。转移和清除现代化国家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的多余人口是开拓新领土和帝国主义征服最深刻的目的。发展水平的完全不平衡不断地引起了权利的不均衡,使得这两个过程都可以实现(其实也不可避免),反过来,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是由于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局限在相对小的、有特权的地区引起的。这种不平衡使得现代化的国家地区在全球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些国家产生的人口过多问题。

只要现代性(不可阻止的、强制的、妄想的、上瘾的现代化)仍然是这种特权,这样的情况就会持续。一旦现代性成为人类

的普遍状况——有意的、被规定的、很难改变的——它的广泛的支配力影响会害人害己。当现代化胜利的进程到达世界上更远的地方,当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总量通过金钱和市场调节,当人类生活商品化、商业化、货币化的进程渗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现代化国家本国的问题,把全球作为现代化国家剩余人口的输出地的办法便不再有效了。所有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承担现代化完成造成的后果。他们现在面临着从本国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的需要(正如他们已经认识到的,这种寻找是徒劳的)。

把长的历史简化:地球已经达到极限在本质上意味着剩余人口处理的严重危机。剩余人口不减反增,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剩余人口越来越多,产生剩余人口越来越快,地球上会短缺放置多余人口的地方和重新利用剩余人口的方式。

166

新的剩余人口来源被加入到原来的两个来源中,使这一本来就不好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具威胁性。全球化,产生剩余人口最多的、最难控制的“生产线”,已经成为第三个剩余人口的来源(前两个是秩序构建和经济技术进步)。全球化同时还赋予老问题新的表现方式,在老问题中注入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放纵了和引发了人们急剧持续的膨胀心理。这些人在生物学和社会/文化层面上被剥夺了迄今为止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对于现有的人口压力,老殖民主义造成人口压力,无论是重新利用还是安全丢弃,都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出现了世界上剩余人口的警告(没有足够的就业,没有足够的供给),出现当代政治议题中移民和寻求避难者集中的问题,莫名的扩散的“安全恐惧”在

突发的全球策略和权利争斗中所扮演了新角色。

全球化进程的强力的、没有约束的、政治上不能控制的运作导致了在“流动空间”中新的多样的边缘地区的建立,这种“流动空间”是由曾经存在于独立的现代国家中的很大一部分权力转变成的。在政治自由的区域(politics free zones),很显然,这种易被破坏的、难以恢复的、不稳定的均衡取决于“相互确保弱点”(mutually assured vulnerability)。所以,对安全恶化的警告扩大了对安全恐惧的已经够多的来源,同时把公共关怀和个体焦虑的解决办法从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中脱离出来,转向对个人安全的关怀。随着这个转变,兴起的安全行业快速成为剩余人口生产主要的分支之一和处理剩余人口问题的最主要因素。

## 工作和贫穷问题新的全球化维度

167

考虑到我们相互依赖的各个方面(劳动分工、财富和贫困分配、社会阶层)的范围和填平贫富差距巨大的阻力,缺乏政治眼光和能够有效运作的政治机构看上去更不幸和危险。

边远地区的人们承受的穷困可能是以前行为或所被忽视的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但是因为太遥远了,这些没有引起道德上的反应,也没有引发一种愿望,促成像那些看到周围人类贫苦所引起的行为一样强烈的行动。把富人和穷人区分开的巨大的差距会扩大加深这种不平衡(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富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20%的穷人收入的114倍)。如果富人区和穷人区距离远一些,富人和穷人的差距不会被看到,也就不会引起重视。地区间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性的,但在道德义务上是却是地区性的。

如果得不到重视,全球性的贫困迟早会让发达国家和那些不关心外面发生什么、被保护在严密城墙内的富人们自食其果。如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警示的那样,“全球化正在创造一种‘世界经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工人的经济贫困只能导致工人的就业被剥夺。”<sup>⑨</sup>不要问警钟为谁而鸣,警钟为你和所有人类而鸣。为了边远地区的穷人,罗蒂发出了呼喊: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发现这些是不可忍受的:坐在办公室和电脑边的我们得到的薪水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了手的清洁工人的10倍,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担心这一事实,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没有工业化国家的100倍。<sup>⑩</sup>

168

这不是被不费吹灰之力推广到全世界的官方的关于目前人类状况的说法暗示的。它讲到一个地球村(借用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挖苦式的说法),里面,热带雨林里的土著人都会使用笔记本电脑。<sup>⑪</sup>不过,娜奥米·克莱恩发现,不是用工作和技术来弥补落后国家,一些跨国公司为了难以想象的利润,正在压榨地球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比尔·盖茨积聚了550亿美元的财富,然而他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只是临时工。克莱恩曾

---

<sup>⑨</sup> Richard Rorty, (1998) *Achieving our Count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85.

<sup>⑩</sup> Richard Rorty, (1999)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Penguin Books, p. 203.

<sup>⑪</sup> Naomi Klein, (2001) *No Logo*. Flamingo, pp. X VII - X VIII.

羡慕一个在马尼拉郊区从事组装计算机之类的高科技工作的17岁的女孩。面对克莱恩的赞扬,这个女孩回答道:“我们制造计算机,可我们不知道怎么操作计算机。”计算机只是一个显示世界上平等的样品,实际上,它只是让那些发达国家的使用者快乐,对那些落后国家的制造者来讲,它丝毫没有让他们脱离贫困。耐克运动鞋在充满虐待的越南的血汗工厂生产,芭比孩子用品由苏门答腊岛的童工生产,星巴克咖啡来自危地马拉被太阳烤焦的咖啡园,壳牌的石油来自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穷的村庄。

地球上没有多余地方和现代化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在世界上的传播有两个直接的以前被简短地暗示、现在值得更多关注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对解决办法的阻碍,这些办法在过去可以让人口相对少的地区正常和及时的解决剩余人口(超出处理剩余人口能力的人口)。一旦现代的生活方式不再作为一个地区的特权,剩余人口的解决办法——空白的无人的领土(更准确的说,那些由于全球权力的不同可以看得见和作为没有主人的领土来处理的领土)——便会不存在。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趋势面前,近年来,地球上部分地区产生的多余的人口增加或减少,这种解决办法不复存在。在现代化以前的社会,没有剩余人口的问题的时代,人类或非人类对多余空间的需要都没有出现。无论是由于阻碍还是外部解决方式的缺少,这两种时代日益地把排斥性的行为转向它们自己。

如果剩余人口(多余的那一部分,不能够融合到新的生活模式下或者不能重新成为有用的人口),能够按照惯例被转移和输送到内部经济平衡和社会稳定的区域,那么没有被输送的

剩余人口需要被标记以便重新利用。他们只是暂时的失业人口。他们失业的状态是一种反常,应该得到治疗,以便他们尽快回到正常状态。如同我们以前注意到的,他们是劳动力的备用军,必须回到允许他们获得第一时间就业的状态。

一旦排放剩余人口的解决方式被阻碍了,一切都会改变。如果没有被向外输送的剩余人口失去了有用和合法的标签,区分短暂的无用和最终无用的界限会变得模糊和不再合理。成为人口中脱离的部分,剩余人口的转让成为每个人潜在的未来——在每个人现况和将来的社会地位之间摇摆的两个极端之一。解决以新形式出现的剩余人口问题,习惯性的方式和干涉策略不能奏效,也不再合适了。不顾一切的寻找合适的可行的解决人口问题的新办法可能被尽管无效但强烈的再一次使用解决过去同样问题的旧方法的努力延误。为了谨慎起见,只对没有被输出的剩余人口的紧急措施会得到青睐,相比其他的干预模式,会被优先考虑。

所有这些以及类似这些的挫折和倒退有被扩大的趋势,在世界的部分地区更严重,这些地区“最近”遇到了以前没有的剩余人口现象和处理剩余人口问题。“最近”指的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多余空间的时候,没有空白的土地作为剩余人口的安置地点的时候,领土的不均衡对抗现代社会的新来者的时候。周围的土地不会欢迎剩余人口,像过去那样被迫给他们提供生活条件。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只能在本国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办法,偶尔也会找到办法。

这些国家对全球性压力的屈服和把自己的领土向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开放使个体和公有商业不再可能,这些个体和公有商业曾经为了保证立足接纳和雇佣新的剩余人口。只有那些

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经历了商业从个体家庭中分离出来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几百年前就经历了(还有附带的社会变革和人类贫困),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办法:可以被用来放置多余人口的空白和没有主权的土地。

部落战争和屠杀,游击队(通常比匪帮大一点)的扩散,忙于相互毁灭各自士兵,但又在这个过程中消灭和吸收多余人口(大多数是失业在家、没有前途的年轻人),是本国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之一,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只好采用这个办法(或者发现正在采用这个办法)。成千上万的人被从国家中驱逐出去,被杀害或者到邻国逃命。

或许,在后来实现现代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里,唯一发展最快最繁荣的产业是避难所的建造。

171

##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卢瓦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发现了一个悖论:<sup>⑫</sup>

过去为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运作,人们要求更少的权利;现在这些人为了来容纳和隐藏不调节就业状况造成的有害的社会后果和对落后地区社会保护的造成的恶化,费力地要求更多的权利。

仔细想想,华康德发现的转变只能以悖论的形式出现。随着从重新利用剩余人口到扔弃剩余人口的过渡,社会心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过渡是根本性的,需要国家权力的强有力

---

<sup>⑫</sup> Comment la, "tolerance zero" vint a l'Europe', p. 40.



的扶持,而且国家也必须扶持。

首先,通过废除防止个人工厂被开除或破产(假设临时的)的公共保险(collective insurance)。这种保险给政治上的两派造成一种明显的观念,只要被开除或破产被看做是意外事故或重新利用(回到工业生产中)的开始,但是一旦重新利用的前景不确定、很遥远,越来越不能给那些已经破产或从未被开除的人提供生活条件,这种保险会马上失去政治上的支持。

第二,通过设计和建立新的安全的剩余人口处理场所。这个任务要求不断的广泛的支持,因为成功重新利用剩余人口的希望减退,传统的处理剩余人口的方式(通过输出剩余劳动力)不再有效,对人类处理能力的怀疑以及看到多余的人口引起的恐慌传播的范围更大、程度更深。

172 社会状态被逐渐地、无情地、持续地变成一个亨利·A. 吉鲁(Henry A. Giroux)<sup>⑬</sup>所谓的设防状态。他将社会状态描述成一个日益保护全球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在本国的政治集团身上施加压力和军事化。现在,社会问题有被非法化的趋势。吉鲁总结道:

压迫增加,取代了同情。真正的问题,引起无家可归、年轻人游手好闲、毒品泛滥的原因——过紧的住房市场,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为了支持规训、遏制、控制政策,被忽视了。

剩余人口大量不断的快速聚集,可能会持久或者永远存在,

---

<sup>⑬</sup> 参见 Henry A. Giroux, (2002)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return of the garrison state, *Arena Journal* 19:141 - 160.

并要求更严格的隔离政策和超常的安全措施,以免“社会的安全”,社会体系的“正常的运作”受到威胁。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看来,所有体系为了存在所需要的众所周知的“紧张管理”(tension management)和模式维护(pattern maintenance)任务几乎,通过与社会其他部分的领土分离和脱离社会其他部分寻求引导的法律框架,全部浓缩为剩余人口的“缓解”和“中性化”。因为剩余人口再也不能转移到远处的人口处理场所和放置在离开正常的生活的地方,它需要被封锁在密封的“容器”里。

惩罚体系提供了这样一种“容器”。用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对“堡垒国家”的到来这一转变简明准确的概括来说,在过去重新利用剩余人口的时代,监狱只是教改机构的不起眼的部分,现在受到重视,被认为是一种排斥和控制机制。监狱本身,而不是监狱内发生了什么,被认为是体制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sup>⑭</sup>。意图恢复、改革、再造,使走错路的人回到正常轨道是不现实的,当出现这种情况,舆论界和政治界便会出来反对。准确地说,监狱的目的不仅是剩余人口的处理,更是最终的不可逆转的处理。一旦被社会公共拒绝,便永远被拒绝。对被假释或缓刑的犯人来说,回到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回到监狱。不是为犯人提供方便、引导被惩罚的犯人回到群体,监督缓刑犯表现的官员的职责是使社会公共群体安全,永远远离危险。如果考虑罪犯的利益,被看做是从根本上违背公众利益的。<sup>⑮</sup>

173

---

⑭ *The Culture of Control*, pp. 188 - 178.

⑮ 同上,第180页。

的确,和社会公共群体不同,罪犯越来越被看做本质上邪恶和有害的。无独有偶:

在公众和罪犯之间,没有相互的理解,没有沟通的桥梁,没有真正的交流。无论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反社会的环境影响的,结果是一样,在文明社会的外围的罪犯不能被改造……那些不适合的人必须被开除被排斥。<sup>①⑥</sup>

简言之,监狱和其他众多的社会机构一样,任务从重新利用剩余人口转到丢弃剩余人口。他们被分配到为了解决危机而发动的战争的前线,现代化全球胜利和地球上没有多余的地方使剩余人口的处理陷入了危机。如果重新利用剩余人口不再赢利,不再有重新利用的可能,处理剩余人口的正确方法是加速它的生物意义上的降解和分解,同时使它与尽可能安全地与正常的人隔离开。

174

工作、社会福利和家庭支持曾经是以前罪犯重新融入到主流社会的途径。这些资源的衰落,囚禁成为一个长期的规定,个人有很小的希望回到没有监管的自由……今天监狱用来作为一个保留地,一个隔离区。在这儿,被看做危险性的个人以为了公共安全的名义被隔离。<sup>①⑦</sup>

建立更多的监狱,让更多的罪行通过囚禁来惩罚,零忍让(zero tolerance)的政策和更苛刻更长期的判决被理解为与全球

---

<sup>①⑥</sup> *The Culture of Control*,第 184 - 185 页。

<sup>①⑦</sup> 同上,第 178 页。

化的新情况同步的、重新放置衰退的、不稳定的剩余人口的新的努力。

在将穷人和失业的人从传统的社会问题变为法律和秩序问题的过程中,监狱之后还有其他使用的方式,给他们钱,使他们潜在的、对社会的爆发性影响中性化。所有这些方式,如扩展城市贫困区和扩大给寻求收容所的人的区域,需要安全卫队来替代社会工人和福利看守者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

##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状态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欧洲民主漫长历史发展的最高成就和主导地位的形式,今天正在衰退。

社会国家将它的合法性和对公民忠诚与服从的要求建立在保护公民和确保不产生、不排斥、不拒绝剩余人口,不任意处理由个人的不能自立或不幸引起的剩余人口的基础上。简单地说,建立在保证公民个体安全的承诺的基础上,避免出现社会混乱。如果命运不好的个人失败了,周围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

被市场竞争冲击造成的反复无常的就业状况,是未来不确定性和萦绕在公民头上的对社会稳定和自尊的不安全担忧的主要来源。国家保护它的公民,首先要排除不确定性,使公民有稳定的工作、有保障的未来。这已经不是特例。当代国家不能履行承诺,政治家不再谈论对公民的承诺。相反,他们的政策预示着更不稳定、受风险支配的倾向,要求很多冒险政策和制定长期计划,甚至全程计划,虽然不太现实。他们教导选民更灵活些(为将来的不安全做好准备),寻找自己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每个决定国家解散或消亡的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发现或发明一个新的法律准则,能够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国家对纪律的要求。被全球经济力量的自由流动支配,成为经济进步的附属牺牲品(collateral casualty)的现象不是一个国家政府能够保证躲避开的偶然事件。增强由同样自由流动的恐怖主义者引起的对个人安全的恐惧,承诺更安全的防卫,使用更密集的激光武器和更宽广紧密的电视网络,进行更频繁的检查,攻击先发制人,实行更谨慎的遏制,来保护这种安全看上去是更可行更合适的选择。

与可接触到的和天天经历的由被政治权力丢弃的不需要政治权力的帮助的市场引起的不安全心理不同,围城心态、个人和私有财产被威胁的心态必须被积极的培育。威胁必须被描述成最邪恶的色彩,以便威胁的非物质化作为特殊的技巧、警戒、关注、和社会机构的善意而不是作为一种反常事件呈现给受惊吓的公共。的确做到了这些,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几乎每天,至少每周一次,CIA 和 FBI 警告美国人即将到来的、对他们安全的构成影响的威胁,使美国公众处于一种持续安全警戒的状态,把个人的安全牢固地置入引起最多紧张的关注中;而美国总统不断提醒选举者们,“产生我们曾未知道的一天的恐慌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许多社会混乱国家的政府满怀热情地观察,并效仿这种策略。新流行的对坚强的国家权力要求建立在个人脆弱和个人安全而不是社会不稳定性和社会保护的基础上,这种权利能够重新恢复制止剩余人口、任意处理剩余人口的信心。

毫无疑问,许多面临同样任务的政府对美国抱有同情的期待,发现美国的政策是一个有效的前例。表面上关于如何前进的观点的差别,实际上,似乎有一个政府之间的真正的联盟,不

能简化成临时的短暂利益的巧合,一种不需要写下来的默契,一种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关于共同合法政策的统一。这也许是个例,表现在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法国内政部长声名鹊起,其他欧洲国家的首相饶有兴趣地观察英国首相强烈地拥护和引进美国的与国家突发事件有关的新措施,比如把不是本地的人(好听的说法叫收容所寻找者)锁起来;相比人权,给安全考虑不可置疑的优先权;取消或暂停从大宪章(Magna Chart)和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时代生效的人权;对宣称“苗头犯罪”(budding criminals)的零度忍让(zero tolerance);重复地警告说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某些恐怖分子将要攻击。我们都是潜在的我们并不认可的战争的附属牺牲品。相比对个人安全和家庭的更快速更突然威胁,传统的对剩余人口的担心有望被弱化或者废止。

附属破坏(collateral damage)专指剩余人类相对于地球上新的边缘土地状况,这个状况是强烈的不受限制的全球化的动力抵制使它驯服的行为和规定引起的。与现代剩余生产有关的担心掩盖了更传统的剩余恐惧和焦虑。毫无疑问,他们在新世界权力等级的重建中被用的最多(在解构中也是)。



## 第三部分





## 第六章

### 新穷人的希望

人类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每个社会只选择它喜欢或容许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某些人类的聚集称作是“社会”,暗示这些人属于同一个整体,就是因为这个选择。(调查各种可能性,并从中选出最有趣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且一旦不经意而不是有计划做出的,这个选择很难被放弃。①)正是因为这个选择或是这个选择持久的影响造成了各个社会里的人们不同,这也是我们谈论不同的社会时所指的那种差别。无论一群人的聚集是否是一个“社会”,它的边界

181

---

① 这种选择并非“必要”或“必然”。概而言之,选择是武断而又偶然的,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称其为“选择”)如克斯托利亚所言,这种选择以“想象”的形式表现,凝聚整个社会,潜藏于社会中每个成员所思以及所能思的,种种有关自身及所处世界的想法。由于“想象”具有先于反思、自然化、实际的特性,社会中的成员并未觉察这是一种选择,也未体察到他们与其他社会有所区别的生活模式纯属偶然。这种凝聚的力量,直接反映了所选择模式的明显,也反映了以不同于自身想象的观点,来思考自己的社会及其他社会,有多么困难。举个例子,我们无法“在提及封建领域时,假意忘掉经济的概念,或者不用经济来分类当时人民不认为属于经济的现象。”(C. Castoriadis, (1987)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trans. K. Blam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163)。

在哪里,一个人是否属于那个群体构建的社会,都取决于做出选择和推动这个选择时的力量,取决于这个选择约束个人和个人服从它的程度。这种选择可以归结为两种强制性手段(或具有两种效力的一种强制性手段)秩序和规范。

当代伟大的小说家、哲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告别圆舞曲》(*La Valse au Adieux*)<sup>②</sup>中把所有社会上明显存在的“对秩序的渴求”描述为:

一种想把人类世界变成一种没有任何组织机构的世界的欲望,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以一种最佳的方式按照既定时间运转,并且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人的体系。同时,对秩序的渴求也是对死亡的渴望,因为生命就是对秩序的不断破坏。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求是一种善意的托辞,是强烈的厌世的借口。

182

事实上,对秩序的渴求并不一定源自厌世。但是厌世又不得不引发这个欲望,因为这个欲望为所有可能由厌世情绪支配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在前文中,任何一种秩序都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努力,把统一性、规律性和可预知性强加给人类,而人类却变得更加多样化、不稳定、不可预知。正如科尼利厄斯·卡斯图利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说,人类是“一种创造其他事物的生物,那是人类不同性的来源,因此人类可以进行自我改变”<sup>③</sup>,除非到了坟墓,否则人类停止多样化、不稳定和不可

---

② 此处引自 eter Kussi's, (1993) translation, *The Farewell Party*, Faber & faber, p. 85.

③ C. Castoriadis, (1997)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Politics* (trans. D. A. Curtis; lecture given in Lausanne in 1989), *Thesis Eleven*, 49:103 - 104.

预知性的几率微乎其微。人的存在意味着不断地选择和推翻所有的选择,而寻找其他的选择,改变已经不可改变的选择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因为存在的“可选择性”,对秩序的渴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秩序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取代了其他选择,并且终止了所有进一步的选择。尽管如此,这种终止并不是绝对的,厌世情绪会随之而来,无论是否有意而为之,受不受欢迎。怀疑、厌恶、憎恨,以及融合成厌世态度的情绪和态度的真正对象是人类的顽固不化的、根深蒂固的、无可救药的怪癖,这种怪癖也是秩序混乱持续的原因。

另外一个强制性手段是规范。规范是把秩序模式加在人类的行为上。规范指明了如何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举止有序,也就是说,它把秩序的概念转换成人类选择的语言。如果任何秩序都是一种选择,规范也是如此。但是对一种秩序的选择限制着可容许的行为模式的选择。它特许某些行为符合规范,其他的行为都不符合规范。“不符合规范”指偏离受到支持的模式,甚至偏离到了“不符合”的极端形式——背离。如果有争议的行为与社会偏爱的模式不一致或超出了可容许的范围,这种背离会引起治疗学的(therapeutic)或惩罚上的干预。如同对容忍限度的问题一样,普通的不符合规范与更严重的背离之间的区别——界定二者差别的态度,没有被清楚地划分出来并通常被广泛争论。

通常来讲,对秩序和规范的有意关注,作为一个争论焦点并被社会讨论,表明并不是一切都符合要求,事物也不应停留在目前的状况。秩序和规范的概念(一旦被创造,这两个概念就允许人们发现秩序和规范中的问题,并且把世界上的事物归类为与秩序和规范有关的要素),来自对事物现状的不完善的感觉,

以及有意改变事物的冲动。因此,这两个概念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它们不断要求并促使把现实提升到至今还没有达到的标准。提及秩序和规范本身就是一种实施强制措施的强有力手段。

但是秩序和规范两个概念中隐含的“应该”简化成了“是”,遗漏掉大量的人类现实。如果不包含一切,包含所有的人类以及人类的所有行为,这两个概念没有任何意义。有关秩序和规范的整体观点恰恰相反:一个被强调的观点是现存的一切并不是都处在一个假定的、正常运行的群体中,并不是所有的选择都能被包含。秩序和规范的概念就像一把尖刀,抵在社会上,它们首先表明的是隔离、切断、切除、消除和排除的意图。它们通过专注于“不当的”来促进“适当的”;它们挑选出现实中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权、并且注定要被隔离、被放逐并消亡的部分,限制住它们,使它们遭受非难。

184

秩序的实施和推广意味着通过对那些被排挤在外的人们施行一个特别体制,使他们服从于这个特殊体制来排挤他们,来直接完成排挤工作。而规范(任何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只是其中一个样本)则是间接发生作用,使得排挤看起来更像自我边缘化。

第一种情形是,那些被排挤被放逐的人违背了秩序。第二种情形是,那些被排挤被放逐的人没有达到规范标准。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被排挤者自身也因为被排挤产生负罪感;秩序和规范首先要同等分摊责任,然后才能决定对被排挤的人惩罚还是免罚。正是被排挤者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使得他们自己成为被排挤的对象。在被排挤的过程中,被排挤者自身是主体,属于积极的一面。因此,被排挤被表现成社会自杀而非社会处决的后果。被排挤者的过错是,他们不做任何努力或是努力程度

不够来避免被排挤,甚至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被排挤的命运,把它当成一种宿命。排挤他们不仅可以作为清除异己的借口,还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分摊应得到的权利,是一种正义的行为。那些判决和执行排挤的人,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人,正当价值观和标准的守卫者,可以感到公正。

有一种可能性被无视,没有被考虑:由于远不能为自己可悲的命运承担责任,被排挤者很有可能处于社会强制力量的接受末端,对这种力量他们既无从抗拒,更谈不上控制。在这些被排挤者中,可能一些人违反秩序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或是他们被迫的。他们被排挤,是因为他们天生具有的、他们不能选择的个性,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与其他人的秩序观格格不入。在这些被排挤者中还有人可能是不符合规范,不是因为缺乏意志力,而是缺乏合乎规范必不可少的手段,缺少这种手段就不可能符合规范,其他人具备这种手段,他们却没有;这种手段严重短缺,因此并不是人人都具备。

因此,已经证明,被排挤者或者即将为被排挤者不适合成为自由人。允许他们这样会导致他们的堕落。一旦放任他们,可怕的事情就会出现。他们会给自己招来各种各样的灾祸。但既然被排挤不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状态,假设的被排挤者的自由造成的后果,无论是对于被排挤者还是那些遵守纪律和符合规范要求的人都是同样可怖。剥夺被排挤者的自由(这容易被他们滥用或是浪费)无疑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要求,也符合排挤者的最大利益。对被排挤者的行为进行的管辖、控制和监督被看作是一种善举,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在一起,结合形成了一种愿望,要对这部分不合乎标准的人群有所作为,形成了一种冲动,从对秩序的实施和维护的关注中提取力

量,引起怜悯与同情等道德情感的支持。尽管如此,使他们受到法律制约,剥夺那些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自己权利的人的权利,千方百计地使他们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人的他们回避或抵制的体系,在这些努力中,不论它的动力如何,这种冲动通常都会反弹。

自古以来,秩序和同情的维护一直跟对穷人的社会建构结合在一起。穷人指的与同时代同地区的正常标准的人相比,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人,但他们胜过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这里的规范指达到正常标准的能力)。

## 没有角色的穷人

如今,每个社会里都有穷人。让我重复一遍,这不足为怪,任何秩序形式的强制实施都是引起分歧的行为,会使部分社会现实不合适或丧失功能,但是,把某一个社会模式提升到标准规范的地位,会使选择的多样性降低到一般水平以下或不再正常。穷人便是“不合适”和“反常”的典型和原型。

每个社会对穷人采取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畏惧、厌恶,另一方面同情、怜悯,两者不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这两种态度一样的不可或缺。第一种态度放任严厉地对待穷人,这是维护秩序所要求的。第二种态度强调了那些一般水平以下的人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使接受规范的人遵守规范的困难变得无足轻重。用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穷人也许终究会被发现,不管怎样,他们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和保护社会规范被遵守方面起作用。

然而,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构建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

在寻找穷人的作用方面,现代化以前的欧洲比现代的继承者欧洲做得更好。同现代化以前基督教欧洲的任何人和物一样,穷人,也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存在链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和没有被洗礼的、觉悟前的世界其他部分一样,充满了意义和目的。穷人遭受着苦难,他们的苦难是对原罪的悔改和对救赎的保证。尽管是由更幸运的人给遭受苦难的人带去救助与解脱,实施善举,并从中获得自己的救赎。对于任何人来说,穷人的存在因此成为上帝的礼物,自我牺牲一次,过有德行的生活,便可赎罪,获得上帝的保佑。可以说,一个在死后寻找世俗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创造另一个自我救赎的手段。

在一个虚幻的世界,没有什么事情仅仅因为偶然在那里便有存在的权利,所有的事物都必须显示其有足够的合理的存在证据,这是最确定的。更重要的是,与现代化前的欧洲不同,现代化后的社会规定了自己的规则,不把任何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使现有的任何事物都经过理性的严格的检验,不认可任何对自己权威的限制行为,尤其拒绝“死者对生者的支配”,拒绝传统、遗留下来的知识和习俗的权威。秩序和规范取代了对神圣存在链的幻想。与对神圣存在链的幻想不同,秩序和规范是人类的产物,是尚未付诸行动的构思,是尚未产生和造就的事物,不是已经被发现并被完全遵守的事物。如果遗留的现实与介入的秩序不一致,对现实反而更不利。

因此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指的是能够引起不安,并且能够促使人们去解决、修复或是移除这种不安的事物)。穷人既是秩序的威胁又是障碍;他们还藐视准则。

穷人是双重危险:由于他们的贫困不是天意,他们没有理由



恭顺地、感激地接受他们的命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抱怨或是反抗那些幸运者的理由现在被归咎于那些幸运者的剥夺。另一方面,传统的基督教施舍伦理现在看来是一个无法忍受的负担,是国家财富的消耗。把自己的财富分给那些得不到财富眷顾的人们,曾经是一个为了来世生活的合理的投资,现在,这已经不再合情合理,尤其不符合现世生活的逻辑。

很快,又出现了第三个威胁:那些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贫困当成天意而接受,不做任何努力使自己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穷人,一旦他们逐渐习惯并且以为自然的少量需求得到满足,他们会对工厂工作的利诱无动于衷,拒绝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早期的工业社会常常受困于劳动力短缺。因此,那些满足或顺从自己命运的穷人对工业家来说是可怕的:穷人对稳定收入的诱惑不感兴趣,在穷人看来,既然已经有足够的面包度日,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忍受长时间的、单调乏味的工作。的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穷人对贫困不满,要求反抗或革命;另一方面,他们顺从自己的命运,限制阻碍了工业的发展<sup>④</sup>。强迫穷人成为永远的工人似乎是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极好的方式。

因此,在工业时代,穷人被重新看做是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就业,稳定的就业,不留下任何损害的就业已经成为一种规范,而贫穷则等同于失业——对规范的违背,也是一种反常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消除贫困、把对繁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明显的办法是,劝使穷人或迫使穷人(如果需要的话)接受成为工人的命运。当然,实现这一目的最明显的办法是,剥夺穷人所有

---

<sup>④</sup> G. Himmelfrb, (1984)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London: Faber & Eaber, pp. 25, 79 ff, 193.

的生活来源,使他们接受提供的条件,无论这些条件多么令人厌恶,无论穷人多么反感这些条件,放弃受助的权利。严格地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道德义务的说教是多余的;把穷人变成工人的目的依靠的不是穷人道德上的冲动。然而,职业道德几乎被公认为是治疗贫困的三重问题、劳动力供应短缺和革命威胁的有效的、或许不可缺少的良药。人们希望职业道德像涂在蛋糕上面、用来掩盖蛋糕让人没有食欲的气味的糖霜那样。把单调枯燥的工作提高到道德义务的高度,可能会使那些接受者的脾气更温和,同时也迎合了提供者的道德心。如果当时的中产阶级信奉职业道德,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观,那么职业道德的选择就会变得更容易——事实上,更明显、更正常。

关于穷人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人把穷人看做是需要驯服的、野蛮的、顽固的动物;有人的看法受到道德、良心和同情心的影响,但是在职业道德这一点上,他们看法完全一致。因此,一方面,约翰·洛克(John Locke)设想出一个全面的计划,用来消除穷人“安逸”和“懒散”的天性,通过将穷人的子女限制在穷人学校里,训练他们有规律的工作,同时将这些子女的父母限制在贫民习艺所里,用严格的纪律、极少的生活资料、强制劳动以及肉体上的惩罚这些规定约束他们。另一方面,约西亚·柴尔德(Josiah Child)哀叹穷人的悲哀、不幸、不健全的、软弱的、一无是处的命运,同样认为“使穷人工作”的任务是“人对上帝和自然尽的义务。”

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工作是人上帝尽的义务这一概念,给穷人的贫困盖上了道德上的印章。被广泛认同的看法是:既然穷人对很少的东西就容易满足并且为了得到更多不会觉得过度劳累,穷人的工资应该保持在仅仅维持生计的水平,这样,虽然

有工作，穷人只能勉强糊口，为了生计不停地劳作。用亚瑟·杨（Arthur Young）的话说，“除了傻子，任何人都知道，必须让下层穷人贫困，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学识广博的经济学家马上推算出，与获得高工资、沉迷于无所事事或聚众闹事相比，当穷人的工资较低时，他们会劳动得多、生活得好一点。

伟大的改革家边沁，相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更能概括出现代的智慧（他的计划被同时代的学术界共同赞誉为“非常合理，极具启发性”），比其他经济学家深入，他总结道：任何形式的金钱诱惑都不是取得理想效果的可靠手段；完全采用强制手段比寄希望于穷人多变或是缺少的智慧要有效得多。他提议建造 500 所房子，每所房子容纳 2000 个“造成累赘”的穷人，由一个管理者长期监督，这个管理者拥有绝对完整的权力。根据这个计划，“无用的、没有价值的”人类，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的成人和儿童、乞丐、未婚母亲、不守规矩的学徒，都应该被拘押或强留在这样一个私人拥有和经营的强制劳动的房子里，在这里，没有价值人会变成财富。对那些少数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边沁愤怒地回答：“反对是侵犯人自由，回答是作恶的自由。”他认为，穷人只要处于贫困就能证明他们和不守规矩的孩子一样，没有自由。他们不能管理自己，他们必须被管理。

自从洛克、杨、边沁带着开辟新领土的探险家们那样的勇气和热情，把将要逐渐巩固的事情称为被世人广泛接受的现代穷人的行为准则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少有人会带着同样的狂妄与率直，冒着风险陈述那一套行为准则。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主张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然而，还是有很多类似的主张影响了大量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没有靠额外援助生活的人有关。在连续

的反对寄食者、骗子、靠救济生活的蠢人的运动中,在反复强调的要求高工资的人会冒着失业风险的警告中,人们仍然可以听到支持这种行为准则的声音。这种行为准则的影响还强烈地表现在一种坚持不懈的观点(尽管有大量证据与之相左):和过去一样,破坏了“为谋生而工作”这一普遍规范是引起贫困的主要原因,解决贫困问题必须使失业者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按照公共政策的惯例,只有作为商品时,工人才有权获得与工人一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因此,会形成这样的看法:现在的穷人一直保留着现代工业时代早期被认定的作用——劳动力的后备力量。这种被认定的作用使那些“不积极工作者”(not in active service)被怀疑和猜忌,与使失业的人重新就业、恢复被躲避就业破坏的秩序的方式一致。但是,一个障碍是:以往尽力把握与阐释工业时代新的现实的哲学现在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用,与工业时代后期的现实失去了联系。作为以往制定秩序的行为的动因,这种哲学正缓慢而持续地掩盖现实,使穷人新的贫困模糊不清。让穷人扮演劳动力后备力量角色的职业道德,作为一种揭示,开始新的功能,只作为一种掩盖。

过去,把眼前的穷人培训成将来的劳工的观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合理的。它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充分地满足了秩序维护和规范法规之间融合的需要。在现代化后期、后现代,尤其是在消费社会,这两个作用都难以继续存在。现代经济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它已经学会在减少劳动力和支出的同时如何增加产量和利润。同时,对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定的服从很大程度上是靠商品市场的吸引和诱惑,而不是靠国家的强制和各种庞杂的社会机构的灌输来保证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现代

化后期或后现代消费社会在不拖着大部分成员经受工业劳动的沉重负担下仍能繁荣发展。从实用目的来看,穷人已经不再是劳动力的后备力量,职业道德的呼声听起来越来越模糊,与现实脱离了联系。

当代社会首先把它的成员当作消费者,然后部分地把他们作为生产者。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完全成为社会的一员,社会成员要快速积极地购买消费市场的商品,为清理商品供应的要求(supply-clearing demand)做出贡献,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成为“消费者为主导的复苏”(consumer-led recovery)的一部分。这些,对于没有可观收入、信用卡、舒适生活前景的穷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被今天的穷人破坏的规范(破坏这些规范会使规范本身反常)是消费者能力或才能的规范,而不是职业规范。最重要的是,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不是“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社会责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成为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积极购买者。在消费社会的账目平衡中,穷人无疑是负债,无论怎样,他们都不能被记录在现在或将来的资产簿中。

因此,在历史上,穷人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了让人担忧,让人讨厌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益处,能够减轻以至抵消他们的恶习。他们不能提供和纳税人交的税一样的东西。他们是一项错误的投资,不可能有回报,更谈不上获利;他们是一个不良投资,把所有周围的吸入进来,却可能除了麻烦什么也不吐出来。社会中那些体面的、符合规范的成员——那些“消费者”——对穷人没有任何要求和期待。穷人完全没有用处。没有人真正地把穷人考虑在内、公开讲需要穷人。对穷人,“零容忍”(zero tolerance)。如果穷人不再存在,社会将更加富有,世界也会更加

美好。这个世界不需要穷人,穷人的存在没有任何必要。所以,将穷人遗弃不必有任何懊悔和内疚。

## 没有角色,没有道德义务

在一个消费者众多的社会里,发展福利国家的可能性不大;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突然更像一个保姆式国家,宠坏懒汉,娇养恶棍,怂恿腐败分子。

一些人说,福利国家是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来之不易的成果,如果真是穷人和失去权利的人的抗争迫使俾斯麦(Bismarck)、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贝弗里奇(Beveridge)这么做,那么这种抗争之所以能达到目的,是因为穷人有很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有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向生产社会提供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撇开其他不谈,福利国家是使劳动力重新商品化的手段,首先使劳动力可以买卖,当短暂下降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回升时,重新进行买卖。福利国家承担这项任务,是因为资本家,无论是个人还是联合起来,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承担重新商品化的代价。考虑到产业工人完成的双重(经济上和政治上)任务,福利国家让闲散人员重新工作,过去是一项明智的、有利可图的投资。但现在已非如此。让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既不可行也没必要。以前明智的投资现在看来越来越像错误的观点,是对纳税人钱的不合理浪费。

不奇怪,福利国家几乎在任何方面都在倒退。法律完整无损或解体缓慢、热情不高的少数国家,因为自己的轻率和落伍,受到当前经济部门的轮流指责或嘲弄,受到经济学家和世界金融机构的警告。比如,挪威就多次受到这样的警告,提醒他们提

防日益逼近的“经济过热”和其他新起的危险。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也曾被明确地告知,脱离以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是获得(sine qua non)国外援助、被接纳成为“自由国家一员”的条件。当前,经济学家在政府面前鼓吹的唯一选择,在快速增长的失业率(比如在欧洲)和下跌速度更快的工人收入(比如在美国)之间的选择,是一个假的选择。

美国率先免除社会福利。在过去20年里,美国20%最穷的家庭的总收入下跌了21%,而最富的家庭的总收入则上升了22%。<sup>⑤</sup>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以持续加快的速度进行着。得到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的福利权利急剧减少(用比尔·克林顿的话说,“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的完结”),从现在到2006年,将使美国贫困儿童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500万,同时大量增加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者的数量。用华康德的话说,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是不是消除贫困,而是减少穷人的数量(得到政府认可并有资格获得援助):“细微差别意义重大;如同以前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且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的穷人,简言之,就是那些像不存在一样做事的人”。<sup>⑥</sup>

可以假设,如果穷人试图维护遗留下的、福利法律建立起来的保护体系,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没有谈判的筹码使自己的意见被听到,更不能打动他们的对手。穷人最不可能寻找权利,使普

---

<sup>⑤</sup> 引自 Lynn Karoly, the economist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quoted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0 - 31 March 1996.

<sup>⑥</sup> L. Wacquant, (1996) Quand le qresident Clinto ‘ reforme ’ la pauvrete, *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er.

通公民改变他们的惯有的看法,这些普通公民受到政治家们蛊惑,在投票时考虑的是他们的钱包而非他们的内心。

尽管如此,这个假设被验证的机会不大。穷人似乎不介意他们的困境,如果他们介意,很少有证据说明他们的愤怒或是把愤怒付诸行为的决心。无疑,他们遭受着以往的穷人所遭受的一样苦难,不同的是,他们不能或者没有试图把苦难变为公共的共同关怀。近来,泽维尔·埃曼努利(Xavier Emmanuelli)这样解释穷人的这种出奇的平静:

显然,过去遗留的传统的贫困,由一代人传至另一代,虽然工业化国家经济的有力增长,仍然存在……但是,在一个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

这就造成了不幸的累积和与其他现象的结合,迫使个人或整个家庭陷入贫困,甚至露宿街头:失业,收入减少,丧失亲人,离婚,分居,居无定所。这一系列的排斥造成了社会相互影响和交流的隔离,参照标准的缺少,不能设想未来命运。<sup>⑦</sup>

在大规模解除管制,政府退步、正常功能被剥夺的时代,秩序的构建仍在加速进行着,但是,由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制定的秩序和规范的整体设想却在消失。构成社会的每个部分,无论大小,都致力于或是被促使致力于把自身的小的部分或者复杂的相互依存的体系中的一部分组合成社会更接受的形式。由放弃再造(reengineering)或自我再发明的努力引起剩余

---

⑦ X. Emmanuelli, (1997) *La maladie du lien*, *Le Monde*, 15 April.



的人口,被驱散到没有责任和监护的社会的空白地。这个新的无人区,被排挤的人口或是多余的人口,被丢弃在法律范围和交叉的道德义务领域之外。不依靠别人,他们处处不幸,孤苦无助。如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的那样,为了把握未来,首先要把握现在,但是这显然是新穷人所缺乏的:

雇用临时工制度深刻影响了饱受这一制度之苦的人们:使未来变得非常不确定,它阻止了所有理性的预测,尤其是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而这正是人们团结一致反抗最不能容忍的现状所必需的。<sup>⑧</sup>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被称作是“被排挤者”的人不主动提出要求或计划,不珍惜他们的权利,也不履行他们作为一个人和作为公民应尽的责任。既然在别人眼中他们不存在,在自己眼中他们也逐渐不存在。

现在穷人的遭遇没有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每个有问题的消费者孤独地承受各自的痛苦,至多有残缺不全的家庭和同病相怜的朋友陪伴。他们感到孤独和被抛弃,被遗弃很长时间后,他们会成为不合群的人;他们看不出社会如何帮助他们,他们也不希望被帮助,他们也不相信除了赢得足球赌博或中彩票之外还有什么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消失。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

---

<sup>⑧</sup> Pierre Bourdieu, (1995) *Acts of Resistan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82.

是,如果他们恰好刚刚来到、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还可以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或者永远远离航线的船上,或者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那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甚至连狱警也看着几次。

为了使身体隔离万无一失,还可以用精神隔离作为强化手段,使穷人得不到道德上的同情。除了把穷人驱赶出大街,还可以把他们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通过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当正常的秩序出现问题时,穷人常常成为被怀疑的人,被伴随而来的公共的责难和抗议包围。穷人被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街道的黑暗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由此,可以明确的是,贫困问题首先可能仅仅是法律和秩序问题,人们应该采取对待其他违法行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脱离社会群体,也就脱离了公共的意愿。如果这样,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根除一个被出于对穷人的道德上的思考简化成完全让人讨厌的、没有缓和减轻的现象,清除风景上的污点,抹掉秩序良好的世界和一切正常的社会画布上的污斑,这些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阿兰·分基尔克劳德(Alain Finkielkraut)在近期的一本书里提醒我们,如果道德思考的声音被弭除,同情心消亡,伦理的界限被清除,将会发生什么:

纳粹的暴行不是出于对暴行的喜好,而是出于责任;不是出于一种施虐的欲望,而是出于美德;不是出于快感,而是出于一种方法;不是通过发泄野性冲动和扔弃

顾忌,而是以优越价值观的名义;用专门的才能和早已计划好的任务。<sup>⑨</sup>

容我补充一点,一些人认为自己很体面、很有道德感,对纳粹所犯的罪行装聋作哑;在他们看来,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不算人类家庭中的成员,没有任何理由博得道德上的同情。把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换个说法,一旦道德群体的丧失与解决所有麻烦问题的先进技术结合,“生存的机会将会为零”<sup>⑩</sup>。解决麻烦问题的合理的办法,加上道德上的漠视,会成为一个引起爆炸的混合状态。很多人可能会在这场爆炸中死亡,但是最杰出的人类会逃离这场毁灭。

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现在已是凶多吉少。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又一个末日预言而置之不理,在它被考验之前就已忘记,以免我们再一次跟随目前回溯性的、为时已晚的行事方式,因未能早日注意它而歉疚:只不过是凶兆而已。对人类来说,幸运的是,历史虽充满了不祥的预言,但最终没有成为现实。尽管如此,由于缺少警告或是对警告自以为是的怀疑,历史上发生了很多非常恶劣的罪行。和过去一样,选择在我们手上。

##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伦理?

有一个选择;有人希望,因为倾向于隐藏人类出身并且装出

---

<sup>⑨</sup> A. Finkielkraut, (1996) *L' Humanite perdue: Essai sur le XX siècle*. Paris: Seuil.

<sup>⑩</sup> G. Bateson, (1973)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alladin Books, pp. 436 - 437.

一副必要性不言自明的样子,很多人认为目前趋势的替代物不现实甚至与事物的本质相悖,无论他们想表达什么。想象另一种群居方式的可能性不是我们这个私有化乌托邦世界的优点,这个世界以计算损失和用政治想象来取代危机处理而出名。这个世界不能集中意志和决心,替代更现实的选择。“不现实”,遭受冷落的标签,在当今的政治冲突中经常被使用甚至滥用,主要指意志力和决心的缺失。

如同科尼利厄斯·卡斯图利亚迪斯(Castoriadis)最近指出的那样,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它停止自我质疑”<sup>①</sup>。“自我质疑”曾是西方国家最核心的秘诀,它使西方国家惊人地、空前地追求自我完善,并在追求宏大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同样惊人的成功。“自我质疑”是可能的——事实上是必然的——自从发现我们计划的基础是随意的、必然随意的。因为任意性,只要替换的理由有说服力,就可以被其他的安排替换掉。然而,这一条件似乎得不到满足。我们容易忘记,“把一个人当做一样东西或是一个纯粹的呆板的机械来对待,要比把他当作猫头鹰更具想像力”。一旦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便不再提出这样的问题,曾经使现代社会不断前进、最具创造性的问题。比方说,“一切都要服从于效果——但是对什么有效,基于什么方面,为了什么目的?经济增长实现了,但是哪方面的增长,对谁而言,以什么样的代价,实现了什么目的?”

不提出这些问题,便没有什么阻碍,阻碍把我们假象的、持续不断的、无极限的合理化(在通过一个根据任意终端系统(ar-

---

<sup>①</sup> C. Castoriadis, (1996) *La montee di l' insignificance*. Paris: Seuil, p. 64.

bitrary system of ends)被任意选择的、具有部分特色的整体来替代人类的过程中,会重新出现)提高到客观必然性的层面,并且使疑惑成为不严肃的人们(比如诗人和小说家)的专有领地。<sup>⑫</sup> 欧菲最近就解决目前危机的根本方法,提出了有说服力、有效力的主张<sup>⑬</sup>。这一解决办法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益可以与实际收入能力脱节。”实际上是可以脱节的,和从职业道德支撑的雇佣劳动转变成由人的地位和尊严占主导的基本权益和基本保障的假想一样变革壮举。通过税收、废除对工作意愿的调查和评估、逐渐把等效原则转变成需要原则、以及把个体原则作为权益的基础,“为社会安全提供金融保障”这一原则使脱节有了具体的形式。

根据这些原则,转变社会保障机制,可能把福利国家自由、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观带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已进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充分就业的目标已经退回到现实可行的范围之外。

欧菲的主张听起来确实很模糊,因为只能以之前曾提到过的、关于我们越来越不能质疑世界的说法为基础。这些提议只能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依赖选举市场的政治力量看起来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运转,并且把社会问题的综合症状看做社会好转的迹象、把引发社会问题的原因当成补救措施。没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无论支持左派还是右派,为了政治

---

<sup>⑫</sup> C. Castoriadis, (1987)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trans. K. Blam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57 - 160.

<sup>⑬</sup> C. Offe, (1996) *Modernity and the State: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210 ff.

私利和选举好处,不会倾向于把欧菲的提议或者其他类似的提议置于一边;尽管迫于公众的压力,“负责任的政治家们”很可能会以精算上负担能力不足或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合实际”为由,驳回基本保障的计划,来掩饰目前盛行的危机处理办法中不可靠的现实主义。

尽管如此,欧菲准确地指出,他的提议归根到底是保守的。他不是建议革命,而是在遗留的制度不能保证其实施的情况下,维护西方文明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组织。由于提议的保守用意,检验的任务就落到了反对这些提议的人身上。他们要么想结束战后达成的社会伦理共识,要么必须证明,他们的要求可以通过长期的财富而不是看起来更可疑的基本收入得到满足。

欧菲似乎低估了反对者的反抗力,他认为在消费社会,在所有能想到的可能性中,反对者选择结束达成的社会伦理共识的可能性不大。他又反问,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困境。但是,不管做出正确选择的几率多大,都不会像欧菲描述的那样。否定选择的存在,阻挠对选择的慎重考虑,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社会和伦理后果。

不管欧菲的假想多么彻底,它仍需要其他假想的补充,比如将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节。梅丽莎·本(Melissa Benn)认为,“当男性政治家谈论工作时,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指有偿工作。”<sup>⑭</sup>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因为男性政治家和女性政治家谈论工作时,他们指的工作都是“有偿工作”。尽管有少数女性参与,政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男人的事情。真实情况是,把工作与

---

<sup>⑭</sup> M. Benn, (1997) Yes, but is there a philosophy to welfare-to-work? *Guardian*, 2 June.

有偿工作等同起来,在历史上是男人已取得的成果,如同马克思·韦伯指明的那样,他们把事业从家庭中脱离出来,把家庭中其他必要的活动交给女人,那些不被看做工作、没有经济表现形式的活动。

工作的观念以这种形式影响了政治,成为男性之间争斗的目标和贸易联盟和劳动立法斗争的战场。通过这种方式,工作被限制在那些能够进入商业账簿的活动,即可以买卖、具有市场认可的交换价值并且有酬金的的活动。工作范围之外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视为属于女人的专有领地。谈到工作,一个人不会想到家务和抚养孩子——这两项明显都该女人管;不仅如此,更一般的来讲,他指的不是那些大量的被利用的社会技巧和花在日复一日的 A. H. 哈尔塞(Halsey)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所称的“道德经济”上的大量时间。职业道德与集中的、无争议歧视相一致,在劳动市场之外,做着未出售的或售不出去的劳动,用职业道德的话来说意味着失业,与工作无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高层政治家们,在失去工作之后打算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时,才被允许公开宣布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这一切造成的后果在很多方面是灾难性的。它们极大程度上使同一群体和群体之间联系以及社会凝聚力缓慢而持续地解体,维护这些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它们给家庭的结构和生存能力上造成了深刻而又有害的影响。它们还严重破坏了人际关系和道德纽带所依存的基础。总体来看,它们已经破坏并继续破坏生命的质量(几乎与“生活标准”难以区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种破坏是任何市场的歉意、任何消费能力增长和任何顾问的高见所不能补偿或修复的。

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评估和评估施加的压力中解脱出来,需要用“工艺道德”(ethnics of workmanship)替代由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职业道德。正如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工艺本能”(不同于职业道德这一现代发明)是人类与生俱有的一种倾向。人是具有创造性的生物,认为一个标价牌就能把工作与不工作,努力工作与游手好闲区分开来,那是对人类的贬低;如果没有那个标价牌,人就会无所事事,任由自己的技能和想像力退化、荒废,这又损害了人类的本性。工艺道德会重新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和社会认可的意义,而这些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并确立的职业道德所否认的。

我们不止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处,必须决定要走哪一条路,但是首先要做出的、至关重要的、但不明显的决定是,认识到处在十字路口这一现实,相信不只有一条路从这里通往未来,相信有时在追求未来——任何未来——会需要急剧的改变把使收入权益与收入能力、工作与劳动市场脱节的想法,看做是历史上另一个乌托邦(乌托邦常被轻蔑地描述为“乌托邦的坟墓”),这种做法是诱人的(虽然这么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个人乌托邦”和“乌托邦私有化”的时代,因此嘲笑奚落那些暗示着对选择的修改的计划是很自然、很流行的,那些选择一起由个人处理。

因此欧菲提出的观点在严肃现实的学者看来,可能不值得再思考。他们不无道理。如同最近罗格-波·德瓦(Roger - Po Droit)表述的那样,“现实很像一个鸡蛋,到了几乎摆脱不了其限制的程度。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



去。”<sup>⑮</sup>他接着指出,在伯里克利(Pericle)的希腊时代或凯撒的罗马时代,想象一个没有奴隶劳动的世界是一种苛求,就像在波斯维特(Bossuet)的时代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君主制的世界一样。因此,我们怎么确定,一个没有奴隶市场的经济是不协调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得不到遏止?德瓦得出结论:“我们的时代可能为乌托邦的回归准备条件,而不是阻止乌托邦的进步。我们对‘政治容不下梦想’重复得越多,我们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渴望就会越强烈。”保罗·利科完全赞同:10年前,正是德瓦提出,在这个受到无形的体系阻碍的时代,让乌托邦成为我们主要的资源,作为反抗封闭的武器<sup>⑯</sup>。紧接着,费南多·艾茵莎(Fernando Ainsa),在完成了对拉丁美洲历史的调查之后,指出,与其谈论乌托邦,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倒不如谈论泛乌托邦——无处不在。<sup>⑰</sup>

204

事实上,将收入权益与收入能力脱节的想法一点也不保守。恰恰相反,根据我们的推理,将其实施会引起巨大的转变。它会让我们放弃对现代生活模式近乎神圣(如不加反思,会更神圣)的设想。比如,盲目追求效率而忽视效率服务对象和对人类苦难造成的副作用。再比如,所有被算作“经济增长”的东西,即那些以统计数据形式呈现的“今天胜过昨天”“明天又胜过今天”的数字,这些本身是有好处的,但忽视了对人类生存环境或自然造成的危害——人类共同享有的环境。

---

<sup>⑮</sup> R. P. Droit, (1997) *L'utopie est dans les dans les etages*, *Le Monde*, 18 July.

<sup>⑯</sup> 参见 P. Ricoeur, (1997) *L'ideologie et l'utopie*. Paris: Ssuil.

<sup>⑰</sup> 参见 F. Ainsa, (1997) *La Reconstrucion de l'utopie*. UNESCO.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必需的巨变本身饱受争议。对此,可以再次用科尼利厄斯的话来回答。当被他的一个采访者问及“那时你想要什么?改变人类吗?”卡斯图利亚迪斯回答说:“不,我想要的远比那要少得多,如果我想改变人类,人类已经改变两三次了。”<sup>⑮</sup>

至少现在仍有希望,让人类再次完成同样的壮举。毕竟,如同帕特里克·柯里恰如其分的表述那样,“群体的自愿简朴正成为替代群体经济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sup>⑯</sup>。

---

<sup>⑮</sup> C. Castoriadis, (1990) *Le monde morcele*. Paris: Seuil, p. 100.

<sup>⑯</sup> P. Curry, (1997) *Defending Middle-Earth*. Edinburgh: Floris Books, p. 51.

## 译名对照表

206

- Adiaphorization 不相关性  
Aesthetics of work 工作美学  
Affirmative action 特别保障法案  
Ainsa, F. 费南多·艾茵莎  
Arch, J. 约瑟夫·亚克  
Arkwright, R. 理查德·阿克赖特  
Attali, J. 雅克斯·阿塔利
- Bacon, F. 弗朗西斯·培根  
Banfield, E. 班菲尔德  
Bateson, G. 高利·贝特森  
Benn, M. 梅丽莎·本  
Bentham, J. 杰里米·边沁  
Beveridge, W. 威廉·贝弗里奇  
“Beyond Left and Right” 超越左右  
Blunkett, D. 大卫·布朗克特  
Booth, C. 查尔斯·布斯  
Boredom 无聊  
Bourdieu, P. 皮埃尔·布尔迪厄  
Boyson, R. 罗伯特·波伊森

- Bradshaw, J. 乔纳森·布拉德肖  
 Buerkle, T. 汤姆·伯克尔
- Carlyle, T. 托马斯·卡莱尔  
 Carnivals of charity 慈善嘉年华  
 Castoriadis, C. 科尼利厄斯·卡斯图利亚迪斯  
 Champy, J. 詹姆斯·钱皮  
 Child, J. 柴尔德  
 Christie, N. 尼尔斯·克里斯蒂  
 Citizenship 公民权  
 Civilizing process 文明化历程  
 Clinton, B. 比尔·克林顿  
 Coercion 强迫, 迫使  
 Comte, A. 孔德  
 Connerly, W. 沃德·康纳利  
 Consumer choice 消费者选择  
 Consumer culture 消费文化  
 Contented majority 满足的大多数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贫穷的犯罪化  
 Curry, P. 帕特里克·柯里
-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Deacon, A. 艾伦·迪肯  
 Democracy and the poor 民主与穷人  
 Dependency 依赖  
 Descartes, R. 笛卡尔  
 Diderot, D. 狄德罗  
 Discipline 规训  
 Downsizing 裁减

工作、消费、新穷人

Droit, R. - P. 罗格-波·德瓦

Duclos, D. 杜可洛斯

Emmanuelli, X. 泽维尔·埃曼努利

Exclusion 排斥

Factory regime 工厂体制

Fear, middle class 恐惧, 中产阶级

Ferge, Z. 弗吉

Finkelkraut, A. 阿兰·分基尔克劳德

Flawed consumers 有缺陷的消费者

Flexible labour 灵活劳动

Foucault, M. 米歇尔·福柯

Freedom 自由

208

Freud, S. 弗洛伊德

Friedman, M. 弥尔顿·弗里德曼

Full employment 完全就业

Functions of poverty 贫穷的功能

Galbraith, J. K. 加尔布雷斯

Gallie, W. B. 盖里

Gans, H. J. 赫伯特·甘斯

Garland, D. 大卫·加兰

“garrison state” 独裁国家

Gaskell, P. 盖斯凯尔

Giroux, H. A. 亨利·A. 吉鲁

Gough, I. 伊恩·高夫

Halimi, S. 塞尔·哈利米

- Halsey, A. H. 哈尔塞  
 Hammer, M. 迈克尔·哈默  
 Hammonds, J. L. and B. 哈蒙德夫妇  
 Handler, J. F. 汉德勒  
 Hasenfeld, Y. 哈森费尔德  
 Hayek F.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Himmelfarb G. 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  
 Hutchens, S. 斯蒂芬·哈钦斯
- Identity and work 身份与工作  
 Inglis, B. 布莱恩·英格丽斯  
 Insecurity 不安全
- Joseph, K. 基恩·约瑟夫  
 Jowett, J. E. 乔安娜·E. 贾勒特
- Kapuscinski, R. 理查德·卡布辛斯基  
 Kelvin, P. 彼得·凯文  
 Klein, N. 克雷恩  
 Kundera, M. 米兰·昆德拉
- Labrecque, T. 托马斯·拉布瑞克  
 “Law and order” 法律与秩序  
 Lepenies, Ww. 沃尔夫·雷彭尼斯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Linebaugh, P. 彼得·莱恩博  
 Locke, J. 约翰·洛克
- McClelland, K. 基恩·麦克莱兰

工作、消费、新穷人

Malthus, T. R. 马尔萨斯

Mann, K. 曼恩

Marshall, T. H. 马歇尔

Marx, K. 卡尔·马克思

Material incentives 物质动机

Mead, L. C. 米德

Means testing 家庭状况调查

Median voter 中间选民

Mill, J. S. 约翰·斯图亚特·弥尔

Miller, S. M. 米勒

Modernization 现代性

“moral economy” 道德经济

Moral responsibility 道德责任

Myrdal, G. 缪尔达尔

210

Nature, conquest of 自然,征服

“no man's lands” 无人岛

Normative regulation 规范管制

Offe, C. 克劳斯·欧菲

Paine, T. 潘恩

Panoptical institutions 全景机构

Parsons, T. 塔尔科特·帕森斯

Petrella, R. 李嘉图·佩托拉

Poor Law 贫穷法

Poverty 贫穷

Public welfare, idea of 公众福利,观念

- Re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 劳动的再商品化
- Redundancy 冗余
- Reich, R. 罗伯特·瑞克
- Reserve army of labour 劳动后备军
- Ricardo, D. 大卫·李嘉图
- Ricoeur, P. 保罗·利科
- Roca, general 罗卡将军
- Roosevelt, T. 西奥多·罗斯福
- Rorty, R. 理查德·罗蒂
- Rose, M. 米歇尔·罗斯
- “Routine labourers” 流水线工人
- Rowntree, S. 西博姆·朗特里
- Saarinen, E. 萨林
- Saint-Simon, C. 圣西门
- Schweitzer, L. 路易·史威茨
- Seabrook, J. 杰里米·希布鲁克
-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
- Society of producers vs. society of consumers 生产者社会与消费者社会
- Solidarity with the poor 穷人的团结
- Sombart, W. 维尔纳·桑巴特
- Stardom cult 明星崇拜
- Stratification in the society of consumers 消费社会里的阶层化
- Steiner, G. 乔治·斯坦纳
- Sue, R. 罗杰·苏
- System reproduction and work 系统重构与工作
- Taylor, F. W. 弗里德里克·F. 泰勒
- Taylor, M. C. 马克·泰勒



工作、消费、新穷人

Tebbit, N. 诺曼·特比特

Thatcher, M. 玛格丽特·撒切尔

Titmuss, R. 理查德·蒂特马斯

Townsend, P. 彼得·汤森

Traditionalist worker 传统主义工人

Tolerance 容忍

Unemployment 失业

“Underclass” 下流社会

Utopia 乌托邦

Veblen, T. 凡勃伦

Vidal, J. 维达尔

212

Wacquant, L. 卢瓦克·华康德

“wasted humans” 剩余人口

Watt, J. 詹姆斯·瓦特

Weber, M. 马克斯·韦伯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Welfare-to-work” 以工代赈

Wolff, M. 马丁·沃尔夫

Woolacraft, M. 马丁·乌拉考特

Workhouses 贫民习艺所

work ethics 工作伦理

Working poor 工作的穷人

Workmanship 手艺

Young, A. 亚瑟·杨

Young, M. 迈克尔·杨